

鳳凰週刊

JAN 2015 | 第01期 总第530期



新BMW 5系
插电式混合动力

2015 REPORT OF CHINA 中國時局報告



9 771024 120050

中國內地 RMB 15.00元 港澳地區 HKD 25.00元

本刊獲特許在中國內地發售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澳门航空公司)



(港龙航空公司)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刊为此版所列航空公司航班和酒店商务客房指定读物



(鑫海锦江大酒店)



(浙江饭店)



(深圳富苑皇冠假日套房酒店)



(新都酒店)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银座泉城大酒店)



(深圳香榭丽宫酒店)



(深圳丹枫白露酒店)



(福州西湖大酒店)



(深圳海景奥思廷酒店)



(北京友谊宾馆)



(四川峨山饭店)



(云南天恒大酒店)



(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



(丽江官房大酒店)



(杭州天元大厦)



(广东富盈酒店)



(杭州华辰旅业集团)



(北京金龙建国温泉酒店)



(南京中心大酒店)



(深圳维景酒店)



(青岛颐中皇冠假日酒店)



(井冈山中泰来国际大酒店)



(珠海怡景湾大酒店)



(珠海度假村酒店)



(帝豪花园酒店)



(珠海华骏大酒店)



(深圳戴斯酒店)



(常州大酒店)



(上海市虹桥宾馆)



《凤凰周刊》上期封面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出品人 刘长乐
行政总裁 崔强
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王纪言 杨家强 周军
编委会顾问 余秋雨
编委(姓氏笔划为序) 王西年 王多多 邓飞 刘庆东 刘爽 何新京 吴晓镭
钟大年 段敏 郭志成 唐建 袁路 喻凌霄
编委会秘书长 孙谦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社长 / 总编辑 孙谦
副社长 丁晓曙
副总编辑 蓝艺
主 编 师永刚 周宇
总编室主任 段宇宏 总编室副主任 黄楠
编辑部主任 崔世海 编辑部副主任 王毕强 路琰
主 笔 叶润洋 魏恭
主任编辑 晓波 漆菲 编辑 李光
主任记者 钟坚 张弛 秦轩
记 者 湛彦辉 徐佳 陈祥 王琰 孙杨 林子敬 曾鼎 赵新宇 李克难
张蕾 吴如加 马军 徐伟 刘荣 邱锐 郭天力 赵福帅 曹蓓
特约主笔 曹景行 杨锦麟 南方朔 谢国忠 阮次山 何亮亮 石齐平
美术总监 小米 图片总监 丁大伟 美 编 黄静 虎妹
多媒体发展部主任 吴穷 广告总监 李泽红
多媒体发展部编辑 张一泽 马茹均 莫文焯 张宝荣

香港凤凰周刊副总经理 崔博

海外事务总经理 夏婷婷 / 社长办公室主任 赵海燕
大区业务总经理 齐崇轩 柳楚光 傅张伟 高卉 / 出版事务部主任 李迪 / 副主任 张云
驻地代表 北京 贾楠 / 上海 金龄 / 广州 陈卫东 / 南京 任浩

法律顾问 王舜 财经顾问 沈铭

编辑出版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编 辑 部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 电话 00852-22008790
社 址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凤凰卫视总部 电话 00852-22008888
深圳办事处 深圳市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号楼6楼 邮编 518026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楼 邮编 518001
电话 86-755-25934567(订阅热线) / 25934558 / 25580179 / 25934597
Email: weekly@phoenixtv.com.cn
北京办事处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金龙建国温泉酒店3211室 邮编 100005
电话 86-10-65281005 / 65281006(订阅热线) / 65211745(办事处)
Email: cuibo@phoenixtv.com.cn
北京凤凰雨翔广告有限公司 汽车、外航行业总代理 IT、房地产行业代理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10号院 电话 010-84467053 / 84467054
浙江金色凤凰影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省、安徽省区域广告总代理
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内)凤凰科技楼7号楼6层 电话 0571-87175087
上海新泽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广告总代理
上海市余姚路288号1号楼7楼 邮编: 200042 电话 021-63511838
深圳市联动广告有限公司 华南区钟表、金融、洋酒、红酒、地产行业总代理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南方日报大厦7楼 0755-83226011 0755-83225602
青岛易城互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山东省区域广告总代理
青岛市香港东路79号淘金花园凤凰楼 电话 0532-88707398
凤凰周刊理事单位 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内地进口 / 发行总代理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工体东路16号 电话 86-10-65063082
承印人 凸版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电气道169号宏利保险中心20楼

中国大陆广告总代理 神州电视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 010-65207877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1927室 电话 021-52925188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55号岷山饭店商务楼2705室 电话 028-85588710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建设大道700号香格里拉饭店432号 电话 027-85781338
西安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街319号索菲特人民大厦东楼2层 电话 029-87928666
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A座2103室 电话 024-22814065
凤凰卫视广告综合业务机构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 010-65207833
广东一代传媒 广州市东山区文德路67-69号金德大厦28楼 电话 020-83226130

广告委托代理商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地 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层(邮编 518001)
广告热线 0755-25580179 传真 0755-25580169
广告客户服务热线 0755-25580179 / 25934597 传真 0755-25580169

本期所有文字和图片作品经著作人授权本刊, 未经许可, 不得摘编。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作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观点。
本刊字体由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凤凰周刊微博



凤凰周刊微信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咨询服务热线

深圳 0755-25934567 / 北京 010-65281005 /
香港 00852-22008790 传真 0755-25934579

2015, 时代呼唤政治勇气

□ 周兼明

时间是真正的导师,它积聚新的激情与梦想,也纠正世间的谬误与荒唐,它彰显隐匿的真理和荣耀,也慰藉人类的苦难和创伤。新年祝福,表达的是我们对时间的敬意。无论你身处何地,让我们在同一节点,共同迎接时间神圣而庄严的祝福。时间也是公正的裁判员,只要你在昨天真诚地创造过、信任过、热爱过,它所期许的未来,就是对每个人最好的新年祝福!

过去一年,肯定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从重磅推行的简政放权到稳中求进的财税、国企、金融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一系列关键领域的放权与改革,让民众看到了中国政府义无反顾、激流勇进的改革魄力;这一年也是反腐败的高潮年,从“大老虎”周永康、徐才厚到苏荣,已有近40名省级以上高官在反腐中落马,3万多名官员被查处,8万多名干部因违规违纪受到处罚;这一年更是依宪治国的启动年,中共首度在党的全会上宣示依宪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纲常,把法律面前无特区无特权作为执政党的目标,展示了中共的政治自信和责任担当,执政党尊重并服从宪法将成为依法治国的制度和保证。

当然,这一年也有许多苦难与隐忧。新疆和昆明发生的特大暴恐袭击、左右阵营的对峙与争议、民众道德与价值的迷茫、大量富裕阶层的移民、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经济呈现下滑困境等,也使中国社会蔓延不安、浮躁与焦虑情绪。诸多迹象表明,2015年对当代中国可谓最为关键的一年,它既是改革风云涌动、瞬息万变的时刻,也会成为国家复兴的机遇之年。全社会都期待中国能走出矛盾交织的发展困顿期,在法治、反腐与深化改革等领域,再度书写一个时代的伟大传奇。

这一重大历史关口,亟需政治家以“敢破敢立的政治勇气”做社会引领,因为反腐与改革一旦起步,就不能有丝毫的停滞和懈怠。中

国古代就对“勇”与“知”、“仁”、“义”之间的关系有所定位,如朱熹言:“有仁、知而后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是否拥有在政治智慧与政治审慎基础上的政治勇气,是区分政治家与政客的重要标准。政治勇气,让政治家敢于为公共利益担当政治责任;政治勇气,因立足于社会的公平正义,更让政治家在政治行动中表现得理直气壮,令人信服并跟随。

2015年是“改革60条”全面推进之年,国企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公用事业价格改革等都需大刀阔斧地落实推进。只有拥有足够的政治勇气,政治家和官员们才能以求真务实的态度,面对改革中的难题,敢于向市场放权,重塑市场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同样,无论是以除恶务尽的态度反腐,还是全面推动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大政方略,都需要有更为坚韧的政治勇气。政治勇气,不仅是政治家的一种心灵力量,更与政治家对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感有关,也与坚守执政为民的信念有关。这种使命感和信念,才能让政治家无所畏惧,激发出对国家发展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的政治涵养。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让中国重生,与邓小平当年敢于解放思想和突破禁区的政治勇气是分不开的。他用真理标准讨论和拨乱反正实践,突破了“两个凡是”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牢笼;用“猫论”和“石头论”超越了意识形态和颜色革命之争;他的“包产到户”、经济特区、废除终身制、政企分开等提法,当年都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没有政治勇气,是无法改变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念和行为的。邓小平之所以有这样的政治勇气,是因为他带领民众回到了世界和生活的常识,价值指向人的自由、尊严与幸福,是顺应时代与人性的政治作为,自然会获得全社会的响应与支持。邓小平的一生,再次证明了政治家的政治勇气,对处理国内外重大政治事务的重要。

政治家的政治勇气还能凝聚民心,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政治勇气之所以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是因为这种政治勇气指向了一个社会至善的目标,代表的是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及社会正义。政治家只要把整个国家共同体的利益作为自己执政目的,体现出良善的政治意愿,他就能真正为民众所信服,并牢牢把握话语权,最终达成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创造。

当然,在现代社会,实现政治勇气不应仅仅局限在政治家层面,也包括全体公民层面的投身与参与——首先,需要体现为社会各阶层对政治的参与,而参与的根本点就是从尊重宪法、遵守法律开始。因为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不仅代表了一个政体对国家权力和法律的基本共识,反映的也是民众的共同利益与价值诉求,是最规范、最具普遍意义的民意整合。每个国人都要通过尊重宪法的权威和对宪法的信仰,来为全社会谋求正义、民主和自由。其次,政治勇气也意味着整个社会都要以合作、共生、理性的政治态度去解决不同阶层间的纷争与矛盾。因为一个国家的民众构成了一种共存关系,互利合作是一切政治与经济行为的核心,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不是政治家的专利,每个公民同样具有改进自身、奉公守法的责任和义务。公民强大,政治家才会强大,政治家捍卫民主与法治的政治勇气才会强大。中国社会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区,每进一步都在考验政治家的政治勇气,也在考验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某位哲学家说过:“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按自己喜爱的方式起舞,对生命作出回答。我们每个公民的方向,就是这个国家的方向,且让我们一起努力。祝福中国!也祝福你! ☺



2015中国时局报告

2014年是中国改革进程中难忘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还是反腐肃贪高潮年、依宪治国启动年。已经翻开日历的2015年，对当下中国更为关键：既是改革风云涌动、瞬息万变的时刻，也是全面复兴的机遇之年。

红雲红河集团
HONGYUNHONGHE GROUP
赠阅部分嘉宾

03

卷首语

3 / 2015，时代呼唤政治勇气

06

现在时讯

6 / 【瞬间 / 封面 / 台港澳 / 中国观察 / 环境&科技 / 阅读 / 军事】

16

中国意见书

16 / 推进依法治国 须理顺四大关系
18 / “单独二胎”远远不够
21 / 2015反腐展望：要防止反弹和“避风头”
24 / “高压反腐代价不小，但付得起”
26 / 中国互联网的三大隐忧

30

台港澳

30 / 台湾2014：公民团体决定政治议程

38

32 / 香港：送走激烈博弈的2014
34 / 澳门：表面平静实则暗潮涌动

法治与民间

38 / 2014：中国法治转折年
40 / 司法改革的“后视镜”
43 / NGO革新中国公益事业内涵
46 / 谨防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

50

财经大趋势

50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局“新常态”
54 /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非常态”
57 / 寻找“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点
60 / 国务院金融改革期中考
64 / 中国经济有“通缩”风险

74

66 / 内地股市将涨到何时?
70 / 中国经济压力与转机并存

外交与世界

74 / 驻华使馆赠言
大国关系
78 / 2014: 中美二元格局初现
80 / 中欧合作迎来新机遇
82 / 新“冷战”阴影下的中俄关系
84 / 中日关系转暖之后
86 / 韩中经济交流仍需深化
88 / 中拉发展模式可以彼此借鉴
90 / 非洲迎来中国投资热潮
第三只眼看中国
92 / 返璞归真, 中国朝向“正常化”努力
94 / 冷眼看待“万邦来朝”
96 / 中国变强势是自然现象
98 / 中国未来发展之路仍然坎坷

101

文化观察

101 / 2014大陆冷战史研究
102 / 2014: 传统媒体寒冬之年
104 / 党史研究的新突破



台湾2014: 公民团体决定政治议程

30 ▲

公民团体中, 最先发声的是青年世代, 由于在2014年一头一尾展现出了巨大的政治能量, 青年团体发现了自己的政治价值, 并要求下修投票年龄。



国务院金融改革期中考

60 ▲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大陆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运用金融政策工具, 激活实体经济。

2014: 中美二元格局初现

78 ◀

现在, 中国追赶美国的脚步已经从“望尘莫及”到了“望其项背”, 有从“第二阵营”跑进“第一阵营”的趋势。中国正在将GDP总量排名第三的日本以及德、法、英、印、俄等国越甩越远。

广告目录

宝马 / 第一跨页 将本刊作为指定读物的酒店和航空公司 / 封三
新媒体 / 封底 红云红河集团 / 41-45 六星汽车旅馆 / 51
吉盟珠宝 / 69 山东景芝酒业 / 87 《凤凰周刊·生活》/ 93
周刊征订 / 95 凤凰书 / 97

MOMENT

瞬间

巴基斯坦 2014 / 12 / 16

瑞谢拉县，正接受军事训练的六名女性突击队员，她们隶属于巴基斯坦警方。当日，附近城市白沙瓦的一所军事学校被塔利班袭击，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拉希勒·谢里夫表示，军方将为逝去小天使们流下的每一滴血报复。



ucee杂志馆 | bucee.net



2014全球最适宜经商的国家/地区

资料来源:《福布斯》12月19日

排名	国家/地区	2013年排名
1	▲ 丹麦	4
2	▲ 中国香港	3
3	▼ 新西兰	2
4	▼ 爱尔兰	1
5	瑞典	5
18	▼ 美国	14
20	▲ 德国	24
24	▲ 日本	26
27	▼ 法国	19
97	▼ 中国	94

世界5大经济体中,美国排名下降了4位,另外四大经济体在榜单上的表现参差不齐,中国则下降三个位次至今年的第97位,日本从去年的第26位上升了两个位次,德国从去年的第24位跃升至第20位。

法国

NO.27

在前五十强中,法国的位次跌幅最大,下降八个位次,至第27位。法国经历了四年来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失业率也创历史新高。在弗朗索瓦·奥朗德的社会党政府治下,法国在货币自由上的得分急剧下滑,导致该国位次下跌。



1

日本共同社

2014/12/22

不“亲近”中韩的日本人比例创新高

日本内阁府近日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日本人对中国和韩国的亲近感处于1978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显示对中国不抱有亲近感的日本人比率为83.1%,较上年增加了2.4个百分点,连续三年超过了80%。对韩国不抱有亲近感的日本人比率为66.4%,较上年增加了8.4个百分点,较2011年日韩关系较好时大升了30个百分点。同时,对韩和对华抱有亲近感的数据也创出了历史新低,14.8%的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首次跌破了15%;31.5%的日本人韩国抱有亲近感,较上年下跌9.2个百分点,而对美国抱有亲近感的调查数据为82.6%与上年持平。

2

《法兰克福汇报》

2014/12/20

中国反腐影响全球奢侈品市场

全球奢侈品市场2014年增幅放缓,其中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以及俄罗斯客户的消费意愿下降。此前,中国消费者在海外购买的奢侈品金额数量是在国内购买的三倍。作为重要的奢侈品市场,中国2014年的经济增长乏力,对全球奢侈品行业造成了很大影响。而且,那里正在大力开展的反腐运动也对奢侈品市场造成了不利影响。贝恩咨询的一项调研显示,2014年由于反腐等因素,中国的奢侈品销量首次出现下滑,跌幅约为2%。而全球奢侈品市场2014年则增长了2%,销售额为2230亿欧元。通常,圣诞季是奢侈品销售高峰,但现在高峰有所推迟,这也是因为中国市场越发重要。2015年,中国的春节是在2月19日。

让索尼笑不出来的“喜剧”

● 综合外媒报道 / 2014.12.22

→

对于索尼影视娱乐(SPE)而言,以刺杀朝鲜第一书记金正恩为题材的《采访》已成为一部笑不出来的喜剧电影。这部引发了大规模网络攻击的电影虽然不是准备成为票房热门的大片,但如今就连索尼本身都已经因其而受到冲击。

事情的开端是11月下旬发现了针对SPE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时间又刚好赶上年末商战。索尼2014年虽然推出了4K电视等竞争力较强的产品,卯足了干劲,但SPE遭受网络攻击无疑给索尼泼了一盆冷水。

虽然SPE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林顿竭力让事态平息下来,但美国的年末商战是索尼重生的试金石。但因网络袭击泄露出来的信息会让索尼社长平井一夫头痛不已。

尤其是在泄露出来的信息当中,发现了索尼影视娱乐共同主席帕斯卡尔的一封信电,其中,批判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言论在种族问题上考虑欠周。最近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发生的黑人少年遭白人警察枪杀的事件,美国未对白人警察进行起诉,以此为契,感到不满的黑人进行了大规模反对运动。

帕斯卡尔虽然对自己“不经意且不合时宜”的邮件进行了道歉,但是却遭到重量级民权活动家的谴责,前途仍然叵测。再加上来自黑客的恐怖威胁,身处逆境的索尼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寒流袭击。

最终索尼影视决定,《采访》的公映计划,将在有限数量影院特别上映这部电影。索尼影业CEO迈克尔·林顿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发行电影《采访》,我们对一些影院将会在圣诞节放映这部影片感到十分高兴。”

在林顿发表声明前,美国连锁影城才向媒体透露,索尼已授权电影《采访》在其位于得州三个城市的影院公映,包括奥斯丁、达拉斯和休斯顿。

美国的年末商战是索尼重生的试金石。但因网络袭击泄露出来的信息会让索尼社长平井一夫头痛不已。

→



2014年12月3日，蔡英文在“九合一”选举后的民进党首次“中常会”中发言。

陈水扁和民进党都尚欠一个道歉

• 台湾《联合报》/ 2014.12.23

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大胜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集合13名当选的县市长，齐声要求“马政府”释放陈水扁，宣称这是“蓝绿和解”的第一步。“前副总统”吕秀莲更指定日期，要求在12月25日前释扁，否则将发动绝食抗议。在这样的压力下，“马政府”似乎只能被迫步步撤守，放宽解释，“法务部”的鉴定作业开始充满放水的情绪。

一场民主选举结果，胜利者关心的不是“国家”经济发展大计，不是如何收拾残破的政局，却将全部重点放在一名贪渎前“元首”身上；民进党的做法，对得起

它虚胖的民意支持吗？而“马政府”先前一再宣示尊重法治专业，但临到选举挫败当头，“法务部长”却忙不迭地为扁家“指点迷津”，示意可以网开一面从宽认定，也未免气短而畏缩。

目前“释扁”的气候已经箭在弦上，但其间有一些暧昧、灰暗的法理及伦理议题，仍有待厘清，这是执政党和在野党乃至扁家都无法回避的事。各方如果不能说清楚、讲明白，一旦随意松手放扁回家，势必引发诸多后患。

第一，以陈水扁之贪污、无德、失职，在关了六年之后，身体每况愈下，要让他保外就医，并非不能给予特殊考虑。然而，从“总

统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理看，如果要从“人道”的角度处理陈水扁的情况，对其他受刑人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标准。因此，朝野政治人物若要置喙此事，更根本的办法应该是推动修法，放宽保外就医的相关规定。

第二，“释扁”并不等于“无罪”，其间因果逻辑必须清楚说明。陈水扁是经司法三审定讞的贪污犯，他在龙潭案、陈敏熏案、南港展览馆案、元大并复华案等合计贪污所得达6亿余元，皆被判刑定讞，须合并执行最高20年的徒刑，并罚2亿元。

也因此，所谓“释扁”是一个易滋误解的措词。就算他通过“法务部”鉴定可以“保外就医”，也只意味其身体状况不适合继续坐牢，并不表示他获得“假释”或“无罪释放”。然而，以绿

营惯用的政治伎俩，极可能将陈水扁的“保外就医”说成“获释”，甚至说他原本无罪，却受冤坐了国民党的“冤狱”或“黑牢”云云。

第三，关于陈水扁和民进党的认错态度，从2006年扁案爆发后，民进党始终在全力挺扁，帮他遮掩；即使在扁定罪入狱后，民进党也从未就此向社会道歉认错。拗到今天，它反而振振有词地要求释扁，甚至以绝食作为要挟，仿佛陈水扁从来没有发生贪渎失德的问题。这样的民进党，还敢说自己是“有反省能力”的政党吗？

从民众的角度看，要说释扁能为台湾带来“蓝绿和解”，恐怕是天方夜谭；要说陈水扁能“回家过年”可以为社会增添温暖，也只是自欺欺人。重要的是，这出“放扁记”的大戏，绝不能沦为“阿扁复活记”的序曲，不能变成扁家“贪渎无罪”的政治证书，更不能使社会的是非黑白观念因此被扭曲颠倒。为了避免这些后遗症发生，我们要求陈水扁和民进党在释扁前应先向社会大众致歉；这一刻，民众已经等了6年。

香港会展行业12年蝉联榜首

• 《南华早报》/ 2014.12.22

国际知名杂志CEIAsia评选亚洲地区最佳会展设施，结果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连续12年超越新加坡，当选“亚洲最佳会议展览中心”，该杂志同时选出香港为“亚洲最佳商务城市”。

对于会展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梅李玉霞及其领导的900多人

团队来说，这无疑是最美的圣诞礼物。梅李玉霞是一位女强人，谈起管理这香港最大型的会议展览场地，她总是信心十足，满肚子大计。

对于第12次荣获殊荣，梅太说深感自豪，因为这也是对香港提供的专业会展服务的肯定。而同样令她欣慰的是，由会展中心自己对

参展商所进行的一个调查发展，近99%的参展商表示，下次若搞展览，香港会展中心仍是他们心目中的最佳选择。梅太说，这结果等于给他们注入了强心剂。

2014年2月，会展中心曾面对严峻挑战。北京当时宣布，取消原定9月在香港举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议的安排，改为到北京进行。外界普遍相信，北京是因为担心“占中”随时爆发影响会议所以改地点，而此举对香港无疑是一大打击，对会展

中心而言影响更大，因为在会展安排这“年度大会”的机会得而复失了。

虽未能举办APEC财长会议，香港会展中心仍保持为亚洲最佳，这本身就说明了许多，会展经济一直被视为是香港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而这端赖香港拥有的资讯自由流通、良好的法治，还有高水平的专业服务等等。所以，会展得以多年在亚洲区的同类设施中名列前茅也是实至名归。

中石油调查在印尼的“无价值”投资合约

• 路透社 / 2014.12.19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现任及前任官员们表示，在海外进行的小规模的高风险油气勘探投资是非常难监控的腐败漏洞。他们称，项目经理因收取回扣而达成的低回报交易可以被伪装成

由于判断失误或错误数据而导致的失败。

中石油集团除了调查旗下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去年在印尼做的Limau油田项目外，还在调查另外两项在印尼的石油项目，该集团为这两个项目共支

付了3.5亿美元。一位参与考察Limau油田增产作业合同的石油业人士表示，基本可以说这些项目毫无回报价值，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

其中一宗涉疑的合约是：中国石油集团旗下旗舰上市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收购印尼东爪哇省马杜拉区块80%权益。公司未提供卖方的任何细节，也未宣布收购价格

及资产详情。

中国石油行业资深人士称，该合约的收购价格为1.2亿美元。一位去年到访过印尼的中国石油行业资深人士表示，还弄不清楚该区块是不是有石油储量。另一宗交易也遭到怀疑。据一位石油行业人士表示，中石油在去年一宗未披露的交易中以约2.3亿美元左右价格取得印尼苏门答腊岛一处区块的勘探合约。

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将被赶超

• 《经济学人》/ 2014.12.22

→ 中国劳动力成本正呈现上升趋势：在2008-2012年五年间，有四年的劳动力收入增速超过生产率。这些趋势意味着，单凭劳动成本竞争力已不足以维持中国在全球的生产力优势。

2015年全球主要经济动向之一将是中国逐渐上涨的薪酬，但这一趋势对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及对于不同生产地区造成的变化幅度并不明朗。经济学人智库近日发布了名为《优势依旧——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分析》的最新报告，其中包括对于国家层面的每小时劳动报酬及中国31个省区市劳动力每小时劳动报酬到2020年的趋势预测。

报告称，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将会逐年稳步攀升，但将在近年呈现相对缓和的增长趋势。专家预计，自2013至2020年，中国全国的年收入平均增速将维持在12%左右。尽管收入增速明显，中国在未来几年内仍将保持制造业劳动成本的竞争优势。因为相比其他新兴市场而言，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将同时保持相对较快增长。

对于企业来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收入的强劲增长能否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匹配成为了关键问题。数据显示，近几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收入和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已显得不像从前那么有利。

尽管如此，在2013-2020年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仍将低于其他竞争国。比如，到2019年，中国每小时劳动力成本将仅会达到巴西的35.2%、墨西哥的55.2%和土耳其的75%。事实上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中国仅相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及越南等新兴制造业国家失去相对优势。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高于这些国家的趋势将在未来几年内被逐步扩大，原因也来自于这些新兴国家的薪酬增长因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一直维持在低速水平。据预测，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将在2019年分别达到越南劳动力成本的177%及印度的218%，而这一对比数据在2012年分别是147%及138%。

这些新兴制造业国家能否利用这一成本优势，将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开发有效的供应链基础



设施的能力。中国将会出现制造业生产新地，国内制造业劳动成本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仍为寻求多元化发展、更经济的生产所在地的企业提供了机遇。

预计2013-2020年间，安徽省和河南省的工人收入增长幅度将保持平稳。由于该区域农村劳动力愈发庞大，更多工人选择就近工作，劳动力供应趋于稳定，这将极大地吸引劳动密集型制造商聚集。

同时，在大宗商品驱动经济增长的省份中，如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疲软的当地需求也将使劳动力收入增速放缓。江西、河南和山东省则因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及完善的基础设施脱颖而出，成为制

造业颇为热衷的目的地。

经济学家托马斯表示，“自2007年以来，实际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在放缓，而实际制造业收入则保持增长势头。在2008-2012年五年间，有四年的收入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这一现象表明，中国需要迅速地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仅仅以价格竞争力的优势将不足以长期维持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优势，强劲的创新力也不可或缺。”

“近些年来对于中国经济的目光都集中在服务业、房地产市场、经济再平衡和互联网金融等方面”，经济学人智库中国研究副总监刘倩博士说，“是时候重新关注中国制造业这个极具竞争力的行业了”。

富士康跳楼事件还会再次上演吗？

● BBC / 2014.12.19

→ 近日，BBC暗访了中国的苹果工厂的主要生产部门，拍摄到多名精疲力竭的员工在连续工作了12小时之后，趴在生产线上睡觉。当事人苹果公司也立即发出声明，认为自己“在员工权利保障方面做的比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好。”

在此次暗访中，意外地发现苹果公司在对员工的工作证、宿舍安排、工作会议及对员工子女的待遇等方面并没有对员工进行应有的权利保障。

维泰公司是一家介于商业组织与非营利性组织之间的机构，主要从事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审核、培训和管理体系建设。其首席执行官丹尼表示：“我认为苹果公司相对于其他主流的电子公司做的都要多。”然而在

对两家苹果公司的暗访中，却拍摄到许多身着上海工厂的工作制服员工，在连续工作12小时后精疲力竭地倒在苹果6的生产线上睡着了。

根据一些匿名的员工反馈道，“尽管我饥肠辘辘，可是我还是不想爬起来去吃东西。我真的累坏了，只想好好躺在床上休息。日复一日机械性般的巨大工作压力折磨得我每晚几乎难以入眠。”

与苹果公司一同致力于解决农民工工作问题的另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迈德认为，“公司里的情况很复杂，苹果也没有控制一切的能力。报道说，中国工厂的工人在生产线上睡着了，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劳工的工作现状。我们与供应商一直共同协力在解决工厂的不足问题。在我们



不懈努力下，这些问题终于日渐得以改善。”

苹果公司则对此解释道，“员工在工作休息时间小憩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了。至于是否真的有人在上班时候偷懒打瞌睡，我公司对此会做进一步的调查。”根据苹果公司内部的摄像头中，可以得知这成千上万的员工平均每星期大概要工作55个

小时。

2010年，在苹果最大供应商的富士康公司中发生了14名员工集体自杀的血泪悲剧。这场由于员工不堪忍受极为艰辛的工作环境而酿成的悲剧，无疑给社会各界敲响了一记警钟。可是在悲剧过后，劳工不堪的工作环境仿佛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与重视。

中国反腐开始波及大型中外合资企业

● 《日本经济新闻》/ 2014.12.24

→ 中国推进的反腐运动已开始波及到大型企业。

最初与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有关的“石油帮”成为主要调查对象，但是最近包括外资企业在内，反腐运动扩大到汽车、钢铁和海运等行业。中国习近平领导层显示出严肃纲纪的态度，加大反腐力度可能成为外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新“中国风险”。

2014年12月19日下午6时左右，在广州日产汽车中国合资公司旗下的东风日产乘用车的高管紧急聚集到会议室。东风日产内部的党委会“一把手”宣布“基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决定免去任

勇的一切职务”，听到这个消息后，在场的高管震惊得说不出话。

任勇是日产与中国汽车巨头东风汽车合资公司旗下的乘用车厂商东风日产的副总经理。中国宣布任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在东风日产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自2003年合资公司成立以来，任勇一直作为实质的“经营者”执掌日产的中国业务。

“您怎么看待任勇？”，据说日产社长戈恩十分信任任勇，将中国业务交由任勇管理，“没有任勇的许可，就无法向前走”。公司内部的中国高管们，相比日产派来的日本人高管，更要看任勇的脸色。

中国并未说明调查任勇的具体理由。不过，任勇曾在东风汽车负责财务工作。有推测认为任勇利用自己丰富的会计知识和职权贪污公司钱款。

“中国战略和计划不会发生改变”，虽然日产如此强调，但是熟悉中国商业习惯和“关系”的任勇的离去将造成很大影响。在各地的汽车展上，任勇作为“日产的脸面”多次出席发布会。22日东风日产的管理层从一大早就开始向一线的工人说明情况，业务也照常推进，但是有声音担心此事将对今后的业务产生影响。

“又有人被带走了，都不知道该找谁了”，德国大众的中国法人高管头疼地表示。这是因为合资对象第一汽车集团的经营高管一个接一个地被带走调查。中国实

施强制搜查，相继有多位高管在机场和会议室被带走。

据称，到目前在一汽接受调查组谈话的管理层合计多达150人。8月，一汽与大众的合资公司“一汽大众汽车”的现任高管和前高管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对于大众来说，由于应对人员相继遭到调查，销售计划的制定等已开始受到影响。

“已开始向一汽和东风开刀了，反腐还将继续扩大”，海外的汽车厂商纷纷战战兢兢。主张“依法治国”的习近平领导层的调查对象还扩大到钢铁、航空、造船和海运等大型国有企业。此外，中国还开始严厉追究外资的商业贿赂行为，例如9月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的中国法人因行贿被处以30亿元的罚款。

反应堆“中国制造”：核工业实现“中国梦”

•《华尔街日报》/2014.12.17

早在2007年北卡罗来纳州Curtiss-Wright Corp. 旗下一家子公司赢得了为中国的新反应堆提供部件的近3亿美元合同时，业内人士都在鼓吹中国核能的迅猛发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好处。

时至今日，中国企业正在争夺这项业务，而外资公司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与此同时，Curtiss-Wright的这份合同也陷入了法律纠纷。中国监管部门指责该公司对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核项目被推迟负有一定责任。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核能企业现在很难守住在中国的业务。继三年多前日本福岛核电站的灾难迫使全球许多国家暂停核项目之后，中国已成为核能产业最大

的成长型市场和少有的亮点。但中国正越来越多地依靠本地企业来为数十亿美元的核项目建造关键部分，这是中国的工业民族主义以及对美国供应商的种种问题感到不满所导致的。

在全球核工业聚焦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利用其庞大的市场完成了关键技术转移并逐步实现本土化生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既达到了在国内建立敏感制造技术的政治目的，也满足了避免因供应商距离遥远而出问题的实际需要。

这些供应商问题中的一个已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出现。总部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屋电气将在中国建造四个AP1000反应堆，目前正在浙江建造第一个。

AP1000是西屋电气最先进的商用反应堆。当地政府将项目延期两年部分归咎于与Curtiss-Wright有关的质量问题。Curtiss-Wright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该公司随后已改进及完善了其设计过程。

厦门大学核工业专家李宁表示，这样的事损害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声誉。他还说，中国企业确实在成长，基本上正在将国际供应商挤出中国市场。举例来讲，据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称，总部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SPX Corp.为早期AP1000项目生产的一个专门部件，在未来的项目中将由一家中国国有机械公司提供。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是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该公司牵头AP1000项目。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表示，至于西屋电气在华建造四个AP1000反应堆，最后一个将有多达九个主要部件由中国企业提供，而第一个反应堆中的这些

部件最初是由外国企业提供的。

中国的技术进步已经在最近几个月显示出来。这家参与AP1000项目的国有公司9月份称，其自主设计的核反应堆CAP1400安全分析报告，已通过中国监管部门的初步审批认可。该反应堆是在西屋电气AP1000的基础上研发的。

到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建立起首个CAP1400时，预计80%的零部件都是国产，而前四个AP1000反应堆平均只有大约55%采用国产零件。许多渴望涉足中国核电市场的企业已经与中国国有公司签署了技术转让协议，旨在规避被中国市场完全拒之门外的风险。

上海核能咨询公司海远集团的经营合伙人莫安迪称，美国人需要记住，最先进入核电领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永远处于领先地位。他表示，“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要想成功，就要保持积极进取的意愿。”

审视中国的碳减排承诺

•《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12.20

在气候领域，中国是英雄还是恶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两极分化。在其中一极看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是浪费资源的“妖怪”，通过不公平的做法来妨碍大家阻止全球变暖的努力，并且“偷走”了清洁技术方面的工作岗位。而另一个极端认为，北京的政策是这个星球最大的希望：中国制定雄心勃勃的规划，以强大的共产党机器为后盾，力图让该国经济变得环保，还是可再生能源领域最重要的投资者。

不过最近，中国精明地展示了自己倾向于后者的较为环保

的形象。一些气候观察人士之所以变得更为乐观，最主要的原因是奥巴马总统11月访问北京期间，中美签署了一项协议。中国承诺其排放量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而且在同一年，中国约20%的能源需求将由新能源供应（在该协议中，美国表示，到2025年，将把排放量削减到比2005年时的水平低26%到28%的规模）。这是一个惊喜，获得了人们的掌声。

中国还承诺，到2020年，燃煤用量将达到上限——煤炭燃烧是该国严重大气污染问题的罪魁祸首。此外，中国官员还重申将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许可



交易制度，最早在2016年启动。这一制度可能会成为污染防治的基石。

这一切都显示，让中国雾霾重重的大小城镇清洁起来，是中国领导人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他们急于平息能造成危害的污染在公众中引起的不安。然而，他们也会强烈捍卫国家主权。因此，

中国愿意在一个国际平台上接受排放限制的举动，让人们觉得希望变大了，2015年或许能在巴黎达成一个以利马取得的进展为基础的 global 协议。

不过，中国打算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也受到质疑。在利马，中国拒绝了在联合国的程序中对其实减排计划进行电子监控的呼吁。由于中国的抵制和一些其他原因，利马协议力度打了折扣。

以上种种并不是为了否定中国对环境方面的努力，但北京的确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如果中国真的想要遏制全球变暖，就应该阐明对碳排放增长的预期，并为达到峰值设定一个较早的期限。对于在气候变化方面与中国打交道的外部人士来说，一定要记住，在赞许的同时也要验证，而且永远要敦促中国做到更多。

俄制五代机T-50轻松发现F-22

• 俄罗斯军事观察网 / 2014.12.21

→ 2012年12月12日, 苏霍伊实验设计局研制的第4架T-50原型机完成首飞。该飞机是拥有第五代战斗机所有性能的机型, 这款蒙着神秘面纱的飞机预计将从2016年开始列装。

俄罗斯第五代战斗机绕不开与美国F-22“猛禽”战斗机的比较。T-50研究项目耗资20亿美元, 但与F-22高达670亿美元的研究费用相比不值一提。由于价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F-22在2011年停产, 总共生产了185架, 而订货却超过600架。性价比让订货

方灰心丧气。

T-50并非苏霍伊实验设计局独立研制。好几家设计局、研究所和工厂参与了该项目。此外, 还有来自印度的承包方。它们负责研制机载计算机、导航系统、飞行仪表和自卫系统。同时, 印度还为项目出资25%。从2017年起, 印度空军打算购买250架T-50战机, 总价值250亿美元。

俄美战斗机的隐形能力难以正确比较。各种评估认为, F-22的有效散射面积在0.0001平方米到0.3平方米之间。T-50没有相关数据。不过, 对俄战斗机有一定

程度了解的专家对此给出了相当肯定的答案, 尽管无法说出具体数字。

现代化飞机最重要的特点不仅是隐形能力, 还有发现和摧毁目标的能力。在这方面, 俄罗斯的机载雷达研发者拥有后发优势, 因为出现了新的无线电电子部件。设计师也尽可能吸收了F-22使用雷达的经验。

据澳大利亚一家民间国防网站推测, T-50的机载雷达能在30公里内发现F-22, 在55公里内发现F-35。除了无线电扫描外, T-50还拥有强大的OLS-50M光定位系统。这家澳大利亚网站指出, 俄罗斯无疑是该领域的领导者。由此看来, “隐形”的F-22和F-35对俄战斗机来说并不难发现。

最后是武器系统。乍一看两者旗鼓相当。T-50和F-22各有一门机炮, 有效负载分别为10000千克和10300千克, 都装备空对地和空对空导弹。在14种专为T-50研制的武器中, 有能够在自动巡航时发现并摧毁目标的特殊导弹。

俄战斗机对美战斗机的主要优势首先是动力装置和飞行性能。T-50比F-22拥有更大的燃料储备, 是11100千克对8200千克。F-22要携带两个副油箱才能装载11800千克航空燃油, 但这大大降低了它的飞行性能和隐形能力。

尽管F-22的升限号称有2万米, 但由于飞机制氧系统不佳, 飞行员在高空感到呼吸困难。因此, 美国空军规定, 该飞机和平时期不得飞到7500米以上的高度。

首支中国整建制步兵营维和部队将赴南苏丹

• 综合外媒报道 / 2014.12.23

→ 12月22日, 中国首支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在山东举行誓师大会, 这是中国首次派出整建制步兵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该步兵营隶属于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 出国后部署在南苏丹首都朱巴地区。主要承担维和任务区保护平民、联合国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以及巡逻警戒、防卫护卫等任务。

该维和步兵营编制700人, 包括加强通信、医疗等专业力量。令人瞩目的是在这支步兵营里, 有一个13人的女子步兵班, 是中国走出国门执行维和任务的第一支女子步兵班。她们将与男兵共同执行巡逻警戒、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 主要负责对妇女、儿童的保护工作。

联合国官员此前表示, 这是中国首次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派出整个维和营。2013年3月, 中国曾向联合国驻马里的加奥营地派出一个300人的小型维和部队, 保护当地中国工程师的安全。

根据中国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人员的介绍, 截至2014年12月, 中国军队共参加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目前有2600多名维和军人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南苏丹、黎巴嫩、马里等9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首支维和步兵营即将出征, 标志着中国军队在国际维和行动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据悉, 该步兵营首批先遣分队180名官兵将于近期启程。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自2006



年开始向原联合国驻苏丹特派团派出维和部队。2011年7月南苏丹独立后, 中国继续向南苏丹任务区派出包括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在内的维和部队。

2014年9月, 中国已经向南苏丹派出700名维和部队士兵, 保护当地油田和中国工人。中国目前是南苏丹油田最大的投资者。8月, 南苏丹产油区再

次爆发冲突, 北京当局对南苏丹施压, 敦促各方立即停火, 并开启政治对话。为此, 中国正在南苏丹发挥着非同寻常的积极外交角色。

□ 编辑 林子敬 □ 美编 青年



壹

中国意见书

推进依法治国 须理顺四大关系

『单独二胎』远远不够

2015反腐展望：要防止反弹和『避风头』

『高压反腐代价不小，但付得起』

中国互联网的三大隐忧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在反腐败和制度建设方面，都有极大建树，开启了改革的全新局面。

推进依法治国 须理顺四大关系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设立了强有力的改革领导“中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已然到来。

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到目前为止共召开了七次会议（截至本刊发稿），一浪接一浪地推进改革。

在这期间，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为树立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扫清了非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形成了中国前行的两个轮子，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解决的是动力问题，一个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解决的是保障问题。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双轮驱动，我们的目标就能实现。

在取得上述突破的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必须对党的领导与法治限权的关系、党的领导与独立司法的关系、司法公正与舆论监督的关系、体制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进行更细致深入的理解。

从人治走向法治

我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是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里程碑，它对我们国家治国理政、长治久安，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非常重要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推进

法治建设的速度明显加快，不再局限于文案宣示，而是着重具体制度的构建和法治体系的建立。

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系统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具体而言，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在以下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第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十五大第一次用“法治”取代了“法制”，一字之差，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十八届四中全会则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取代了过去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又是一字之差，这也是一次重大的创举和突破。

过去讲法律体系，似乎只是一套明文规定。现在提出法治体系，这是质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充，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增添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准确的目标。而且把党的法规也纳入到法治体系，过去的法律体系是不能容纳的。

第二，明确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这次《决定》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作为一个核心问题提出来。过去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这次提出来，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一致的，不是对立的。这非常重要，不能老是争论。

《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就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二者的内在关系说清楚了。

第三，顺应历史潮流，把依宪治国、依

宪执政放在了突出重要的地位。

《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坚持依法行政首先是坚持依宪执政。”宪法的权威和重要作用在这里得到了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时我们的宪法都被废止了，国家主席可以随便被批斗，无法无天。

我们过去长期地、习惯式地，不讨论法律怎么规定的，而是讨论领导怎么指示的。所以有人说，黑字的法律文件不如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批示，领导批示不如领导的电话。所以，宪法的权威、宪法的精神必须要树立起来。

另外，围绕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还有过一些争论，所谓“姓资姓社”。这次提出“两个首先”就一锤定音：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这不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和市场经济一样，是人类长期实践总结的一般规律，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我们不能做傻瓜，好像人家搞的就都是资本主义的。

第四，从制度构建上保障司法公正。四中全会《决定》高度重视影响司法公正的各种问题，通过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设立巡回法庭，改革案件受理制度等等制度构建和完善，着力去除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这是我国明确依法治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具体行动方案。

第五，从尊重司法规律出发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决定》明确要求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要求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

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对军队转业干部进入法治队伍加上了“具备条件”的限制，既开辟了通道又严格了专业素养的要求，有利于法律人共同体的进一步形成。

需处理好四大关系

在《决定》取得上述突破的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对几大关系进行更细致深入的理解。

第一，党的领导与法治限权的关系

法治的核心在于限制公权，保障公民权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全面规范和约束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权力范围和权力行使方式，避免行使权力的特定组织和个人以党的名义滥权，从而改善党的领导，并最终加强党的领导，进而克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病。

由于话题的敏感性，长期以来，大部分人谈法治时不提对执政党履行执政权力的规范和约束，但如果仅从表面上理解和执行加强党的领导，就会出现小平同志批评的：“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结果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

第二，党的领导与独立司法的关系

长期以来，虽然《宪法》明确规定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但独立司法总让一些人闻之色变，似乎党的领导会因此被削弱，于是不断出现要求司法“服务大局”、律师“讲政治”等令人侧目的言论。

我国的立法过程就是党领导人民把人民的意志和要求通过人大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的过程。因此，法官、检察官、律师严格遵照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就是从根本上坚持党的领导，法治才是最大的大局，独立司法加强了而非削弱了党的领导。

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高尚全

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不能庸俗化地理解为在个案中服从当地党组织的指示、屈从当时当地的某种“民意”，而是要在每个个案中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坚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第三，司法公正与舆论监督的关系

司法公正，尤其个案公正常常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热点。一些律师群体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将他们认为是枉法裁判的案件诉诸于网络舆论。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权力对司法的扭曲，但在个别案件中，舆论也会对司法的客观公正造成负面影响。

司法机关应当接受舆论的监督，独立司法也需要舆论监督，国家甚至还应制定法律来保障舆论监督权。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又要保持自身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不随意为舆论所左右。那些发起舆论监督的律师并非法治的敌人；相反，律师是全面推进法治最重要的力量，由他们发起的舆论质疑和监督更具有专业性，更值得重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舆论监督和质疑中提出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第四，体制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二次会议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过去在法治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完备情况下，改革缺乏系统法律框架的约束，基本上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导向，有的甚至直接突破了当时的法律和政策，比如小岗村村民用血手印约定共同承担刑责。但在当下法律体系初步建立的情况下，完全忽视法治环境，不仅不能带来改革的迅速推进，反而会造成公平的缺失，以及各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侵害群众权利的假改革。

处理好体制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必须在两方面有所加强，一是加强中央决策效率，对需要立法铺垫的改革事项能够迅速作出决策并推进立法，避免迁延，当然立法本身要科学，不能只求速度。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和司法机关的作用。只有赋予广大市场主体对行政法规等的完整的诉权，使市场主体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以诉讼的方式废止各种制造玻璃门的抽象行政行为，才能使体制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迅速推进，使市场主体发挥出最大的活力，创造最大的红利。

中国人口的旧常态已经过去，新常态就要到来，急需终结现行的“一孩”政策。

“单独二胎”远远不够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一项决定：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实行了数十年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终于有了松动。此后，各地方陆续修订地方计生条例，落实“单独二胎”新政策。从政策宣布实施至今已一年有余，但各地并未如预期那样出现生育潮，远未达到延续“人口红利”的作用。

中国正站在“低生育率陷阱”的边缘，因此计划生育不能再以控制人口为目的，应尽快全面放开“单独二胎”。

实施效果不如人意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在过去十几年，关于生育政策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各界争论非常激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都是纸上谈兵，缺少实践来验证各自论点的对错，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现在终于有了实践来验证。

当然，我不赞成“单独二胎”政策，因为“单独二胎”有两大弊病：一是不公平，二是难操作。比如申请者是不是“单独”就难以确定。这需要申请的夫妻拿出独生子女证，但多年过去，证书可能早已遗失。而且即使有证书，也不能保证他们的父母后来没有再次生育。另外，现在人口流动很大，假设小两口一个是河北人、一个是四川人，都在北京工作，还得跑回各自的老家去办手续。

但是，如果再因此争论，生育政策调整就又不能启动了，又会耽误下去。所以不管怎样，能启动就好，这样就有了实践。

至于这是否标志着生育政策开始了重

大转折，我只能说，实际上“单独二胎”开始得非常谨小慎微，对可能发生的所谓人口反弹非常担心，号称每年要增加200万新生儿，所以一面是开放，一面是非常担心，这种忧虑并没有消除。

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单独”夫妇有约1100万对，截至2014年5月31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共有27.16万对，仅占符合条件的不足2.5%。国家卫生计生委在11月7日的发布会透露，全国有70多万对提出申请，仅占6.4%。

从政策实施效果看，不管是东部、中部、西部，还是城市、农村，申请率都非常低，各地符合条件的夫妇前来申请的，基本都在5%左右，而且因为年轻人没时间，很多是爹妈代替孩子来申请的。

从实践效果能看出，“单独二胎”政策

还是太谨慎了，应该全面放开二胎。对此，人口学者曾在2004年和2009年两次给中央写建议书，呼吁应该赶快调整政策，刻不容缓。但是有些人说，这都是扰乱工作，混淆舆论，一旦真的生育政策放开，还不知道出现什么情况，人口可能就失控了。

之前有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符合“单独二胎”政策条件的夫妇一共有1100多万对，因此在5年内每年会多生200万人。其实很多调查研究包括国外的经验都表明，有生育愿望不等于最后真的生了。

而且还有一种规律性的人口现象：在高生育率下，往往实际生的孩子数高于人们的愿望，比如避孕不到位，或者考虑到婴儿夭折而多生等等；而在低生育率下，往往实际的生育行为低于人们的愿望，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泰国等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低生育率陷阱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在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指该人口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一般来讲，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新生人口是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和其伴侣数量的）仅有1.1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

对这个数据，各方有很多争论。但是，天底下就没有百分百准确的数字，问题是我们把统计当会计。中国现在处于低生育率状态，我们不过是把这种客观状态用一个量化的数字来表述而已。结果大家都盯在这个数字上，说不是1.18，是1.28、1.38，但即便是1.58也还是低啊！

当前最要紧的是，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来继续干预人们的生育权利，只让生一个孩子？假如这代人
不生孩子，这个社会就断掉了，社会都完蛋了，还谈得上什么人口规模问题？假如这样继续下去，很可能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会减少一半。



包括一些媒体,不是澄清人们的误解,而是在加剧人们的误解。媒体很喜欢报道这种题材,说根据某某机构的研究成果,这是不准确的,应该加两个百分点,显得很准确、很客观、很平衡。但是这种报道根本没抓住重点,把读者都搞糊涂了。更是因为这种争论干扰了决策。

而且,即便现在有了这一年实践的检验,争论还是在继续。有人说,真理还没到来呢,因为实践的时间还不够,家庭还没考虑好生不生。那么再过一段时间会发生什么呢——2015年也还不算,因为是农历羊年,传统观念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所以也不能反映真实情况。那就再过一年。

但是这样一拖再拖,时间都被拖没了,将来产生的后果只会越来越严重,应对起来将越来越困难,中国有可能会落入“低生育率陷阱”。

韩国、日本、新加坡、法国、俄罗斯等国面对生育率低下,采取许多措施鼓励生

育。但是管用吗?不管用。现在有一个说法:想让人生孩子,比想让人不生孩子更困难,而且更花钱。所以叫做“低生育率陷阱”,一旦掉进去,就很难出来。

全世界的低生育的国家,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成功回到生育更替水平(即同一批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以及她们的伴侣,这需要总和生育率至少为2.1)。

在韩国政府大力鼓励生育的背景下,韩国2009年的总和生育率仍仅为1.19,“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但是中国2010年的数据一出来,韩国就相形见绌了。

现在看来,中国可能也逃不出各国的规律。

低生育率的形成有众多因素,比如晚婚晚育、不孕不育,以及社会生活目标增多等。后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年轻人现在想做的事情太多,工作也要完成,球赛也要去看,朋友婚礼也要到,假期旅游也不能错过,什么都想要。“本来我是想生孩子,但是没时间。”

▶ 2014年8月7日,北京,三名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喂食公园内的鸽子。

慢慢年龄大了,就错过最佳生育期了,结果实际的生育就会比想生的少。

过去女孩子长大就结婚生子,而且是生多个孩子。现在的社会环境下,生一个孩子就要耽误一年半时间。“看着同事同学不断晋职加薪,自己在家大肚子,我着急啊。你让我再怀一次,那我赶也赶不上了。”很多女孩子会觉得,生两个的话,这一辈子就报销在两个孩子身上了,自己的价值无法实现了。这就导致了低生育率。

有何理由继续“一孩”?

而中国低生育率的后果最终是由今天的“80后”、“90后”来承担。当这一代年轻人变老后,面对的就是老年人群庞大、劳动力短缺、退休金运转困难等社会问题。将来不仅是养老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失去朝气和创新精神的问题。



续实行一孩政策，与此是没有关系的。

当前最要紧的是，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来继续干预人们的生育权利，只让生一个孩子？假如这代人不会生孩子，这个社会就断掉了，社会都完蛋了，还谈得上什么人口规模问题？假如这样继续下去，很可能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会减少一半。

当然，地球不是人越多越好，我们不赞成生的孩子越多越好，也不赞成中国人口越多越好。但是，即使要减少中国人口，也不可能靠继续降低生育率来解决，因为现在的生育率已远低于更替水平，靠计划生育来减少出生、放慢人口增长的作用已经结束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继续要求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谁也没说一孩政策要永远继续下去，但就是拖。

大家应该看到，中国人口的旧常态已经过去，新常态就要到来。假如一孩政策还不能终结，就说明中国还是以控制人口出生为中心的思维。

如果我们现在不赶紧行动起来应对人口问题，拖到将来挽回会更难。因为将来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和以前会完全不一样。将来中国人口问题有几个特点：一是生育率会很低，二是老龄化很严重，三是城市化很高，四是人口流动性很高。这四个特点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没有的。但是很多人的思维还沉浸在原来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上，没有看到新的形势的到来。

这一年或者不到一年的“单独二孩”政策的实践，应该使人们惊醒了。越晚醒就越后果严重。

那么我谈这些是否意味着将来中国社会就黯淡了？不是。人类的潜力是很强的，人类历史就是在应对各种挑战中不断地发展。只要我们好好去应对，就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认识、不准备、不应付，这就麻烦了。其他国家已经有了教训，我们为何还不预见，还要重蹈覆辙呢？

等到那时，再放开生育是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因为刚出生的孩子要20年才能长大成为劳动力。

现在包括年轻一代，大家都没感到天边有乌云。但年轻人以后，要赡养好几个老人，还要抚养孩子。等现在的年轻人也老了，他的一个孩子如何养这一批老人？所以老人多倒不可怕，问题是孩子少了。

所以我也呼吁年轻人，要趁现在有好的生育年龄和物质条件，再生一个孩子，将来才会有更好的财富传承和抚养比。

中国实行“一孩”政策在30年前是应急之策。那时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都想从各方面把经济恢复起来，包括少生孩子。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讲的话是很恳切的：国家现在有困难，大家能不能做点牺牲，帮帮忙？到30年以后，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但是现如今，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继续实行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把计划生育变成只生一个孩子，迟迟不能放弃这个政策，这到底是对个人好还是对家庭好，对国家好，还是对未来好？

▶ 2014年2月20日，安徽合肥，女儿在妈妈的肚子上试着听她弟弟或者妹妹的响动。

当然计划生育是永远需要的，假如每个家庭都生四五个孩子肯定还是不行，那对家庭、对妇女、对孩子、对国家都不好。但是以控制人口为目的的计划生育已经过去了，计划生育的本意不是控制人口，而是为了解放妇女，使她们能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千年未遇的人口挑战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资源能承载的人口很有限，如果人口突破底线，中国就完蛋了。这类观点显得很高远、很宏观、很深刻，但实际上跟中国的现实毫无关系，不但把议题越弄越乱，更是把决策者的脑子都弄糊涂了，结果是把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全拖延下来了。

有人说中国像美国那样只有3亿人不是很好吗，美国、澳大利亚都是人少地多，都成了发达国家。但是，非洲也是人少地多，怎么没成为发达国家？日本人多地少，怎么照样是发达国家？

世界上关于地球能承载多少人口的研究，从10亿人到1000亿人都有的，各自都有其论述的依据。同样，中国的资源能承载多少人口，可以继续争论下去。但现在是否要继

文 / 薄智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记者 / 李克难 (采访整理)

现在反腐本身并不太难,关键在于反腐怎样能够制度化,形成一个氛围既不敢贪又会做事,让反腐与体制内的激励机制相结合。

2015反腐展望: 要防止反弹和“避风头”

反腐往往“有得有失”,有人落马就有人被提拔。从副国级以上的四个“大老虎”来看,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以及令计划,在政治上已经是过气或是边缘化了,将他们“拿下”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他们曾身居要职,尽管现在已经有人替代,拿下他们的影响依然巨大,因为牵扯到其他的关系非常复杂。

周永康涉及到石油帮、四川帮等一系列的人。徐才厚因为从1999年开始担任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2002年成为部长,一直负责军队人事工作,包括高级干部的提升。从1999年到2012年间,他曾提拔了相当一批人。现在令计划被查影响也非常大。他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涉及面也广。从1978年到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第一次被“拿下”。

另外,苏荣案也不应该被忽视。他本身也是副国级,出身吉林,曾担任甘肃省委书记、青海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也做过中央党校副校长,交往面很广。

反腐拿下“大老虎”需要一定的艺术。中国的腐败常常是窝案,一个“大老虎”可能牵涉到很多,2013、2014年反腐声势浩大,而到2015年是否会延续这样的状况,还是出现反弹,需要进一步观察。

中国官场过去有一种潜规则:如果某个官员在某个重要场合露面,或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则表明他已经安全着陆了。但2014年出现一个新的现象是,无论是在媒体上露面还是发表文章,都不一定意味着某人的安全。令计划2014年12月15日在《求

是》上发表一篇4000多字的长文,但七天之后仍被拿下。按以前的规则,如果令计划要被拿下,他的文章也不会在《求是》上发表。再如2013年1月20日,徐才厚还和习近平一起接见军队老干部,之后很快被拿下。周永康曾参加石油大学的校友活动,不久也被拿下。还有如山东的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还在大会上发言坚决支持反腐时被拿下。这说明之前的潜规则已经被打破。

这说明,现在各种“表忠心”或“现身”的举动也不能保证某人不会被拿下,这可能造成一种不安全感。一些贪官可能选择自杀,让自己的家人过关。另一方面,这些人也可能会选择反抗,对案件进展甚至办案人员的安全产生威胁。2015年,需要观察这样的反弹是否会出现。

从被拿下的59个省部级官员来看,一部分主要集中在跟周永康相关的石油帮、

四川帮,从部门来讲,以刘铁男为首的发改委成为重灾区。现在落马官员中跟徐才厚有关的还很少,如果军队的反腐全面铺开,2015年可能会有一系列的人被挖出。

从未来的发展看,现在云南前省委书记已被拿下,现省委书记已调离,可能未来在云南会有进一步深挖的动作。

现在反腐本身并不太难,关键在于反腐怎样能够制度化,形成一个氛围既不敢贪又会做事,让反腐与体制内的激励机制相结合。中国人很懂得“避风头”,在现在的风头上没人敢再贪,但官员不作为却成为一个弊端。

“有得必有失”,有人下台自然需要有人填补空缺。

目前官员提拔也打破以前的常规。以前人员提拔多是从党的机构中进行提拔,比如从一个省的副书记到另一个省担任代理省长,再到省长。现在则是从副省长调任到各省担任党委常委。

通常来讲,一般提拔都需要很严格的考核,而在现在的非常时期,反腐留下如此多的空缺,非常时期补上这些空缺未必能够按往常程序对一个人进行综合考核。除了看他过往各个方面的政绩,更多的考量包括这个人是否可靠,是否忠诚。

总的来讲,从2012年以来,习近平对反腐非常重视,反腐力度空前,其效果也显著。但反腐还没有制度化、法制化,更多还是以党的机构来进行,通过其内部运作在进行,反腐还更多停留在党的层面。如何将反腐纳入法制轨道,尚需大量工作。

□ 编辑 路琰 □ 美编 黄静

2014年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是,无论是在媒体上露面,还是发表文章,都不一定意味着某人的安全。各种“表忠心”的举动,也不能保证某人不会被拿下,这种情况可能造成一些贪官的不安全感。

2014肃贪反腐年度盘点

2014年落马省部级(及以上)官员

截止于2014年12月22日 综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人民网等信息

总计 **40** 人

时间(以接受组织调查为准)		落马官员	落马前最后职务	所属系统
第一季度(6人)				
2月(2人)	2014年2月19日	祝作利	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政协系统
	2014年2月27日	金道铭	山西省委副书记、第十二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3月(4人)	2014年3月9日	沈培平	云南省副省长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3月15日	徐才厚	中央军委副主席	军队系统
	2014年3月22日	姚木根	江西省副省长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3月31日	谷俊山	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军队系统
第二季度(10人)				
4月(3人)	2014年4月12日	申维辰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学术团体
	2014年4月17日	宋林	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国有企业
	2014年4月24日	毛小兵	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5月(2人)	2014年5月3日	谭栖伟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人大系统
	2014年5月26日	阳宝华	湖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政协系统
6月(5人)	2014年6月3日	赵智勇	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委员、省委秘书长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6月14日	苏荣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政协系统
	2014年6月19日	杜善学	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6月19日	令政策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政协系统
	2014年6月27日	万庆良	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第三季度(15人)				
7月(7人)	2014年7月2日	冀文林	海南省副省长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7月8日	谭力	海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7月12日	张田欣	云南省委常委、委员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7月12日	韩先聪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政协系统
	2014年7月20日	武长顺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	政法系统(政协系统)
	2014年7月24日	陈铁新	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政协系统
	2014年7月29日	周永康	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 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	政法系统
8月(5人)	2014年8月23日	陈川平	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8月23日	聂春玉	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8月29日	白云	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8月29日	白恩培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云南省委书记	人大系统
	2014年8月29日	任润厚	山西省副省长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9月(3人)	2014年9月15日	孙兆学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 曾任中国黄金集团总经理	国有企业
	2014年9月17日	潘逸阳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9月21日	秦玉海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人大系统
第四季度(9人)				
10月(3人)	2014年10月11日	何家成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学术系统
	2014年10月11日	赵少麟	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10月23日	杨金山	成都军区副司令	军队系统
11月(3人)	2014年11月20日	梁滨	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11月27日	隋凤富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	人大系统
	2014年11月28日	朱明国	广东省政协主席	政协系统
12月(3人)	2014年12月18日	王敏	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12月22日	韩学键	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2014年12月22日	令计划	中央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政协系统

地方党政领导成员

19



- 政协系统**
- 苏荣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曾任江西省委书记
- 令计划
中央政协副主席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 朱明国
广东省政协主席
- 祝作利
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 阳宝华
湖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
- 令政策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 韩先聪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 陈铁新
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 人大系统**
- 白恩培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
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
曾任云南省委书记
- 谭栖伟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秦玉海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
- 隋凤富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
- 军队系统**
- 徐才厚
中央军委副主席
- 谷俊山
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 杨金山
成都军区副司令

- 政法系统**
- 周永康
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原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
- 武长顺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 学术系统**
- 申维辰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 何家成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 国有企业**
- 宋林
华润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
- 孙兆学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
原中国黄金集团总经理

注：图中所列职务均为贪腐官员落马前最后职务。

腐败问题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即治本来解决，而不能单纯通过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和强度，即治标来解决。

“高压反腐代价不小，但付得起”

专访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2014年，中纪委主导下的反腐败，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打虎”不手软，“拍蝇”不留情，“猎狐”虽远必追。

岁末的12月22日晚8时，新华社通过微博发布，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接受组织调查，成为十八大以来第4位副国级以上落马高官。此前3位分别是苏荣、徐才厚和周永康。

2014年的高压反腐成效显著，影响深远，以致于在刚刚结束的“汉语盘点2014”中，“反腐”当选年度国内词。

2014年反腐有哪些特点？对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尚待解决？《凤凰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

“四两”拨千斤

记者：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进行得如火如荼，特别是2014年以来，一大批高层干部被查处。你怎么看2014年反腐败所取得的成效？

李永忠：这两年中央所进行的反腐，决心之大，力度之强，程度之深，涉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效果之好前所未有。过去人们总纠结于真假反的问题。通过这两年的高压反腐败，包括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这样的正国级干部落马并被绳之以法了，人们对真假反已经少有疑虑了。

反腐使得一些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请客送礼、炫富摆阔、追求豪华都有所减少，甚至奢侈品、高档烟酒的销售额也在下降。高档酒店、高档会所门可罗雀，

有的甚至已经关闭了。

过去攀附权贵、和大款交朋友、和高官拉关系，成为一些官员的炫耀资本。在高压反腐态势下，炫耀自己手中的权力和金钱的现象有所收敛。过去部分官员甘于被有钱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风气已经明显降低。

军队反腐尤为突出。从徐才厚、谷俊山、杨金山等高级将领被查，使大家意识到军队并非法外之地。军队反腐让军队的战斗力很好地恢复，军队形象开始重塑。对军队的查办，对军队文艺团体的清理整顿，让大家感觉到一个比较好的转变。

过去“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娼”的风气通过这两年认真反腐败得以遏制，有了以廉洁为荣、以贪腐为耻的风气转变。相当多的贪腐官员开始收敛、收手。

记者：反腐败的这些成绩及其带来的社会风气变化，是如何获得的？关键在哪里？

李永忠：主要是与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四两”拨千斤的战术获得成功有关。“四两”就是中央与纪委进行的一系列体制改革。

在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反腐败体制方面，明确“两个责任”，即党委的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这是第一个“两”，突出的是抓定位。

第二个是“两为主”，突出的是抓重点：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这样上收纪委的人权与事权。上级纪委虽然没有控制下级纪委的财权和物权，但对人权事权的领导已足以实现有效的领导。

有了有效的领导，即使一头狮子率领一群绵羊，也能打败一只绵羊率领下的一群狮子。

第三是“两个全覆盖”，突出了抓条块：一是“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二是“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过去我们5年才能把全国31个省巡视一遍，现在加快了进度、明确了责任，两年就把31个省巡视了一遍。而且还腾出时间和精力，在2014年的最后一个月，13个专项巡视组还进行了专项巡视。相对于常规巡视来说，专项巡视是最能发挥作用的，因为它针对的是具体的人和事。

前不久中央发文，对中办、国办、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和全国人大、政协七个过去一直没有派纪检组的决定新增七个纪检组。尽管对中央国家机关，中纪委应该派驻的有140多个单位，过去只派了52个，加上这次新派的一共才59个，连一半都不到，但毕竟对这些要害部门和核心机关实现了派驻，就预示着更全面的对“条条”的覆盖肯定也会分批地去进行。

第四个“两”则是两头打，一头“打苍蝇”一头“打老虎”。尽管才两年时间，大家都感受到反腐效果之好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四两”拨千斤战术取得的成效。

不能一叶障目

记者：最近中纪委宣传部的专题片《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得到广泛传播。这一方面是不是与中纪委在文宣方面的调整有关

系? 另外一方面, 您觉得今后作风建设的可持续性如何?

李永忠: 在腐败愈演愈烈的态势下, 强力打击腐败很重要。强力反腐需要文宣上的配合来树新风、树清风。你不能只是查案子, 还需要在风气上形成影响。目前这种比较好的宣传态势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但我们的这种宣传不仅要普及, 更要有提高。就像我前面讲的, 我们反腐败取得的显著效果, 目前还是治标为主而不是治本为主; 是通过上面强力惩处, 而非通过同级异体监督而取得的; 是通过中央巡视组, 而非省级纪委揭发出来的。在市一级则是通过省一级巡视组巡视发现的。从主体上来看, 是通过40多万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纪委加上审计、检察等职能部门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取得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参与度较低, 当前还没有给群众反腐提供有效的平台和方便的渠道。

宣传不仅要看到成绩, 还要看到现在的成绩依赖于大量腐败存量的存在。两年来, 我们公布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61个, 以前每年都查不了多少而现在两年就查了这么多, 是因为腐败高官不少, 因而能比较容易查到。这些被查处的省部级及以上高官, 查处的偶然性远低于他们滑向腐败的必然性!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指出, 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 要把种输不起的意识灌输进来。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的话, 那大家可能就会一叶障目, 看不到潜在的风险。

作风上的转变很重要, 但是我们要铭记邓小平30多年前的那句话: “制度问题不解决, 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是邓小平作为经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那么多年的磨难总结出来的掏心窝子的至理名言! 所以认为通过查贪就能解决思想问题、作风问题是错误的, 必须通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才能解决。他讲的不是一个省委、市委、县委, 也不是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的问题, 而是讲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领导制度的核心就是权力结构。权力结构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的作风改变

才能有所依托。

付得起大代价

记者: 高压反腐中“大老虎”频频出现, 陆续公布的涉案金额非常惊人, 在中共党内会不会产生一些担心, 说反腐打得过分会影响执政党的权威?

李永忠: 首先我们应该看反腐败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习近平讲话中的描述是: 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 呈“胶着状态”。什么叫胶着状态呢? 就是双方都有赢和输的可能性, 但双方都还没有办法赢, 僵持在那里就叫胶着状态。在反腐败一线的最高指挥员,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当反腐败取得如此大的成效的时候他说的仍是“输不起”。

王岐山曾说“查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 对党组织的伤害远大于其个人付出的代价”。我们每查一个案件, 党组织都会受到一次伤害, 越查我们越受伤, 但即便这样我们也要查下去。一边是原政治局常委、原军委副主席的案子, 一边是小官小吏的案子, 都照查不误, 照样公布。因为我们懂得, 面对如此严峻的腐败态势, 必须通过高压强力反腐, 才能真正赢得党心军心民心, 为此我们也必须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我们也必须敢于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但如果以为用这种方法就能解决腐败问题的话, 那就错了。腐败问题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 即治本来解决, 而不能单纯通过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和强度, 即治标来解决。因为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仅仅依靠查案就

把腐败遏制住的, 古今中外都没有。

不仅如此, 在查腐败案件过程中, 反腐败机关也可能被腐蚀。常言: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何况权力本身就倾向于腐败! 如果自身不改革, 以反腐败来搞腐败的现象仍会出现。

腐败官员能形成这么大的存量, 体制和制度的原因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的权力结构不是那么集中, 选人用人体制不是那么落后, 就不会积累起这么巨大的腐败存量。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语)的问题, 不解决官员向上负责很难向下负责的问题, 滋生腐败的土壤就还存在。被枪毙的贪官不服气, 坐牢的贪官不服气, 受党纪国法处罚的贪官也不服气。因为比他们问题严重的有的是, 为什么他们被查处? 所以他们不服气。

按理说小官是不可能巨腐的, 但我们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就把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了。假设省委书记的权力是100, 但对省委书记的监督远不到100, 那么省委书记可能会大贪。村支书的权力可能只有1, 但如果对他的监督等于0的话, 1比0仍然是无限大的, 因此小官只要他握有相当多资金、资产、资源, 而且又没有监督, 必然大贪。小官巨腐能在中国出现不是小官的素质问题, 是说明我们对小官的权力结构、用人体制监管不力, 使得小官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我们多年沿用苏联模式的悲哀。

我们欣喜地看到, 习总书记在2014年1月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第一次提到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提出以深化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 不再只满足于加大反腐力度、强度和烈度。因此王岐山在2014年5月份提出反腐的重点已经转为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这就构成了下一步反腐败斗争的重点, 同时也为相当多的问题贪腐官员留下“金盆洗手”的时间和空间。

如果我们的权力结构不是那么集中, 选人用人体制不是那么落后, 就不会积累起这么巨大的腐败存量。

希望中国互联网增强自由竞争的创新活力,发挥体制的弹性和包容,努力通过对话沟通降低社会转型的成本。唯其如此,互联网才会成为推动中国向前和向上的伟大力量。

中国互联网的三大隐忧

2014年,中国互联网继续保持了令人振奋的发展势头,最突出的特点是移动互联网的全面兴起。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PC整体使用率(80.9%)。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披露的数字,中国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78.5%提升至83.4%。越来越多用户从PC端向手机端转移,55%的手机网民因为使用手机减少了对电脑的使用。中国每天上网4小时以上的手机网民比例达36.4%,相比2013年增加了16.4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每天有2亿左右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超过4小时,对PC端已经产生重大冲击。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舆论场。

另一方面,中国3亿的网购人群已超过英、法、德、意四国人口总和。在2013年底,中国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从2006年到2013年,网络零售复合增长率达到90%,2013年的总量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这个强劲市场催生了全球市值排名第二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市值超过2300亿美元。上市融资额达217.7亿美元,是美股史上IPO金额最高的企业。其后阿里巴巴市值一度突破3000亿美元(18373.2亿元人民币),逼近名列全国第二的北京市的GDP(19500.6亿元)。

互联网的强烈冲击波,造成一个一个产



2014年11月17日,北京早高峰地铁上用手机浏览网络打发时间的乘客。

业的电商化。如同凯文·凯利所说,“新经济的目标是一家公司接一家公司,一个产业接一个产业地摧毁工业经济中的一切”。互联网不仅创造了全新的商业消费模式,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到此前看似距离互联网甚为遥远的产业的城池面前,成为“大门口的野蛮人”。互联网金融产品“余额宝”开户数破亿,截至2014年上半年规模达到5741亿,把各大银行吓出一身冷汗。以微信、手机QQ为代表的OTT服务对电信运营商的核心业务产生严重威胁,互联网企业整体市值第一次超越传统电信企业整体市值。中国移动2013年销售收入1005亿美元,是阿里巴巴的15倍,市值却只比阿里上市时略高一点。大部分移动互联网企业的市值都是其销售收入的10倍甚至20倍,而电信运营商的市值却不及其销售收入的两倍。互联网上市企业市值突破3.95万亿元人民币,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4家企业

进入全球互联网公司十强;它们挟互联网和资本之威,正在把触角伸到各个领域:从媒体出版到广告营销;从物流、交通到餐饮、旅游;甚至从医疗、教育到更为“沉重”的金融、能源、房地产和制造业。

然而,一片高歌猛进之中,尚有隐忧存焉。择其大者,主要有三:

垄断造成的企业创新隐忧

互联网时代呼唤的是开放、包容和自由竞争,互联网也应该是协作和共享的平台。可是,与之背道而驰地想要一家独大的垄断逻辑却开始在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竞争中逐渐显现,并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观察产业现实,更准确地说,中国的互联网不是一家独大,而是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家独大。它们彼此采取很多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中国互联网不能完全互联互通。阿里巴巴“从数据接口切掉一切微信来源”;新浪微博禁止进行微信公众账号推广;微信屏蔽来往分享链接、快的红包,腾讯被指“选择性开放”;淘宝则不仅屏蔽微信的链接跳转,也排斥其他的导购外链,同时还屏蔽百度的抓取。在这个过程中,屏蔽甚至成为这些互联网公司心照不宣的共识。这一方屏蔽那一方,是不愿意为其贡献流量,那一方屏蔽这一方,则是要成就自己的“入口”规模——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可是,在这些你来我往的狙击中,用户的利益何在?

2014年是整个互联网行业集中度急剧升高的一年,阿里控制电商入口,百度领先搜索入口,腾讯主导社交入口。BAT展开了密集的并购、投资和合纵连横,互联网生态格局愈

发呈现出BAT赢家通吃的局面。中国互联网的版图在三家的频频动作下日渐分明,然而,这是否会导致基本的自由竞争属性的丧失?

不得不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家的竞争策略充斥着远古时代的荒蛮气息,以资本为铁蹄,以战略版图的疆界为诉求,压缩小型创新团队的成长空间。对于小公司而言,创新本身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成为三家战略版图中的一块。由此造成的现实情况是,它们一拥而上地追逐某种可能让BAT感兴趣的模式,大量资源拥挤其中,造成整体创新资源的失衡。

监管造成的产业发展隐忧

2014年一系列监管措施出台,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开始将互联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2013年末,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16字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在北京成立,组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担任。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互联网管理的领导者仅仅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全国互联网站管理工作协调小组(简称“互联网协调小组”)。

2014年8月,国务院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并负责监督管理执法。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如何“依法治网”,成为网信办的重要课题。澎湃新闻称,在“依法治网”这一主题指引下,网信办已打出一套集倾听、修规、惩处和招贤于一体的绵密组合拳。

2014年9月,网信办主任鲁炜也在采访中表明,“再好的车都要有刹车”,直言互联网管理中制动机制的必要性。他同时指出,互联网的管理在中国的底线思维就是遵守中国的法律,具体包括: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中国消费者的利益。

在“革命”和“战斗”文化的浸淫之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话语惯性,导致人们在网络上很难展开公共说理,凸显了公民理性的缺失和民主对话的低能。

互联网的确需要通过法律和政策面的因素制约一些不健康的或者有危害的内容,但是在采取这些制约的同时需注意,它们不应该成为对互联网创新和活力的束缚。例如,在互联网电视行业,比起当下严格监管所造成的市场萎缩,也许更需要的是制定统一的规则让市场自由发展,政府应做好“裁判”而不是“守门人”。再如,“微信十条”的出发点是为了净化微信生态环境,但需防止微博的前车之鉴——管制过严造成平台活力的大幅下降。

管制本身具有自我增强的特性,只要有了一个开端,制度和约束总是趋向于越来越繁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严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网上自生自发的力量产生伤害。回顾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开拓史,“先发展、后管理”的理念和规制路径对于探索 and 实验,无疑形成了最佳保障。我们希望中国互联网发展20年之后的路径,能够保持那种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相对结合较好的传统。

戾气造成的社会建设隐忧

互联网为中国人历史性地提供了表达空间,却未能造就理想的言说环境。戾气十足的公共对话遍及朝野:名人对骂,公知约架,只有站队,不见是非;高官骂不爱国的人是“败类、人渣”,主流媒体称揪出的“大老虎”为“叛徒”、“国妖”,网络语言的粗鄙化对互联网形成公共领域的的能力构成严重挑战,也使寻找社会共识的努力格外艰难。

当下网络的整体粗鄙化,是全社会弥漫

的戾气在互联网空间的真实折射,也与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和挑战息息相关。如果说前两个隐忧是互联网本身存在的问题,那第三个隐忧则是互联网作为媒体投射出来的社会现实问题。属于互联网自身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技术的、法律的手段予以解决,但属于社会的问题,只能通过社会建设和治理,才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一场又一场的骂战喧嚣终会平息,但它对于互联网生态带来的损害却是长期的。在“革命”和“战斗”文化的浸淫之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话语惯性,导致人们在网络上很难展开公共说理,议论和批评动辄变成人身攻击和意气之争,凸显了公民理性的缺失和民主对话的低能。互联网对话,追求的应该是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价值,而不是唯我独尊、压制异见,更不是语言暴力的宣泄。专研博弈论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约翰·奥曼证明,如果人们能够充分交流,而且都是理性的,那么人们之间不可能在给定事件的判断上存在不一致。换言之,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二人达成一致。由此,如果争论不欢而散,那么其中必然有一方是虚伪的或是有偏见的,这种偏见使得他们漠视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或与已形成的观念不相符的信息。互联网中的对话,只有在理性和真诚的态度下,才可以成为自由且可持续的。

2015年,中国的网民数量预计将达到7亿,两倍于美、日两国网民总和,普及率超过50%。对比互联网普及率在发达国家达到78%的高比例,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仍然拥有辽阔的空间。我们希望,中国的互联网在新的成长中,能够克服以上三种隐忧,增强自由竞争的创新活力,发挥体制的弹性和包容,努力通过对话沟通降低社会转型的成本。唯其如此,互联网才会成为推动中国向前和向上的伟大力量。 □ 编辑 李光 □ 美编 黄静



貳

台港澳

台湾2014：公民团体决定政治议程

香港：送走激烈博弈的2014

澳门：表面平静实则暗潮涌动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Bucee 杂志馆 | Bucee.net
TAIWAN /
台湾

一些公民团体中，最先发声的是青年世代，由于在2014年一头一尾展现出了巨大的政治能量，青年团体发现了他们的政治价值，并要求下修投票年龄。

台湾2014：公民团体决定政治议程

年终岁末，新科台北市长柯文哲公布了他“小内阁”的成员名单。来自公民团体“人民火大联盟”的秘书长赖香玲成为了新任台北市劳工局长，从街头走进市政府，颇引人注目。

而在苗栗，“太阳花学运”领袖、公民团体“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领导人陈为廷也有望参照柯文哲模式，以无党籍的身份代表绿营参加2015年初的“立委”补选。2014年，从年初的“太阳花学运”到年底的“九合一”大选，台湾公民团体大放异彩无处不在，几乎决定了一整年的政治议程。

年初：“太阳花”占领“立法院”

马英九2013年发动“九月政争”时，绝对不会想到自己的“报应”会以一场学运的形式到来。2014年三月，因为不满马英九以党纪绑架“立委”，强行两岸服贸护航，一个主要由大学生组成、名叫“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公民团体强行进入“立法院”，霸占议场逾一个月。

对于“太阳花学运”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记者在采访时听到各种说法。根据国民党“立法院”党鞭费鸿泰的说法，“太阳花学运”背后就是民进党：“民进党党鞭柯建铭曾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国民党这个会期通过服贸法案的概率是零，你们不要想了。”

但在民进党和霸占议场的学生看来，虽然“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和民进党关系

十分亲近，但是其占领议场的举动更多的属于公民自发性质，而非民进党的操纵。

虽然台湾“立法院”原则上欢迎公民、记者随便出入，但作为神圣的“国会”殿堂，“立法院”内部的议场只限“立委”出入，即使是“立委”的贴身助理，也要在“立委”的带领下进入议场。

因此，在整场学运中，民进党“立委”为了方便学生出入议场进行换班，只好在议场大门外轮班，每当有学生进出议场时，民进党“立委”都要向警察表示这是自己带进来的学生。对此，不少民进党“立委”曾经抱怨，自己成为了学生们的“看门狗”。

相比之下，比“立委”层级更低的民进党议员及其他政治人物连“看门狗”的资格都没有，只能从事一些诸如维护交通、发放便当的杂事。整场运动的主角非公民团体莫属。

“太阳花学运”在3月30日迎来高潮，据主办方统计，共有超过50万的民众身着黑衣，占据台“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和周边街道，成为了马英九时代最大的一场群众抗议游行活动。活动开始之前，《凤凰周刊》记者问学运组织者林飞帆：“会不会邀请民进党参加”，林飞帆回应：“学运不主动邀请任何政治力量参加，但如果他们愿意来，我们也不反对”。

在3月30日的大游行中，蔡英文、苏贞昌等民进党大佬均有出现，但都安静地坐

在群众的角落，既没有接受民众的欢呼，也没有登台发表演说。如果将陈水扁时代的“倒扁运动”归为由政治人物发起的群众运动的话，那么2014年这场“3·30”游行将是台湾民主化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纯公民运动。其在台湾社会掀起的“反中、反资本、反权贵、反全球化”思潮几乎贯穿了整年，并对未来的2015都会有明显的影响。

年末：网友串联颠覆国民党

年底的“九合一”大选，国民党遭遇到“继失去中国大陆后最大的一场失败”。这场选举过后，国民党以前执政的13个县市仅剩5个，总得票数比马英九2008年的巅峰整整少了480万票。

选举之后获得大胜的民进党，则一反常态的低调。党主席蔡英文表示：“全党要以戒骄戒躁、如履薄冰的心态看待这次选举结果以及未来可能执政的局面”。根据民进党内部传出的评估，此次选举虽然被定义为“民进党建党以来的最大胜利”，但民进党的总得票数并没有大涨。蓝绿势力的消涨根本原因是国民党被选民抛弃，而非拥抱民进党。

同样，国民党内部对选举的评估也是如此：选后两周，国民党拿出的败选报告称，整场选举失利的罪魁祸首是婉君表妹（网军的谐音）和媒体名嘴。

国民党表示，由于忽视了对网络舆情的观察，致使网友对国民党的观感和评价

十分负面，影响到了党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形象，进而影响了得票总数。以台北市为例，29岁以下选民对连胜文和柯文哲的支持比为惊人的二比八，而台北一直被认为是蓝绿比六四开的地方，年青一代的网民在逐渐改变台湾的政治版图。

选举之后，一个十几人组成的青年团队开始在台湾四处演讲。这个团队号称正是自己的网络营销，最终让柯文哲战胜了连胜文。台北市长选举期间，连阵营在电视台投放近十条电视广告，而柯阵营只有一条。相比之下，柯阵营在网站上投放的广告数量远多于连胜文，点击率也比连阵营的多出很多。

另外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民也开始反思他们的举动。根据这些网友的说法，他们原本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由于看下去马英九的糟糕执政，于是通过手机和网络串联，表示以不投票或者投废票的方式给国民党一个教训，“打马英九一个巴掌”。但当选举结果最终出炉之后，这些蓝营的支持者也表示没想到网络的力量如此强大，对国民党的这一巴掌“下手有点重”，原本只是想教训一下而已，没想到最终却“差点把国民党打死”。

2015: 公民团体或成第三股势力

在国民党、民进党两党几乎垄断了全台所有政治资源的情况下，宋楚瑜的亲民党、郁慕明的新党以及李登辉的台联党都曾经做出过扮演第三股势力的努力，也都曾在某个阶段充当过关键少数的角色。但在现有选举制度的情况之下，上述的几个小党都几乎无可避免地走向泡沫化的结局。

但“九合一”选举之后，台湾朝野上下纷纷表示愿意推动台湾由现在倾向于“总统制”的双首长制向“内阁制”转变。在此政治趋势下，一直试图涌入政治中心的公



► 2014年3月30日，台北“太阳花学运”达到高潮，组织者向示威的学生分发抗议标识物太阳花。

民团体开始发力，试图借此机会改革选举制度，要求进入体制内分享权力。

在这些公民团体中，最先发声的是青年世代，由于在2014年一头一尾展现出了巨大的政治能量，青年团体发现了自己的政治价值，并要求下修投票年龄，将现有20岁拥有投票权下修至18岁。即将成为国民党新任党主席的朱立伦已经明确表态支持这一修法，在未来的决策中也将更多地纳入年轻人的声音。

此外，试图进入“立法院”的劳工团体、环保团体等也都希望能够借由朝野两党可能“修宪”的便车，下调“立委”当选的门槛。现有台湾选举制度规定，在不分区“立委”选举过程中得票超过5%的政党可

以有2个当选席次，超过8%的政党可以有3个当选席次。这些公民团体希望能够下修这个门槛，让他们更容易进入“立法院”。

对于未来对选制的修改，决定权和麻烦都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手中。2016年胜券在握的蔡英文显然不希望更多人和她分享权力，但在过去几年一直配合民进党“倒马”的公民团体也在给蔡英文施压，要求其以下修“立法院”门槛的方式进行回报。2015年，民进党和公民团体的关系将会变得十分微妙。

当然，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修宪”过程中，主张“台独”要求更改“国号”“国歌”的公民团体也一定会发声，挑战北京方面的底线。如何平衡这类公民团体的声音，也考验着未来蔡英文和朱立伦的政治智慧。

□ 编辑 段宇宏 □ 美编 虎妹

HONG KONG /
香港

政改是2014年香港最重要的关键词，“占中”运动挑战了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占领运动目前已落幕，但这场博弈并未结束。

香港：送走激烈博弈的2014

2014年是注定要写入香港历史书的重要一年。香港政府与泛民阵营在政改博弈中，产生了激烈对峙，使得香港社会呈现裂痕。

“占中”者认为港府和中央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港府和中央认为“占中”违法，并担心境外势力利用这个事件，演变成“颜色革命”。

这场政治风暴将维持多久？港府未向抗议者妥协，没有响应占领运动的要求，2015年初将会启动政改第二轮咨询，在此刻似乎还看不到解决问题的曙光。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目前由学生主导的“占中”运动，2015年还会向港府发难。换言之，占领运动虽已落幕，但这场博弈仍未结束。

2014年1月1日，香港泛民主阵营一如以往，发起反对特区政府的元旦日大游行。主办方声称有3万人参加了游行，警方则估计游行队伍在高峰时段只有1.11万人。但无论如何，双方公布的游行人数均创出了近年同类型游行的新高，预示香港在2014年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

自从2010年中央政府同意香港在2017年普选特首后，近年香港社会在特首普选问题上一直争议不休。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在《信报》刊登一篇名为《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的文章，粗略论述了“占领中环”的原则、目标与方法，更在社会上引发了连锁反应。泛民主派扬言一旦政改方案过分保守，将会

发动“占领中环”抗争。

踏入2014年，泛民与特区政府的政改角力进入最后阶段，一步步落实“占中”的构思。5月6日，“占中”组织举行商讨日，逾2500名签了“占中”意向书的支持者投票选出学界、真普联和人民力量三个同样有公民提名成分的政改方案，并决定在6月20日举行民间公投，就政改原则立场最后表决。

6月20日，“占中”全民投票启动，并于九天后结束。据主办组织表示，有近80万人利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网站及前往实体票站投票。当中普选方案以真普选联盟的方案最多人选择，有超过33万票。

是次投票引起香港政界、社会及网上热烈讨论，也令“占领中环”的口号越来越引起部分港人的回应。“公民提名”开始变成了“占中”支持者们的主流意见。最初，香港人追求的是没有筛选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到后来，博弈的坐标轴产生了偏移，候选人门槛降到最低的“公民提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泛民阵营里的“政治正确”。

7月1日，民间人权阵线举行“七一”大游行，明确提出争取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要有公民提名。民阵表示，游行人数达到51万，创下过去10年的新高。当天晚上，学联及学民思潮在游行完结后，首次占领中环遮打道，为“占领中环”热身。警方于翌日凌晨展开清场行动，拘捕了511人。

在许多泛民支持者看来，过往抗议行

动——游行、变相公投、小范围堵路、绝食乃至光怪陆离的各种行为艺术，均效果有限，他们想要一种更具威力的抗争方式。把目标瞄准香港的金融命脉中环，用“占领”的方式使其瘫痪，无疑是当下最具爆炸力的手段。

面对泛民的步步进迫，中央政府猛然发现，原来有些港人把香港当成独立政权而非中国一部分来看待。北京越来越担心，香港人会选择一个对抗中央的特首，而令香港陷入无止境的政治内斗，于是决定选择更强硬的态度来响应，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是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对治港方针进一步明确，明言“两制”从属于“一国”，“高度自治”是中央给多少就有多少，“港人治港”也是有限的，爱国是对治港者的基本政治要求。

接着在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香港普选行政长官问题，以及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当中有关普选行政长官办法列明了四项规定。决议列明要成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按照之前行政长官选举规定，维持由四大界别比例组成1200人的提委会，并限定候选人为2至3名，每名候选人须获提委会全体委员过半数支持方可入闸。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无疑令泛民候选人参选特首选举无望。

与此同时，香港的建制派团体也纷纷



启动反“占中”活动。7月19日，“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收集签名行动，反对“占领中环”。大联盟在港九新界400多个地点设置街站，让市民签名，最后收集到140万个签名。

8月17日，“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又发起“反占中大游行”，吸引了19.3万人参加。分析指出，在过往，与泛民派唱对台戏的往往是建制派，但这一次，一些昔日不涉政治的中产阶级，也加入了“中环保卫战”。双方的战斗不仅仅发生在讲台前，也进入到小区里。

北京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令泛民止步。国务院发布香港白皮书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其直白的语言反而刺激了一些港人原本敏感的神经。

9月28日凌晨一点半，“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戴耀廷身处政府总部，宣布实时启动“占领中环”，并从集会人士聚集的政府总部开始“占领”，标志着这个宣传长达一年零八个月的运动正式揭开序幕。

当天中午，陆续有港人涌到政府总部附近的金钟添美道示威，并在下午四时半突破警方防线，成功占领夏慤道。至下午五时五十八分，警方在多次向现场示威者举起红色警告牌无效后，随即出动防暴警察，

多项调查发现，近年香港与内地交流远较九七回归前频繁，但香港人的港人身份认同感愈来愈显著。

在金钟道天桥及干诺道中一带施放多枚催泪弹驱散人群。但事与愿违，警方的行为反而触发更多港人上街声援示威人士。翌日，逾万名市民进一步分别涌到铜锣湾及旺角，成功堵塞两区的主要交通干道。

在之后的七十多天，香港政府与学生组织学联首度对话，但没有突破。此后“占中”历经清场与占据的反复轮回，部分占领者趋激进，不满占领的民怨也日增。这场政治博弈陷入持久战的状态，撕裂了香港。

12月15日，香港警方到最后一个占领区铜锣湾清场，留守者没有反抗，“高喊口号”后被警方拘捕。历时七十九天的“雨伞革命”，终于告一段落。清场过后，旺角、金钟、铜锣湾又回复昔日的平静。

多年以来，香港抗争文化温和，香港人

2014年8月25日，香港反“占中”人士持蜡烛与国旗聚集在一起，表示对“占中”团体的反对。

向来为自己的教养、文明的秩序引以为傲。但在2014年的政改博弈中，一些人却想往枪筒里加入更猛烈的火药。这种玉石俱焚的威胁，过往未曾出现。

分析指出，港人素来只求安居乐业，不问政治。以上现象源于香港人的自身生活，地产霸权、贫富悬殊、年轻人上升通道受阻、经济发展停滞，种种问题没有因为回归而消失，似乎变得更加严重了。其中，回归中国十七年之后的香港，越发严重的焦虑感与不信任感不断在人们心中蔓延，大部分不信任感更指向大陆。

实际上，近年“双非”、自由行在香港触发床位荒、学位荒、铺位荒、住屋荒……越来越引起香港部分网民及社会的强烈不满，勾起港人与内地自由行旅客、水货兵团、以至“双非”孕妇之间种种不快经历，引发陆港矛盾加剧。在这种情绪下，一些事件被赋予了事实之外的更多意义。

譬如，在2014年2月16日，就有一批香港网民响应网上号召，首次发起“驱蝗行动”，由尖沙咀钟楼游行至尖沙咀广东道，反对自由行计划，并与内地旅客发生口角。之后，陆续有香港网民拖篋在购物区发起“反蝗行动”。

至4月份，内地一家三口到香港旅游，在旺角行人专用区购物。其中一名女子抱着孩子当街便溺，被一名港人以手机拍下，双方发生争执。事件在网上广泛流传，引起陆港两地网民对骂，令两地的民间矛盾进一步恶化。

多项调查发现，近年香港与内地交流远较九七回归前频繁，但香港人的港人身份认同感愈来愈显著，2014年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程度更创历年新低。一些调查结果甚至发现部分港人有“港独”的倾向。实际上，本土自主也一直在整个占领运动期间清晰展示，成为占领运动其中一大重要要求。

编辑 段宇宏 美编 虎妹

MACAU /
澳门

受大陆反腐影响，博彩业有所下滑，政府举措与市民愿景略有冲突，崔世安执政团队新一年将接受更多挑战。

澳门：表面平静实则暗潮涌动

2014年，澳门回归15周年。过去一年，澳门在内地的大力支持下，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各项指标皆居世界前列。

然而，澳门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无论在政制发展或是经济转型方面也有暗潮涌动。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巩固得来不易的发展，将是澳门未来一年面临的重大难题。

“做澳门人真幸福，做香港人就没有这个福气了。”由于博彩业收益持续上升，派钱已经成为近年澳门特区政府的例行动作：各种利民措施陆续出台，遍布房屋、教育各个范畴，令人艳羡不已。香港记者王先生早前到澳门探亲，对当地福利之丰富又有了新体会。

王先生这次在澳门，去了一家传统面店。他指出，近年面店生意好，在农历年也要开业，但政府要求雇主增加薪酬。员工虽然损失了假期，但收入大增，心情都很好。此外，今年面店装修，政府又提供资助，协助小商户改善经营条件。相对于备受租金、水电，以至未来种种征费的香港小商户，两地境况可谓有天壤之别。

上述情况正好折射出澳门2013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昌盛景象。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当地经济增长年平均为17.5%。澳门政府财政储备也由回归时的130亿澳门元，激增到2014年的5000亿澳门元。自2008年起，特区政府开始实施现金分享计划。这项计划

2014年仍然继续实施，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用于延续广大居民对经济成果的分享。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早前进行了一项名为“澳门市民对回归15周年社会发展的满意度调查”采访了8699名18岁或以上的本地居民。结果显示，超过73%受访者认为，澳门回归15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明显比回归前好。

不过，2014年澳门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不平坦。伴随着内地严打贪污工程深入持续发展，澳门赌场收入由6月开始进入寒冬，连续下滑六个月，与年初对比明显。据目前状况，预料2014年第四季博彩毛收入将负增长，导致全年博彩毛收入或自回归以来首年负增长。

12月初，身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及澳门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访问澳门，首次开腔表态，指博彩业在澳门一业独大不符合澳门的“本地整体利益”。外界普遍认为，李飞的言论反映中央要求澳门政府要对博彩业规模及运作进行有效控制及规范。换言之，未来澳门赌业将进入整固期，澳门居民未必能再享受过去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社会方面，香港、澳门、台湾三个华人小区的文化背景各异，澳门人传统上比较保守。但近年港台两地的社会运动，也在今年开始冲击澳门，越来越多澳门人冲上街头，表达不同的要求。

2014年年初，澳门政府提出《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法案（简称《离补法案》），建议澳门特首任职满5年，在离任后可获月薪70%的长俸，直至去世或从事私人业务为止，在任期内更可获豁免刑事起诉。另外9位主要官员，离任后可获一次性“离任补偿”，更可在“过冷河”期间——即离任后禁止任职私人机构期间——获发金额相当于离任时月薪的70%。

澳门政府解释，《离补法案》是为了吸引商界精英加入政府。但在许多澳门人眼中，《离补法案》十分荒谬，法案受益者正是十数个令澳门民生环境变差的高官，内心强烈不满。然而，亲政府议员占了立法会的大多数。按照澳门政府的计划，只要5月27日立法会大会对法案作细则性表决，立法过程就大功告成。

澳门民愤终于在5月25日爆发。当天下午，2万名澳门人上街示威，要求撤回被视为政府高层自肥的法案，人数之多足1989年后仅见。

当晚，崔世安召开紧急行政会议，5月26日请求立法会主席在翌日的立法会大会中加入删除对法案作细则性表决的会议议程，获立法会通过。但政府依然拒绝撤回方案，激起超过7000市民在5月27日再到立法会门外集会抗议，要求撤回法案，规模也是历年少见。

面对社会上强烈的反对声音，崔世安



被迫于5月29日宣布撤消法案,并表示将来提案前必定先作公开咨询。他强调,虽然自己身形肥胖,但不会“自肥”(意即提交一条优待自己的法案)。

可以说,上述事件不仅表达了澳门市民对政府高层的愤怒,亦是长期不满情绪的终极爆发。近年澳门虽然经济繁荣、百业兴旺、失业率极低,政府盈余庞大,但在繁荣背后,政府并未处理好经济繁荣带来的社会成本问题。以一直为人诟病的社会问题房屋政策为例,过去10年,澳门的楼价上升十多倍,年轻人无力“上楼”,政府供应的经济房屋,数目少、质量差、位置偏远,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此外,市民的生活空间及模式也逐渐被数目庞大的游客及外劳蚕食。当地交通问题日益恶劣,道路堵塞无日无之,公共交通经常挤满外劳及游客,影响市民通行;有车阶级大叹泊位难求;的士服务差、数目少。

有澳门人慨叹,每到下午下班时间,葡京赌场对面巴士站就站满了候车的人。每当看看前边的赌场,看看右边的赌场,看看左边大楼那边的赌场,想想身后大海那边的赌场,很多人会想就是这些赌场,令他们

每天返家的路线难走。这种赌场经济高速发展下,带给市民生活质素下降的问题,令包括一些赌场就业人士都心生不满,游行不断。

分析指出,近年澳门浮现的问题,与制度上的缺失令管治问题难以根治有关。澳门的管治,建基于对社会团体(社团)的假设,以为社团能够代表市民意见。但许多社团领袖并非社团成员真正代表,更不代表成员接受领袖代表他们参政及向政府反映意见。故此,曾经出现多次澳门政府声称,已在政策酝酿阶段向社团咨询意见,但到政策推出时引起市民不满的尴尬局面。

此外,澳门与香港一样,行政长官同样由《基本法》规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出,但小圈子里的人更少,2014年之前仅由300人组成,经2012年政制改革,才稍微增加至400人,当中有344人由大约5000名来自四大界别的选民选出,现时特首选举由400人选举委员会选出,选举委员主要由社团领袖选出,全澳门九成多市民,难以有效反映民意。

因此,2014年8月举行的第四届澳门特

首选举也备受澳门人注目。三个民间团体澳门良心、澳门青年动力和开放澳门协会,不满小圈子选举,发起民间公投,让市民投票表态是否支持2019年普选行政长官。但活动一波三折,先有民政总署拒绝借出场地,在公投首日已有5名票站人员因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被带走,其后实体票站全面关闭,只余下网上投票。

上述一连串事件,对崔世安的个人声望造成不小打击,但在8月31日举行的澳门特首选举时,在单一候选人之下,崔世安仍毫无悬念地连任。

分析指出,面对未来整体社会高速发展,无论政制发展或是民生需求,必然会与时俱进。崔世安及其执政团队将会面对更大的挑战与考验。如何让市民对他们的新政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将成为崔世安新一届政府的考核试卷。

□ 编辑 段宇宏 □ 美编 虎妹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叁

法制与民间

2014：中国法治转折年

司法改革的『后视镜』

2014：NGO革新中国公益事业内涵

谨防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



2014年解决了中国法治的方向性问题，人们好像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中解脱了出来。新的一年应该走向落实。

2014：中国法治转折年

专访著名律师、中华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

回首2014年，“法治”无疑是中国最重大的主题。这一年，一系列贪腐大案相继进入司法程序，一系列司法改革措施或已试点、或已提上日程，一些重要的法律也进入立改议程，法治环境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

活跃在法治一线的律师，对法治环境的发展变化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凤凰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著名律师、中华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

必须痛下决心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记者：若对2014年中国法治环境作一个整体评价，你如何下判？

田文昌：2014年可以说是中国法治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年。这在十八大以后四中全会以前就有了预兆。我曾经在多种场合提到，周永康主政政法委的十年是法治倒退的十年，是对法治进行破坏性践踏的十年。律师界对此体会更深一些。由于权力对司法的干预使得律师承受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律师的作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应当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到的关于法治的问题，在四中全会决议中得到进一步的落实，确实是很大的转机。具体来说，四中全会前后，公检法各个部门，包括政法委在内，都做出了许多新的决定，提出了许多新思考和司法改革方案，包括司法体制的改革和一些具体措施的改革，都在往前走。“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建立巡回法庭、“以审判为中心”等措施都是很重要的改革步骤，应当说也是对民意关切的回应。

但值得关注的是，经过十年倒退的折腾，走了这么大的弯路，毕竟存在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进一步改革的效率有多高，时间需要有多长，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还存在一个拨乱反正的问题。要改变一些错误的做法，更新一些理念与政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纠正的冤假错案，“真凶再现”“被害人复活”这样的案件在纠正案件中占很大数量，而实际上还有多少案件需要得到纠正还不清楚。

记者：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很多的具体措施，比如第三方立法、对行政审批的改革、以及对政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等，哪些比较容易落实？

田文昌：都有一定难度。从大方向来说，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位领导人的两句话非常重要，习讲的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李的则是：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两句话体现了法治的根本理念，十分重要，十分难得。但具体的落实会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一是是否能落实；二是落实有多大的阻力与障碍。

“第三方参与立法建议”的问题很重要，但也很难。立法的过程我也曾参与，刑法修改的过程我体会非常深。中国的立法最大的诟病就是部门立法，在立法过程中各个部门间的争论与博弈非常激烈。引入第三方的参与很重要，但是能有多大的作用，能抵消多少来自部门的阻力，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现在司法上最敏感的还是刑事案件，

一方面是因为它涉及到人最重要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受到的干扰也最多。在这些案件中影响司法公正的障碍是什么？有权力干预、地方利益，等等；但更具体、更重要的问题还是非法取证、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铸成冤假错案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可就是遏制不住。现在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仍然无法落实怎么办？必须彻底地痛下决心，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可能会影响破案率，但能从根本上解决保障人权的问题、司法公正的问题。影响了破案率天下乱不了，但是冤假错案不断发生真的会导致天下大乱。

新的一年应该走向落实

记者：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这一举措在多长时间内部能够有效发挥作用？

田文昌：遏制权力干预司法的问题在短期内效果并不会太明显，现在法官办案仍然需要考虑各种领导的意见。这种习惯持续这么多年一下子脱离不了，关键是法院与法官的独立性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所以需要强力推进，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推进这样的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媒体，各种障碍都很难排除，但是放开对媒体的监控则可以很大程度上迫使相关部门感到压力。所以落实这些措施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便是放开对媒体的监控。

记者：现在我们讲“依法治国”包括“依法行政”，但总需要有人在权力干预司法时提出反对意见，并且使这种反对意见有

一定效果,司法权威才能得到维护。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些改革方案能够通过哪些措施有效实行?

田文昌:四中全会重要是提出了一些方向,还需要一系列的措施体现出来。比如违宪审查、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审查等等。合法性审查没错,但是怎么审查?谁来审查?得落实。我们这次改革的动作很大,整个机制的设计必须得非常全面务实,不然提出来无人去落实。应当说2014年解决了方向性问题,在新的一年里应该走向落实。

记者:您觉得从制度设计和个案来说,哪方面会更重要一些?

田文昌:制度设计是最重要的,个案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制度设计不解决,个案公正就解决不了。一项项改革措施得通过制度设计固定下来,否则就会流于形式。

记者:2014年一方面是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的强调和各种改革措施的提出,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个案中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包括网络言论、媒体自由度等受到影响,您怎么看待这个似乎很矛盾的现象?

田文昌:总的来讲,2014年人们好像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中解脱了出来,有一种感受到法治春天到来的感觉。但是一方面具体措施还未得到落实,另一方面也出现你说的这些矛盾现象。这些问题的原因出自何方?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应有一个科学的、健全的机制来解决。两种力量和理念的博弈不会消失。必须依靠明确、具体的规则来解决才行。

网络问题是一个新的需要思考的问题,信息时代的到来会冲击一系列的旧的、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思维方式,可能人们还没有准备好,不知道怎么对待。但应当清楚,网络时代再用过去的方式控制是根本控制不了的,最后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

再如现在《刑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对律师言论的规定,是很落后、很偏颇的观念。全世界都在向透明化发展,薄熙来的案件都可以公开审理了,为什么还要控制?怕什么,怕舆论吗?怕公众吗?



► 2014年12月3日,首个“国家宪法日”来临前,江苏省南通市一社区开展宪法普及活动。

“辩审冲突”是一种不正常状态

记者:近年来一部分被称为“死磕派”的律师成为一些官方媒体批判的对象,“辩审冲突”也成为个热议的话题。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田文昌:“辩审冲突”本身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一个社会若出现“辩审冲突”那是病态的表现。总体上说,“辩审冲突”的主要责任在于审而不在辩。我这不是袒护律师,这是由辩审双方的地位所决定的,律师的角色决定了在庭审中律师必须通过法官的认可才能发挥作用,因而任何一个正常的律师都不会主动去找法官的毛病。“辩审冲突”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法官不中立,法官在审判的过程中压制律师。为什么法官不跟控方冲突而跟辩方冲突呢?这个问题是很明显的。以审判为中心,应当是以依法审判的活动为中心,而不是以法官个人为中心。对于违法主持法庭的法官也应当有所约束。

记者: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宪法日”应该是中国之前从未有过的举动。

田文昌: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标志。设立这样一个专门的日子对人们有一

种提示作用,一种强化作用。宪法至高无上,没有人可以反对,但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因为它是对权力的限制。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是限制权力的膨胀,就是宪法的绝对不可侵犯。

记者:您觉得在未来的一年,法治的可能走向是什么样的?您对未来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田文昌:肯定会往前走,但是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也不会少,可能不会像人们希望的那么顺利。我的态度是法律界一定要尽力地往前推,可能有一段路不会很顺利,但是改革的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哪怕慢,也得往前进。我们面对的是利益的博弈,滞后理念的阻碍。从设计者本身来讲,不能消极地迁就一些落后的东西。虽然不能冒进,不能脱离现实,但更应当在现实的基础上积极地引导法治往前走,不能消极地等待。之前劳教问题,说了多年,障碍很大,最后废了也就废了,也没有天下大乱。

有些东西就是要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真正的不稳定因素不是靠维稳压制就能解决的,而是通过带给人们公平、正义的感受才能得以解决。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作用的,法治化的进程显然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如果消极等待就会延缓这种进程,而只有积极引导、强力推进才能加速前进的步伐。

□ 编辑 崔世海 □ 美编 黄静

如果不能改变侦查为诉讼活动重心的地位，“以审判为中心”的努力即使取得成效，也不可能独立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

司法改革的“后视镜”

司法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赛龙舟时，锣鼓喧天，旌旗招展，很是热闹，船未出发，宣传造势的功课已经做足；另一种是潜水艇式，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已经日行千里，不显山不露水地把事情办了，让改革的成效凸现出来。

我欣赏和期待的是后一种方式的改革。

要做到这一点，改革就不能停留在标语口号的层面，必须注重实效，不可泡沫四溅一阵之后又归于沉寂，一切还是老样子。

2014年，“依法治国”成为热词，司法改革动作频仍，上海、广东、湖北等6省市先试先行，一时备受注目，司法官的员额制，法官、检察官摆脱公务员序列，省级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试点和跨行政区划的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缤纷一时，令人刮目相看。这些改革都在起步当中，效果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观察，前景令人期待。

我对于司法改革，有自己一番思考。一提

到改革，人们常常想到的是面向未来，展开憧憬，曙光永远在前面。其实，改革有时也需要“后视镜”。鉴往而知今，看一看我们已经进行过的改革，哪些取得成功，成功的经验有哪些；哪些并不成功，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正在进行的改革显然是有意义的。

“以审判为中心”前传

譬如当前司法改革最大的热点是进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项改革旨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依此理解，以审判为中心，几乎可以等同于“庭审实质化”、“防止审判流于形式”的基本思路。

对于这一改革思路，吾人应不感到陌生。

1996年前后，人民法院进行庭审方式改革，曾经提出过这一改革思路，至今记忆犹新，那时的说法是：增强刑事庭审的抗辩性，解决庭审流于形式的问题，防止审判走过场。这一思路不但是一些法院纷纷进行庭审方式改革的响应当理由，也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刑事审判制度的立法原因。然而18年过去了，实现庭审的实质化仍旧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只不过藉“以审判为中心”的新口号而再次出现在各种言说当中，这是否意味着1996年刑事庭审方式改革并未取得实质化庭审的作用，至少没有得到圆满的效果？

起码，司法改革是一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过去的改革未能彻底达到预期目的，其障碍因素需要在当下的司法改革中加以消除，如果我们不去留意过去改革不成功或者不圆满的原因，现在的改革不做有针对性的攻坚克难，如今的改革就有流产的危险。

1996年庭审方式改革，增强诉讼对抗性，引入司法竞争机制，司法形象由积极主动趋向消极克制，为此进行了相应地诉讼制度的调整，为控辩双方发挥积极作用预留空间。平心而论，这项改革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但可惜的是成效大小不如预期，审判空洞化的现象仍然存在，司法实质化的目标还没有达成，此后甚至出现“被告人都认罪了，还有什么好审的”之议，审判不但表演性依旧，立法机关将简易程序扩大适用到认罪的初审案件，这意味着过去是审判流于形式，现在连形式也几乎不要了；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正，也没有注意及此，针对这一问题有任何动作，反而扩大了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许多案件离审判实质化更远了一步。当前最高法院



正在推动速裁程序,期望使案件在审判中分流,实质化审判其中部分案件,对于另一部分案件则简化其庭审过程。这是一种相当自我矛盾的现象,“以庭审为中心”只不过以部分案件的庭审为该案件的中心罢了。

诉讼重心从侦查转移到审判之难

庭审实质化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究竟原因何在?依我观察,其原因在于,造成我国庭审流于形式的原因不仅是诉讼对抗性不足,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刑事诉讼的总体结构使诉讼重心被前置到侦查阶段,而这在当年的庭审方式改革中并未得到触及。

我国刑事审判并非诉讼活动的重心,事实上,侦查才是诉讼活动的重心。以审判还是侦查为诉讼活动的重心,其实质含义是对案件进行全面性、实质性的调查到底是通过审判还是侦查来完成的。在我国,刑事案件的实质调查和全面调查都在侦查阶段完成,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侦查终结标准、起诉标准和定罪标准一样高,侦查人员在确认符合定罪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将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检察官在确信符合定罪标准时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这就要求侦查活动必须将案件查个“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如此一来,对于案件进行全面、实质调查的任务就落在了侦查人员头上,审查起诉和审判不过是对侦查成果的二次质量检查,起到的是质检把关作用。与之相应,无罪判决率奇低,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这种情况与日本相似,日本检察官与我国检察官有一点相同:在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情况下才会起诉,随后进行的法庭审判不过是对侦查、起诉的结果加以检验、对侦查的结果加以检验而已。日本在一年里做出确定判决的刑事案件数,包括简易起诉的轻微案件在内,最近达到110万件。其中确定无罪的案件每年有50余件,所占比率是0.005%。从统计学上来说,这是可以忽略的极小数目。日本法学家松尾浩也教授称这种现象为“精密司法”,平野龙一教授则认为这不过是“检察官司法”的代名词而已——审判扮演着侦查的橡皮图章的角色。

对比之下,其他许多国家刑事司法的特点凸显出来:一般国家的侦查终结与审查起诉并无明确界限,提起诉讼的证明要求通常是有“合理的根据”(probable cause)即可(英国《皇家检察官准则》将起诉标准定为“预期可以定罪”,标准差不多),亦即定罪的可能性在50%以上便可以终止侦查并提起诉讼。因此,法庭审判成为对案件进行全面、实质调查的场合,无罪判决率甚至可以高达30%左右,大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在我国,要想将诉讼重心从侦查转移到审判阶段,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是因为我国诉讼中侦查为实际中心状态已经存续有年,而且警察机关本来就是政权倚重的力量,削弱侦查在整个诉讼流程中的地位并降低警察机关实际受倚重的状态,触及到这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和政权结构,干系重大。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进行周密的建构,目前存在的立案监督、批捕制度和羁押必要性审查,除了批捕制度具有明显的刚性外,其他制度过于柔和,缺乏应有的力度,这是不争的事实。目前,侦查权缺乏有力的外部司法控制,法院根本没有以司法手段控制侦查的职权。检察机关是侦查监督机关,但法律并没有赋予其指挥侦查、调动警力的权力,也没有赋予其有力措施实现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控制,这造成了侦查权过大而审判权在其面前相对弱化的状况。

如果不能改变侦查为诉讼活动重心的地位,“以审判为中心”的努力即使取得成效,也不可能独立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倒是可能并存两个中心,一是侦查的中心地位没有动摇;二是审判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于是刑事诉讼的流程中出现“双驼峰”现象。

审判中心主义不仅要求在形式上突出审判活动的诉讼地位(包括如今常常提及的突出庭审的作用),也不限于重塑法院的社会形象的宣传意图,更重要的,是审判活动必须实质化。毫无疑问,徒具形式而不具有实质性的审判无助于审判中心地位的确立,反而对此有消解作用。



九九归一·义重情长

— 经典重启 —

一个品牌,
承载着百年重九起义的深厚记忆,
凝聚着一代人实业救国、
振兴民族工业的爱国魂,
饱含着浓浓爱国情、兄弟情、战友情……

悠悠岁月,义重情长,
穿过百年的烟云,
我们追寻着关于重九的记忆,
演绎着新的经典与传奇……



(详情敬请登录 www.hyhhgroup.com)

审判的实质化无论以什么名目出现,“以庭审为中心”也好,“以审判为中心”也好,如果审判无论久暂,实质上只是走个过场,或者流为了一场审判秀(Show Trial),就无法确立自己的诉讼重心或者诉讼中心的地位,审判中心也就沦为一句空话。

审判活动对案卷有很强依赖性

要使审判成为一场“真的”审判(这个要求本来就是审判应有的内涵,并不能说是一种高要求),需要多项制度加以配合(对于我国刑事审判的现状和惯性来说,这就有相当难度了),诸如需要切断审判与侦查的连结,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审判流于形式的一大原因,是裁判者有卷宗可恃,即使庭审时不进行细致调查,仍然可以通过私下阅卷活动了解案件情况并以之为裁判基础,庭审变得可以替代甚至可有可无。如果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检察机关在向法院起诉时只移送一份起诉书,不得移送证据材料,也不允许在起诉书中描述这些证据情况,这种局面有望得到改观。起诉状一本主义让法官头脑像一张白纸一样展开审判活动,通过庭审建立对于案件的心证,并本着自己的心证作出判决。这一制度的障碍主要来自法官,如果法官对于自己听讼能力缺乏自信并因习惯于卷证并送制度而不欲改变,立法上就难以决心推行该制度。就一般传统类型的案件(如盗窃、抢劫、伤害、杀人等)来说,不事先阅读案卷迳行开庭,法官不至于有畏难情绪;对于案情复杂、尤其是新型领域里的犯罪,阅读案卷尚有一定困难,遑论不阅读案卷一步到庭?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曾经研议及此,当时最高法院反对采纳起诉状一本主义,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检察机关起诉时只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照片,原因便在于此。遗憾的是,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正反其道而行之,恢复了全卷移送主义,近乎宣告1996年侧重于开庭前进行程序性审查、减少预断的改革努力归于失败。如今要实行审判中心主义,加强庭审的实质性和决定性,需要重新审视庭审前的案卷依赖现象和法官预断问题,

若不能下决心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只怕叶公好龙,难以成事。

另外,我国审判活动中对于案卷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这种情况与日本刑事诉讼中的弊端极为相似。日本公审程序的特色是偏重书面调查,日本法学家平野龙一教授曾经批评说,日本法院的公审往往是走形式而已,法官主要在办公室或者自己的住宅中根据这些调查来进行判断,这种审判也可以叫“调查书审判”。“调查书审判”即审判过程中偏重调查司法警察或检察官做成的各种调查书(侦查活动中形成的各种书面材料)。我国刑事审判也是如此,过分倚重侦查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笔录、说明材料,不重视证人、鉴定人出庭,抖擞精神只在卷宗上下工夫,使直接言词原则成为泡沫。直接言词原则并非审判中心主义独有的要求,事实上,实行诉讼阶段论的司法制度也需要确立直接言词原则。

庭审的实质化,还需要完善证据规则,以审判中严谨适用证据规则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并以此遏制其他程序活动。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确认任何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但没有将其包含的沉默权引申出来加以保障,使该规则处于闲置状态;我国刑事诉讼中也没有确立自白任意性规则,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塑造侦查品质的潜力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我国刑事诉讼中也没有确立传闻法则,造成证人出庭率仅有微小幅度的增长,没有真正解决证人是法庭上“珍稀动物”的状态,审判空洞化的情况仍然严重。这些证据规则有利于推动审判实质化,都需要在建立审判中心主义的时候加以配套解决。

律师尚无法做到独立辩护

不仅如此,庭审的实质化怎能离得开独立、有效的辩护?这里所说的“独立辩护”,是指辩护人进行辩护不受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辩护人——特别是辩护律师——本着自己对事实和证据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进行辩护,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均不应

辩护人的辩护活动预先加以干预,以免使辩护工作受到干扰,使辩护人有后顾之忧而在法庭上不能畅所欲言。否则,辩护人的存在就成了不具有实质意义的摆设。独立辩护,相对于当事人来说,尚构不成一个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律师辩护不受政府的干预。对律师的制度约束,应由法律的明确规定、律师执业纪律和律师行业习惯构成。这些规定、纪律和习惯不是随心所欲制订的,它们必须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必须有利于增进司法公正,遏制国家权力滥用的倾向,促成诉讼中对抗局面的真正实现。

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由于缺乏诉讼乃个人与国家对抗的观念,即使有了对抗的制度,这些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会在实践中被打折扣,甚至在某些案件中完全不起作用。因此,对于支配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根本观念不加以彻底清理,律师独立辩护的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更为明了的是,如果审判本身不具有实质性,律师的辩护也就不可能有效,以审判为中心就是镜花水月。

因此,上述这些措施都是过去应当采用而没有采行的做法,这是庭审方式改革效果不彰的原因。如今司法机关要进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重新审视上述需要下决心推行的改革事项,并且要进一步改良司法体制,进行司法独立品格的塑造,在司法功能方面要充分发挥法院在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屏障作用,使法院成为横亘在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并发挥平衡轮作用的机关,否则审判中心的地位就建立不起来,“以审判为中心”就成为一句没有多少实效的口号。

总之,看看司法改革的“后视镜”,想想我们走过的弯路和绕过的荆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未来的改革该怎么进行,帮助我们增长一些改革的勇气和智慧,向过去学一些东西,找回被我们忽视的改革措施,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不仅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其他方面的司法改革何尝不是如此?

公民注册社会组织与注册企业一样, 都是国家必须落实的公民宪法权利。

2014: NGO革新中国公益事业内涵

> 不可否认, 2014年的公益界和NGO内部也发生了一些负面事件。比如, 杨六斤事件, 壹基金、天使妈妈基金受质疑等。但总体来说, 这些负面事件都属于2011年郭美美事件后的延续, 能量明显衰减。公益界的社会声望在2011年触底之后, 2014年开始反弹, 正能量增长的速度较快, 整体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 无数国人奔向灾区, 让世人看到了公民责任与公益力量。而2014年, 无数国人将公益的关注投向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群体, 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与2008年相似, 这样的关注同样来自普通公民, 来自广大的志愿者和草根NGO组织; 同样让全社会感受到: 普通人的公益热忱一旦被激发就会喷薄而出; 同样突破了社会对公益慈善的既往认知: 原来公益还可以这样做。

如果说2008年是中国公民公益元年, 那么2014年则可以说是中国公民公益拓展视野、自主创新的一年。

冰桶挑战颠覆传统慈善

2014年中国公益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莫过于“冰桶挑战”。这一始于美国的创意传播, 要求参与者在网络上发布自己被冰水浇遍全身的视频内容, 然后该参与者便可以指名道姓地挑战其他人来参与这一活动。活动规定, 被邀请者要么在24小时内接受挑战, 要么就选择为对抗ALS (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 捐出100美元。活动的最终目的, 是让更多人通过瞬间被冻住的感觉体验这种俗称“渐冻人”的罕见病, 同时为服务“渐冻人”的NGO募集善款。这个公

益游戏自8月17日进入中国后, 瞬间发酵并蔓延开来。科技大佬、文娱明星、媒体人士在浇下了一桶又一桶冰水的同时, 纷纷慷慨解囊, 用捐赠传达对渐冻人的关切。“冰桶挑战”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获得近40亿次的点击量, 超过2008年对汶川大地震的点击。截至2014年8月30日, 这项活动在中国的组织者——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已经筹到814.6万元人民币。

尽管该活动充满争议, NGO组织活动中也要总结经验教训, 不过, “冰桶挑战”的确刷新了国人对公益的认知, 让人们睁大眼睛惊奇地仰视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 原来公益存在如此多元、多样的新生态。当然, 这要成为常态还有待时日。不过, “冰桶挑战”已经被定格在中国乃至全球公益史上, 成为一个重要节点, 它将文化公益以崭新的生态推举到世人面前, 起码从四个方面革新了传统观念和传统方式。

首先是筹款形式, 原来慈善募捐还可以用如此充满戏剧性、娱乐性的方式; 其次是传播方式, “冰桶挑战”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的世界性公益活动, 就在于成功地运用互联网进行传播; 三是公益也能启动科学普及, 让世人了解到类似渐冻人这样的罕见病有5000到8000种之多; 四是类似当年中国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地球”一样, 一个“冰桶挑战”引发世界深思, 人类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必须依靠全球协作和努力才能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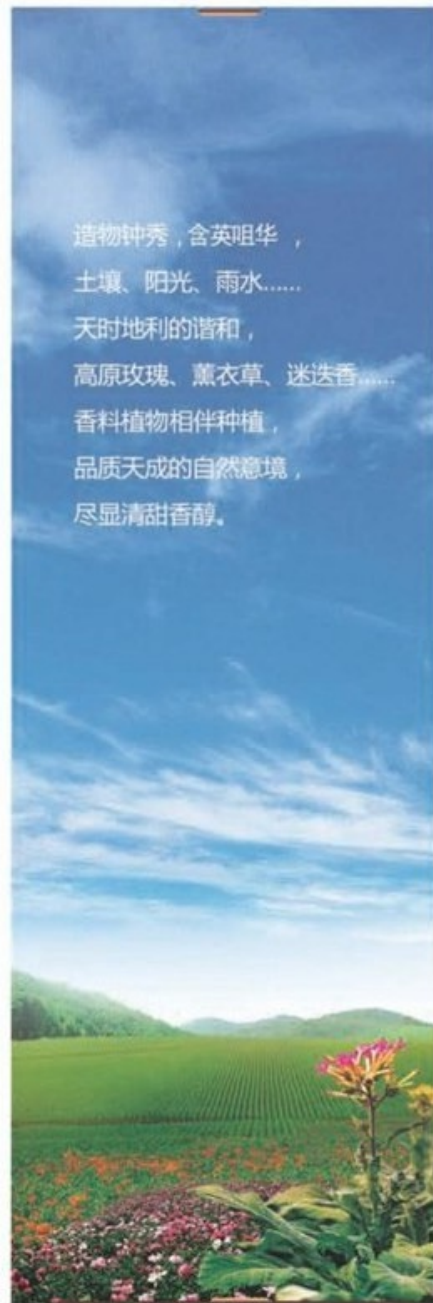
一百多年前,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刚刚成立时, 声称基金会的宗旨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和利益”。而直到当下中国还有很多人



九九归一·清甜香醇

经典重启

造物钟秀, 含英咀华,
土壤、阳光、雨水……
天时地利的谐和,
高原玫瑰、薰衣草、迷迭香……
香料植物相伴种植,
品质天成的自然意境,
尽显清甜香醇。



(详情敬请登录 www.hyhggroup.com)

认为,公益慈善的地位哪里有这么高?但“冰桶挑战”在世界的活动就是这一宗旨的注脚——罕见病的研究和治疗机制的破解,确实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和利益”。

F4 等新计划彰显新农村公益

“冰桶挑战”让世人知道了罕见病,“F4”则让国人见识了农村新公益。

2014年6月12日,四个年轻人发起的新农人组合——Farmer 4宣告成立。这四个年轻人都满怀浓浓的乡土情怀,以新时代的新知识为乡村、为农民服务多年。刘敬文曾在南疆乡村协助维吾尔农户组成合作社,创建“维吉达尼”品牌,通过网络的社会化营销帮助维族农民成批量地销售当地农产品;陈统奎在家乡海南创办返乡青年论坛,创立“火山村荔枝”品牌,以微博、微信把家乡的自然农法荔枝宅配进千家万户;赵翼创立“乡土乡亲”,带红了家乡的茶叶;钟文彬则创立了新农业企业家的学习交流平台。

F4的组合为愿意返乡的青年揭示了新的路径,这就是返乡并非只能回家种地,而是可以做农村新知识、新技术、新方式的引领者,可以把“三农”与合作社、互联网、城市消费者等等连接起来,这就为农民和农村公益赋予了新的含义。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2014年,中国首次出现成规模的支持新农村公益的行动和项目。由著名公益人邓飞联合其中欧国际商学院的校友发起“e农计划”,以“购买就是公益”为口号,动员中欧商学院的校友为购买经过参与式认证的偏远地区的农产品,用支持社区经济的方式帮助农民实现自我造血。与Farmer 4由年轻人组成不同,“e农计划”的成员是社会的中坚骨干,属于新中产阶层。

已经成立数年的草根NGO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也在2014年末召开首届乡村社区工作者年会,在培养三年的150名扎根乡村的本土人才中,给30名优秀者颁发乡村社区工作者合格证书,给12名能够为乡土人才授课的本土讲师颁发乡土培训师合格证书,使中国乡村社区建设力量得到专业化认证。



四个年轻人发起的新农人组合——Farmer 4宣告成立,他们从故乡的衰落中看到复苏的希望。

中国农村新公益的格局正在形成,这股力量在未来如能壮大并联合起来,就是中国农村之幸,中国公益之幸。

上述活动表明,中国农村新公益的格局正在形成。与以往的方式不同,新型NGO、新型公益人不是带着怜悯心“扶贫济困”,而是以积极向上的心态,以培育有知识、有技术的新一代人才的方式,以公益带动商业的方式去形成新的价值观和新的事业体系。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这些投身乡村新公益的人群,既有老一代,也有青年一代和中年一代,而且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对农村价值,尤其是具有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元功能的看法相当一致,所以才能从当下农村的衰落中看到复苏的希望。应该说,这是一股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与单纯以资本改造农村使之城市化的力量相对立。这股力量在未来如能进一步成长壮大和联合起来,就是中国农村之幸、中国公益之幸。

民间组织地位上升

除了上述突破性进展,2014年公益事业还有许多常态性的进步:阿里巴巴的两位创始人马云、蔡崇信宣布,将成立个人公

益信托基金,带动企业慈善多元化;诸多NGO从雅安到鲁甸的联合救灾行动推动中国民间救灾应急响应机制日臻成熟;江苏环保公益诉讼获赔1.6亿元等等。

这些成绩的实现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2014年以来,国务院以及多个部门在公益领域出台了众多法规。12月19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慈善领域第一个以国务院名义出台的规范性、纲领性文件。在此之前一个月,11月19日,国务院通过了《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提出以健康和教育为重点,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村困难家庭儿童给予从出生开始到义务教育结束的关怀和保障。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国家领导人就困境儿童工作进行直接部署。

此外,各个部门也相继出台了大量配套政策。2014年仅民政部出台关于社会养老的政策就多达19个。这些政策对2014年以及今后的公益事业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在2014年有大发展。2014年元月,财政部召开全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会议。会议勾勒了今后一段时间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改革路线图。民政部也于2月10日公开了《2014年民政部购买社会服务指导目录》,就保证基本民生、基层民主和社会自治、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专项社会事务管理及其他等五个性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力量伸出了橄榄枝。在这些政策的指引下,2014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总量有很大的提升,保守估计超过2013年50%-80%,乐观估计为一倍以上。购买服务让政府与NGO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合作关系,让社会组织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同时,据观察,目前一线城市政府实施强行募捐等直接干预社会组织工作等行为已经有所减少。

2014年的慈善公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自年初全国人大将慈善法立法提上日程,带动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在公益界的配合下,掀起研究慈善法民间版本的热潮。12月21日,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

将全国的5个慈善法民间版本收集起来,召开有政界、学界、慈善界、企业界、传媒界等各界代表共同参与讨论的研讨会,既为人大立法做贡献,也为未来慈善法出台后的知识普及和法律宣导进行铺垫热身。可以说,这是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参与立法的一次给力尝试,是四中全会关于“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一次积极探索,是展现大社会价值,即公民参与社会、社会协同国家、国家依靠社会的一次实践。

不过,目前公益组织注册仍然存在困难,是更应重点关注的问题。虽然国务院明确要求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但民政部门有关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细则等相关配套政策尚未出台,公益组织仍面临注册资金高门槛、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税收不合理、公益基金投资收益用于公益也要收税等政策限制。尽管有些地区如江苏、浙江等地出台了一些利好政策,不过,就全局而言,这些政策性的禁锢并没有得到彻底松绑。很多政府官员把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仅仅视为管理手段的改进,没有认识到其背后的重大意义——为自愿组织起来的公民赋权。公民注册社会组织与公民注册企业一样,都是国家必须落实的公民的宪法权利。

老年服务将成公益新大陆

2015年的公益事业发展,我认为会出现“两个半”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2015年在农村公益领域还将有新气象,“三农”整合的复合公益、乡村与城市互联互益会继续成为趋势。只要“三农”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农村的公益就一直大有可为。在政策方面,目前国家文件倡导的供销社综合改革试图走向日、韩和中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模式——合作组织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将所得经济盈余用于社区福利、教育、文化和人才培养。所以,上述政策或者方向是对农村公益发展很重要的利好消息。

第二个趋势,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管理会加强,走向规范化。目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总量已经很大,还在

持续加大。但由于管理和政策跟不上现实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所以,2015年的政府购买工作将面临管理必须上台阶的挑战,这就是需求决定供给。

至于“半个趋势”,是指长期照护服务即针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服务开始进入社会的视野。中国正在步入人口寿命提高和老龄人口比例大幅增加的“长寿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是国家、社会、家庭如何三位一体,承载人口比例不大、但耗资源很大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让每个人在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也能拥有尊严和有质量的生活。目前中国老龄化不断加剧,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3亿。按照重度失能者占老年人口的3%-5%计,需要全面照顾的重度失能者约在395万到655万之间。这至少会拖累400万个家庭,影响数千万人的生活质量。

显然,对他们的照顾不是家庭能独自承担的。按照国际做法,长期照护服务需要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这是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之后的新型社会保障领域。这不仅要求国家出台长期照护服务法、筹措资金、培养人才,也需要社会组织,尤其长期照护机构提供长期的公益性服务。但是目前的政策并没有对失能失智老人做全面的分类分级评估,更没有将失能度与收入水平挂钩,制定针对老人的多级照护补贴。而是不分失能与否,不分程度如何,不分老人服务的不同类别,都给予机构和床位补贴,甚至还给大资本免费提供养老院的建设用地和免征各类税收,这其实是将公益服务与商业服务混为一谈了。针对这类突出的社会政策问题,12月2日,中华慈善总会长期照护专业委员会联合几百家老人院,发布了《长期照护2014北京共识》,提出为深度失能失智老年人服务应当列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国家立法、政策倾斜。尽管这种由民间公益组织提出的正确主张不一定能在2015年就被政府接受,不过,可以预言,这片土壤一定会在未来成为公益领域的新大陆。

□编辑 李光 □美编 黄静



九九归一·方便交谈

— 经典重启 —

一场交谈, 拉近你我距离;
一场交谈, 增进相互感情;
一场交谈, 创造未知机遇;
一场交谈, 决定局势发展;

.....
这, 就是交谈的力量。

方便亲切交谈



(详情敬请登录 www.hyhhgroup.com)

享有立法权主体的行政层级越低，其与具体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的利益纠葛越紧，对公民和社会权益的损害可能越大，因此享有地方立法权主体过多过滥，定会助长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保护主义的盛行。

谨防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

中国目前有49个城市享有地方立法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亦明确提出：“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初次审议通过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更是拟将过去49个较大的市才享有的地方立法权扩大至全部282个设区的市。从49到282，地方立法权扩容的步子迈得太大。

谨防“法盲立法”

地方立法权缘何大幅度扩容，其原因诸多：譬如社会治理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治理的事务越来越复杂，对规则治理的要求急迫。由于没有地方立法权，不少城市往往依赖“红头文件”进行社会治理，虽满足了一时之需，但其治理的主观性、随意性、变动性极大，城市自身发展严重失序；再如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需要。通过授予地方立法权，给予地方试错的更大制度空间，即对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范式的改革，在全国性立法尚未成熟之际，地方性立法可使其改革举措于法有据。赋予更多的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其积极效益不可否认，但其中存在不少忧虑之处亦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数量。

首先，地方立法权扩容谨防“法盲立法”。当前大多数设区的市，不论是组织机构还是人员素质皆难以担当地方立法的重任。目前享有地方立法权的49个城市，包括

直辖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所在地城市等，其一般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机构比较健全，常委会委员或人大代表的素质相对较高。而此次拟新扩容的设区的市，其不仅大多没有专司立法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是工作机构，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法律背景出身的比例极低，熟悉立法理论与实践的人才几乎缺乏储备。在此种情况下，未经任何试错即轻率打开地方立法之门，其后果委实难以想象，此种后果在实践中最突出的体现可能便是地方性法律简单拼凑乃至直接抄袭上位法。

其次，地方立法权扩容提防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赋予更多的城市以地方立法权，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积极性得以发挥，但地方党委、政府借助地方立法权以加强其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的担忧亦绝非杞人忧天。立法是一项妥协的艺术，也是权力配置合理下的利益表达、意志设定过程。享有立法权主体的行政层级越低，其与具体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的利益纠葛越紧，对公民和社会权益的损害可能越大，因此享有地方立法权主体过多过滥，定会助长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保护主义的盛行。通俗地讲，便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难免不将自身的利益“塞进”地方性立法当中，使其地方保护主义在“法律化”的掩饰下显得“名正言顺”，尤其是在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制度、地方立法监督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形下，此种担忧表现得更为突出。

再次，地方立法权扩容避免危及法制统一。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法制统一的意

义尤为重大，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更是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又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较大，为此形成了多层次的立法体制，除国家层面的立法外，部分地方亦可进行立法。但地方立法权的迅速扩容，在一定程度上会挑战中国法制的统一。具体有二：一是某些地方在立法之时，有意或者无意地突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立法权限，或是地方在国家立法已有规定的情况下制定与之相悖的地方性立法。如轰动一时的“洛阳种子案”所涉及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便被认为违反了作为上位法的《种子法》。二是地方立法原本符合上位法的规定，但由于上位法立、改、废活动较为频繁，而地方性立法由于诸方面的缘由未能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此一来便出现了地方性立法与上位法相抵牾的情形。尤其在活化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阙如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依法又是司法裁判援引的依据，地方立法权主体的率尔扩容弄不好会显在或潜在地助长司法的地方化。

诚如上述，地方立法权扩容背后的原因诸多。赋予更多的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即便有诸多积极效应和客观需要，但真的如《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那般急剧增加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数量？答案应是否定的。其中最关键的理由便是：探索型改革基于降低试错风险和改革成本的需要，往往趋向于“分步走”的改革路径。于此层面而言，分批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或许更为稳妥与合理，当然赋予地方立法

权的条件可不如批准“较大的市”那般苛刻,《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此所做的制度设计可谓合理,其规定:“前款规定的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因素确定”。

避免地方立法权被滥用

地方立法权的扩容除选择“分步走”的路径之外,尚须确保地方性立法的科学性,具体而言,以下举措值得考虑:

第一,委托第三方起草地方性立法草案。在现有的体制之下,法律草案往往由行政机关或是人大有关机构直接起草,此种做法自有其优势,但由此导致的后果有二:一是由行政机关起草法律草案,立法草案难免不受部门利益的影响。试举一例,在交通管理领域的地方立法过程中,实践中通常是由政府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起草法律草案,如此一来,交通管理部门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亦是游戏的参与者,这不仅直接造成了立法的不公,并间接导致了执法的不公。基于此,委托中立的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部门利益对立法挟持与干涉。二是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可以避免“法盲立法”的窘境。因为受委托的第三方大多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其通常具有立法所需的专业性知识。十八届四中全会亦提出:“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在过去的地方立法实践中类似的举措亦不少。1993年通过的《广东省经纪人管理条例》即为中国首次委托专家学者起草的法律草案。但此项制度的建立尚存诸多问题有待明确与解决,譬如第三方选择的方式,是直接委托还是公开招标抑或是其他方式;如何确保第三方不受相关机关的牵制,如何实现第三方不偏不倚地起草法律草案;如何避免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制度步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制度的后尘,即使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

不至于流于形式,法律草案符合立法者的利益时就采纳,不符合其利益时便弃之一旁。

第二,健全对地方立法权的监督机制。为了避免地方立法权的滥用,有效的监督势不可缺。此种监督无外乎事前与事后两种主要形式,前者主要指的是地方性立法生效的前置程序,譬如我国《立法法》要求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方可施行。后者则是对既已施行的地方性立法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审查,并对其中违宪、违法的地方立法予以撤销,《宪法》、

《立法法》对此均有所规定,但该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现如今,随着地方立法权的扩容,地方立法的数量势必增加,违背上位法的地方立法的数量同样会随之增加,在此情形下,若上述审查、撤销制度依旧处于“冰冻”状态,其后果不言自明。于此层面而言,欲使地方立法权扩容不至于遭到滥用,对地方性立法的审查与撤销制度无疑需要“解冻”。

第三,划定设区的市在进行地方性立法中的权限。在立法体制中,权限划分的方式有二:一是负面清单的模式,即只要不属于国家立法权的专属范围,地方皆可进行立法;二是正面清单的模式,即唯有明确授权的事项,地方始可进行立法。二者各有优劣,中国现行《立法法》便是第一种模式,即《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为国家立法权所专属,除特别授权外,不容许由法规、规章等进行规定,其中诸如犯罪和刑罚等内容甚至不允许进行特别授权。为防止扩容后的地方立法权出现尚难以预期的滥用,对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可通过正面清单的方式予以限制,即在保障这些地方拥有城市发展所需的立法权限的同时,又不至于为地方性立法僭越国家立法创造“条件”。《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其权限的规定为:“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

为防止扩容后的地方立法权出现难以预期的滥用,对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可通过正面清单的方式予以限制,即在保障这些地方拥有城市发展所需的立法权限的同时,又不至于为地方性立法僭越国家立法创造“条件”。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立法权限的限制是否溯及过去已享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如何使《立法法》有关较大市的规定与宪法相关规定对接?此外,尚需要指出的是此权限并非一成不变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地方立法权仅仅是少数较大的市的“专利”,自1993年国务院批准江苏苏州、徐州成为较大的市之后,批准工作随即暂停,这便意味着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限于既有的49个城市。但地方立法权下放暂停的21年乃是中国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法律规则的缺失与改革的不断推进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此背景之下地方立法权的扩容提上了日程,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立法法》自实施以来的首次修改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其皆表明要赋予更多的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扩容自有其积极效应,但与之相伴的担忧亦绝非多余,这便要求我们认真对待地方立法权的扩容,因为时机不成熟的改革不仅欲速则不达,甚至可能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编辑 崔世海 □美编 黄静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肆

财经大趋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局『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非常态』

寻找『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点

国务院金融改革期中考

中国经济有『通缩』风险

内地股市将涨到何时？

中国经济压力与转机并存



想了解2015年乃至未来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
就要读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局“新常态”

2014年12月11日，为期三天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作为中国年度最高级别的经济形势分析和决策会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和2015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威风向标，2014年会议正值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发展进入“新常态”之际，备受海内外的关注。

据新华社报道，会议预计中国经济2014年的主要目标“可望较好完成”，但也承认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挑战，包括：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结构调整阵痛和部分经济风险显现等。

对于当下经济形势，会议首次以大篇幅全面系统地阐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九个趋势性变化，并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就是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因应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更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加强产权保护、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等。同时，中共领导经济工作的观念、体制和方式也需与时俱进，并加强相关制度化建设和专业化能力。

会议还提出了2015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阐述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并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将稳定经济增长和培育新增长点置于2015年任务的优先项，同时要求继续转方式、调结构，加快推进改革开放。

有关学者表示，在中国经济仍然面临明显下行压力下，会议将2015年的宏观政策取向继续定调为“稳中求进”。但强调积极

财政政策更有力度，意味着财政增支减收空间扩大，包括减税和赤字规模将会增加；稳健货币政策更注重松紧适度，意味着货币松动可能加大，降息降准皆有可能。

另外，会议首次未明确提出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市场普遍预计2015年GDP增速目标或下调至7%。

全面阐释“新常态”

近一年来，海内外始终关注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经济“新常态”。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全面阐明了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九大趋势性变化，指出中国经济在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趋势性变化，表明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会议诠释了“新常态”的内涵为“四个转向”：“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对《凤凰周刊》表示，“新常态”是相对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而言，现在进入了稳健的发展时期。过去的快速增长是有原因的：第一，基数小，产业空间大；第二，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不大；第三，劳动力等要素成

本低，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向，国际经济也处于上升期。“这些条件永远不可能复制了。中国经济实际进入了新的、稳健的发展时期。”

经济“新常态”概念由习近平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省时首次提出。在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习近平又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特征总结为“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本次会议进一步从9个方面阐述“新常态”的内涵，使之更加深化和系统化，显然中国领导人对“新常态”的认识已臻成熟。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表示，以前大家对“新常态”有各种看法，甚至认为“新常态”意味经济衰退。通过这次中央对“新常态”全面、深刻、系统的界定，可以消除认识误区，引导人们正确、理性、客观看待“新常态”。

此次会议公报就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梅认为，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统一全党上下思想认识的作用，这非常重要，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中国现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出现很多新特点，加上前期遗留问题的消化，所以和之前30多年有很大不同。

“这就需要统一全国上下各级干部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制定下一步的发展政策和策略。”

事实上, 各界普遍认为, 中国经济再不彻底改变传统的依赖物质投入、拼资源环境、靠外延扩张的发展方式, 还是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就会缺少保障, 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还可能使一些长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激化。

头号任务“稳增长”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第四年确定来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 并要求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狠抓改革攻坚, 突出创新驱动, 强化风险防控, 加强民生保障,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

按此要求, 会议提出了201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以及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

李义平认为, 连续四年坚持“稳中求进”有其结构性原因。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 中国实行货币宽松政策, 既有其积极作用, 但也导致诸多问题, 比如产能过剩、结构调整难以进行等问题。新一届政府上任后, 也一再地重申经济下行压力很大, 结构调整任务很重, 产能过剩问题很严重。“提出‘稳中求进’, 就是要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稳定的预期、稳定的制度。这个过程中, 有节奏地使经济稳定增长。进的重点则是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

关于市场普遍预期的2015年GDP增长目标下调, 李义平认为, 中国GDP的增长速度降下来, 具有其必然性。“我们应当抛弃曾经的GDP情结, 速度适当降下来, 但是增长的质量效益提高了, 资源利用更有效了, 环境改善了, 这有什么不好呢? 群众的福祉是多方面的, 不仅包括经济福利, 而且包括社会福利、自然福利等等。GDP某种程度上是政府的衡量指标, 而不是老百姓的衡量指标。”

对比以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来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



六星汽车宾馆
不仅仅是主题酒店

SIX STAR MOTEL

主题 · 商务 · 度假 · 精品

◆ 深圳首家台湾顶级MOTEL ◆ 开启豪华的浪漫之旅 ◆

- ★ 全店支持Ipad选房
- ★ 配有VOD影音系统, 免费电影
- ★ 主卧55寸液晶电视, 浴室22寸
- ★ 进口专业美容/沐浴用品
- ★ 圆形水流/幻影双人按摩浴缸
- ★ 免费高速WIFI上网
- ★ 免费提供点心、饮料、矿泉水



60种异国房型 一房一车库

★ 超方便

一房一车库, 直接开进房间, 永远都有专属车库

★ 超实惠

真正的2星价格入住五星酒店, 不能再优惠啦!

★ 超时尚

3/6/9/12小时黄金切割入住

住多久算多久, 不为多余的时间买单!

★ 超省心

随时入住, 无需预约, 无需下车办理繁杂手续!

★ 超贴心

入住送牛奶浴/玫瑰浴/泡泡浴, 随心所“浴”!

★ 超尊贵

三重门禁系统, 训练有素的客服给您舒适安静的休憩环境!

樟木头店、惠东店 即将开幕

罗湖旗舰店 T+0755 2512 6666

深圳市罗湖区罗沙路5069号 (罗芳立交六星汽车园内)

龙岗中心城店 T+0755 8972 5566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136号 (新龙岗花园旁)



www.6star-motel.com
微信扫一扫 分享更多精彩

务,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发现,“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被放在最优先位置。“这是和2013年最大的不同。反映出当前产能过剩、房地产下行、潜在增速下滑趋势下,“稳增长”的力度会继续加大。

“2014年完成7.5%就很不易,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想出各种办法。”王梅认为,2015年“稳增长”的任务会仍然不容易。中国目前的出口形势不利;消费只能逐步增加,而且反腐任务繁重;创新能力与新兴经济也不可能一夜之间长成大树。

“在新增长点尚未崛起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才能给大家喘息的空间去创新、改革、调结构,因此‘稳增长’很重要。在现有国际环境下,投资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投资上升会导致债务上升,因此对债务的科学管理和对投资的效益管理确实十分重要。”

王梅表示,政府要不断在“稳增长”与控制债务风险之间找到平衡。“2015年GDP增速目标可能调到7%左右,但这仍是不容易完成的,我们做模型测算过。”

因应2015年“稳增长”的需要,会议公报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

管清友分析认为,过去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偏稳健,“财政政策要有力度”意味着财政将更加积极,赤字率可能扩大至2.5%。财政主导和参与(PPP)的公共投资仍是“稳增长”的核心手段。

“货币政策将继续宽松,降准降息、SLF、MLF可能轮番上阵,但强调松紧适度意味着货币宽松节奏将有起伏,尤其是下半年政策可能边际收紧。”管清友说。

向改革要红利

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单列为主要任

务之一,更表明中央对改革增长的重视和迫切。但类似地方政府扶持光伏产业的做法显然不被认可,会议提出,要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政府要创造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在保护产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集聚优秀人才等方面要有积极作为。

对此,李义平表示,在市场中配置资源的主要是企业家,他们最能发现什么产业能成为未来的支撑产业。国家可以做大的趋势预测,但是具体哪个产业应该让市场去发现。政府指定的往往发展不起来。

“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是因为有心栽花不符合经济规律,无心插柳才符合经济规律。”

“‘稳增长’需要靠投资支撑,同时需要新兴经济的发展,并向改革要红利,把经济增长的潜力发挥出来。”王梅告诉记者。

从会议公报看,201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大体已经“圈定”,即加快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会议提出,“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

全面深化改革从2014年的准备期进入2015年的攻坚期,2014年中央深改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的国企、财税、金融、社保、土地、司法等一系列改革方案,都有望在2015年得以逐步实施。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2015年改革有望在四方面取得突破:第一,以市场开放为重点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服务市场的开放;第二,混合所有制为重点的企业改革;第三,财税、金

融体制等改革;第四,以政府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为重点的政府改革,包括逐步推开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在区域发展方面,本次会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2015年有个良好开局。”

管清友对此表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列入工作重点,区域主题将维持热度,这三大战略是大浪淘沙之后的重中之重,2015年将加快落实,京津冀规划将会出台,“一带一路”也有望出台相关指导意见。

会议同时突出强调,“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继续实施。”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评论说,会议释放出完善区域政策的新动向,即更加强调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也回答了外界的一些担心。

有关新型城镇化如何推进,会议表述颇让人玩味:“要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有关学者表示,这似乎是在为城镇化降温。

2015年还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王梅所在的国民经济研究所正在收尾其为国家发改委做的“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相信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也会为“十三五规划”的制定提供分析和思考基础。”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影响将不止于此。王梅表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是粗放型增长阶段,未来几十年则将进入经济“新常态”,越来越走向集约型增长。这次会议对这种转变非常全面系统地阐述和展望出来,对中国经济发展将起到划分历史阶段的作用。

□编辑 王毕强 □美编 虎妹



国内首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豪华商务轿车 BMW 530Le全球首发 华晨宝马自主研发新能源汽车再提速

(广州)2014年广州车展盛大启幕,华晨宝马展台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新BMW 530Le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全球首发。BMW 530Le对宝马集团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将是BMW品牌推出的首款插电混合动力车型,中国消费者也将能在第一时间体验BMW尖端的eDrive电驱动技术所带来的独特而尊贵的驾乘感受。该款新能源汽车将在沈阳实现国产。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康思远表示:“新BMW 530Le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是华晨宝马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华晨宝马致力于可持续发展、致力于生产更加环保节能汽车的坚定决心和卓越执行力。中国是宝马在全球第一大市场,BMW 530Le等新能源汽车的入市,对宝马集团实现全球范围的节能减排目标也至关重要。”

环保责任 高档汽车领军企业责无旁贷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汽车尾

气排放已成为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高档汽车制造的领军企业,宝马有责任和义务不断降低自身产品的尾气排放,制造更加清洁、环保的汽车。BMW 530Le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作为国内高档汽车品牌的领军企业,华晨宝马在新能源车开发领域也一直走在业界的前列。早在2011年,华晨宝马新能源车就曾亮相上海车展。2013年4月,华晨宝马即已发布合资新品牌“之诺”,首款车型1E2013年底亮相广州车展,创领行业的租赁模式也于2014年初启动。2013年9月,华晨宝马研发中心正式成立并专门设立新能源技术中心,该中心拥有先进的设备,比如高压测试设备、电动车实验室、模拟车型和声学测试设备等。本届车展首次亮相的BMW 530Le同样是华晨宝马新能源车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在研发节能减排车型、保护环境领域所做的不懈努力令华晨宝马成为国内最具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受尊敬的高档汽车制造商。

BMW eDrive电驱动技术 源自BMW i的尖端科技

华晨宝马建立11年来,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其研发能力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从上一代国产BMW 5系Li开始,华晨宝马研发人员和工程师即已开始全面参与这一款专为中国市场而生车型的研发工作。随后在当前一代BMW 5系Li和3系Li的研发过程中,华晨宝马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13年,企业更进一步在国内高档汽车生产商中率先推出合资自主新品牌“之诺”,并推出国内第一款零排放的高档纯电动SAV之诺1E。

BMW 530Le所采用的eDrive技术源于BMW i车型,拥有全球领先的电池能量管理和电驱动技术。其常规动力单元则来自BMW 5系Li的现有动力总成,高效、节能、安全、可靠,面对中国当前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和使用环境,BMW 530Le是华晨宝马针对节能减排所提供的最具实用性的解决方案之一。

超低油耗和排放 成就豪华商务轿车环保标杆

创新的BMW 530Le拥有三种驱动模式,可以实现纯电驱动、混合动力驱动和汽油发动机驱动。纯电动模式下,续航里程最高可达58公里,基本能够满足车主在城市里的日常通勤需求。BMW 530Le保留了目前BMW车型应用非常广泛的黄金动力组合:BMW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合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令车辆完全摆脱了电动汽车续航里程限制所带来的不便,车主得以轻松应对远途驾驶。BMW 530Le的电动/混合动力驱动模式让它尤其适合大型城市的拥堵路况,能够有效节约燃油消耗和降低尾气排放。超低的油耗和尾气排放无疑将为国内豪华商务轿车细分市场树立无可匹敌的环保标杆,并且在短期内很难被超越。

随着这一新能源车型的加入,BMW 5系长轴距家族的产品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未来伴随华晨宝马研发实力的不断提升,也一定会有更多“中国源,为中国”的宝马车型诞生。

要使中国经济回归常态，宏观调控即要适应潜在增速回落与外部环境变化等“新常态”，更好解决此前宏调后遗症和经济结构失衡的阶段性“非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非常态”

中国大陆2014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7.4%、7.5%和7.3%，呈现总体放缓态势，这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

我认为，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不仅源于潜在增速回落与外部环境变化等“新常态”条件，而且与调整早先的宏观经济失衡的阶段性“非常态”因素有关。预计中国在未来两三年可大体完成调整，并迎来新一轮自主景气增长。

经济增速为何放缓

2012年二季度中国GDP季度同比增速“破8”，此后至今一直在7.5%上下波动。2014年前三季度部分经济指标再度走低。如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为15.3%，比上年回落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实际同比增速为8.5%，比上年回落0.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同比增速10.8%，创2011年以来最低。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双重意义的下行压力。一是两年多来经济增速在7.5%上下，比早先30多年近10%的增速回落两个多百分点。更需重视的是，近年7.5%上下实际增速，并不完全是经济内在增长动力推动实现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稳增长政策支持的结果。没有政策层面的努力，经济增速会显著低于目前的水平。

近来学界讨论的视角，是把经济增速回落归结为适应“新常态”的结果。“新常态”大体是指中国经济运行新近呈现出的趋势性和结构性变化及其派生状态。较有共识性的看法认为，随着劳动力总量增长见顶、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回落、后发优

势效应减弱，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趋于下降，目前应在接近8%的水平。

潜在增速回落的判断对观察目前的形势有重要认识价值，但仍不足以全面解释上述两重意义的经济增速走低。问题在于目前的经济内生动力难以支持7.5%的实际增速。实际经济增速相对潜在增速偏弱，显然不能直接从“新常态”条件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而需要结合调整消化早先的经济失衡累积的矛盾这一“非常态”因素方面寻求理解。

具体地说，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大，一方面是源自结构性因素即“新常态”；另外是源自周期性因素，这跟过去十余年货币信用扩张过度导致的失衡的调整有关，或许可称之为“非常态”。

中国官方政策表述以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为基调，然而具体政策内容包含了“非常态”分析因素。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概括经济运行的9个“阶段性特点”，“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特点表现为“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之所以需要减杠杆与去泡沫，是因为早先宏观失衡伴随杠杆率偏高和某些领域泡沫化问题，化解这些矛盾大体属于周期性而不是常态性问题。

是否从“新常态”与“非常态”因素叠加角度认识目前形势的成因，会影响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推测判断。如果把过去一段时期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只归为“新常态”，可能导致对长期增长前景偏于悲观，与中国长期发展和追赶战略期的基本判断不尽一致。

如果实事求是地认识到目前经济下行

压力，本质上是政策与市场对早先宏观失衡的调整的特定阶段派生物，其实具有“非常态”属性，才能更好理解目前经济增速会显著低于长期潜在增速的内在逻辑，才能更好地把“稳增长”政策与“调失衡”政策结合起来。

政府如果不追加扶持增长举措，经济增速还会回落调整，2015年到6%多都有可能。如果调整平顺实施，短则一两年，长则两三年后，这一轮调整有望大体完成，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转变力量会推动经济企稳并走向新一轮开放宏观景气。等到上一轮失衡大体完成调整和近年结构性改革措施发力之后，经济增长有望回归8%上下。

中国潜在增速在20年后可能达到5%-6%，然而潜在增速下降应是一个渐进与缓慢的过程。现在的潜在增速不应是6%，实际增速可能指向6%，但主要是调整早先失衡的“非常态”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不是完全由潜在增速决定的正常情况。

因此，2015年政府相当可能会把经济增长目标调到7%甚至更低，并淡化这一指标。在调整消化失衡时期，维持7.5%目标底线过于勉强。

“非常态”与宏观失衡

本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与此同时，体制改革滞后与要素价格扭曲推动货币信用过度扩张，与基本面的强劲增长相互激荡，为经济运转持续注入偏快、偏热的压力。而当时的宏观调控手段难以根治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因素，结果逐步形成了宏观经济失衡的格局。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观察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的形成机制。

首先是改革滞后与要素价格扭曲。比如汇率这个相对价格没搞对。数据显示,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近4倍,2000-2011年相对OECD国家平均水平增长约2倍。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制造业是最重要的可贸易部门。而且在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大幅追赶发达国家的背景下,人为维系盯住汇率体制,或者过于强调稳定汇率目标,会导致本币动态低估失衡。汇率价格没搞对与其他因素一起,成为助推国际收支顺差一度快速膨胀的关键原因。另外,利率和土地等关键要素价格也没搞对。

其次是货币难管好,即货币信用扩张偏快。2012年实际经济总量是2003年的2.45倍,但是广义货币却是4.4倍,央行资产规模是4.7倍,社会融资总额达到6倍以上,货币及负债扩张幅度是实际经济增幅的2-3倍。

再次是通胀压力表现为结构性物价上涨新特征。货币扩张偏快会导致通胀压力,然而在本世纪初年的通货膨胀呈现出新特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呈现间歇性大幅飙升,如商品房均价不到10年增长好几倍。对比考察2003年-2012年间十余种宏观物价指数涨幅,可见不同商品价格涨幅是不同的,甚至相差非常大。

最后是宏观调控过于宽泛化与深层改革难推动。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主体部门过多,工具过于宽泛,多达十余个行政部门被赋予或自称是宏观调控部门,几十种政策工具手段作为宏观调控措施采用。宏观调控手段包括利率、财政平衡等,但是中国政府在实际操作中过多依靠审批投资、有保有压、限贷限购等,有时还诉诸冻结供地、价格管制、大案查处等超常规行政干预措施。而且,宏观的产业化与微观化倾向延续多



年,形形色色的管制派生出新的设租寻租利益格局。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货币信用总量是影响短期宏观经济涨落的“水龙头”,利率和汇率等是调节引导总需求的“牛鼻子”。而宏观调控过多采用产业、数量、行政性工具,难以对宏观失衡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总之,中国经济宏观失衡既是体制不完善与改革滞后的结果,宏观调控效果不彰又维系了这种失衡。

中央对经济失衡的调整

中国经济需要经历一次阶段性调整,才能重回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调整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要在保持经济增长在大体可接受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出清机制和重建财金纪律,调节早先累积的失衡因素,并通过结构性改革再造自主增长的体制条件。

针对“4万亿”刺激伴随的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的形势,上届政府后期已经开始对宏观失衡的某些突出问题进行局部调整。但是受主客观条件限制,当时尚未能充分认识到调整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十八大以后,新领导层重新定位经济与宏观调控目标优先项,中国经济进入了

全面深化改革与主动调整失衡的新阶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上任就说,“非不能也,不为也”,意思是经济增速可以低一点,不要看到经济下滑就惊慌失措,马上要出台刺激措施,要平常心看待调整过程。这与目前“新常态”中心词其实传达了类似认知和政策取向。

近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定位于全面深化改革,以激活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宏观调控则体现出两点取向:保持货币与财政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的大体中性状态,在此基础上,利用市场出清和调整功能化解早先的宏观失衡问题。同时侧重采用定向调控举措实现稳增长目标。

李克强总理处于实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第一线,当然要把经济增速尽量稳住。待经济走势更充分显示不必维持偏高增速时,再将增速目标适度下调,显然是比较稳妥的办法。当然这只是我个人观测。就是说,虽然这几年是调整期,由于政府积极实施稳增长措施,经济增速也不能从8%骤然降到6%甚至更低,而是逐渐减速探底以求比较平顺调整。

虽然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但十八大以来,对经济失衡的调整已经在多方面取得

阶段性成效。

首先是“挤水分”，即消化调减早先扩张期形成的偏高产能。如钢铁等上游部门超常扩张，到2008年已面临调整压力，但“4万亿”刺激时期这种失衡进一步加大，目前正在经历艰难的产能过剩调整。近年PPI负增长与CPI正增长并存，重工业部门PPI负增长与轻工业部门PPI零增长并存。这并非资产负债表危机带来的恶性通缩征兆，而是市场相对价格调整上游部门早先过度扩张失衡的表现。

其次是“去泡沫”，即治理房地产等部门过度扩张与价格虚高。2003-2008年货币信用扩张推动房价多轮大幅上涨，大部分时间房地产投资增速高达30%。“4万亿”时期房地产经历新一轮更为迅猛的扩张。房地产失衡本质上是货币过度扩张现象，随着十八大以来货币与宏观政策定位温和、中性，房地产部门之前潜在的过量库存与风险开始水落石出。

再次是“减杠杆”，即规范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过度扩张。近年政府在防控系统性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限制地方债务过度扩张。在影子银行方面，也逐步改进相应监管。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有序化解降低高杠杆率带来的风险。

最后是“调预期”，即引导市场转变经济增速回落时政府必然重手救市的预期。

“4万亿”刺激客观上增强了政策救市的预期。近年宏观调控保持定力、以稳为先，既不收紧也不放松，利用市场力量稳健调减过剩产能、降低过高杠杆与调节虚高价格，允许个别金融产品违约。市场开始转变“政策是跌出来的”这种一度流行的预期，而这有利于提升硬预算约束与宏观财金纪律的有效性。

调整新阶段的政策建议

这轮失衡的调整应该会经历三个阶段：针对“4万亿”刺激后通胀卷土重来的形势，当时政府初步实施了一些局部调整政策；十八大以来，新决策层尊重调整规律，主动推进调整，引导推动调整全面展开，并取得阶段性重要成就；目前经济运行正在向以深化调整为特征的第三阶段过渡。

在调整的第三阶段面临多重任务：一是要在经济减速背景下，较大程度地消化上游工业部门与房地产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与库存；二是借助市场出清机制与政策调节功能，使金融部门的高杠杆与高债务风险得到控制与阶段性化解；三是推动宏观调控朝更加科学化方向转型。

如果以上任务能够大体平顺推进，预计未来两三年就可以基本完成调整，并迎来新一轮自主景气增长，届时中国将在全新历史起点上展开其经济崛起与追赶的后续历史进程。

为了保证上述目标的顺利实现，我有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明确坚持改革调整的政策取向。在调整深化阶段，各种深层矛盾和风险会进一步外化，呼吁刺激与回避调整的观点及其影响力会增加。决策层应继续坚守十八大以来结构性改革的优先目标，保持定力，积极作为，稳健推进改革与调整。

第二，适度下调经济增速底线目标。由于消化过剩产能与调减过高杠杆等具有减速效应，在调整期应允许经济增速暂时低于潜在增速。考虑近年宏观经济走势与劳动市场情况，建议把增速底线目标下调到7%或略低水平。政府对经济增速目标应更多从预测性和指导性角度加以阐释，不宜特别强调其指令性或刚性效力。

第三，货币政策需要适当重视运用总量工具。下一步央行需考虑采用普遍降准这样的总量工具。选择适当时机普遍降准，是对早先的超常存准率管制的逐步退出之举，也是利用市场化手段稳增长的自然合理之策，还有助于相对瘦身央行资产负债表，并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配套条件，可谓一举多得。当然降准无疑应审慎，关键是保持广义货币和流动性总量动态适度增长，严防货币过度扩张与通胀卷土重来。

第四，综合施策治理金融市场失衡因素与潜在风险。对失衡的调整意味着预算约束硬化与重新洗牌，应允许特定影子银行产品违约，打破刚性兑付预期和提升市场风险意识。同时采用破立结合、堵疏结合思路综合治理地方政府债与影子银行问题。

例如在规范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过大与多头举债问题的同时，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合理机制。又如在要求影子银行违规表外业务回归银行表内的同时，积极探索资产证券化的常规发展路径。

第五，对超预期的小概率事件冲击要未雨绸缪。未来两三年大体平顺完成调整具有最大的可能性，但是也不应排除2015年外部和内部形势演变出现超预期的不利变化的可能性。

需重视对国际形势研判，及时发现和应对国外各类不确定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需适当提高国内银行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并充实计提拨备资金以减少金融系统脆弱性。加强对金融风险触发因素的研究预判以增加应对金融风险的主动性。还需加强宏观审慎措施，在劳动市场、企业重组、减免税费等方面研究应对冲击的预案，以便在小概率事件万一发生时能够沉稳应对，以确保调整改革取得最后成功。

□ 编辑 王毕强 □ 美编 虎妹

文 /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记者 / 赵福帅（采访整理）

中国经济已处于“经济新常态”，这意味着经济不能再单纯依靠出口、基建、房地产这“三架马车”来拉动。必须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寻找“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点

▶ 十八大两年来，中国经济挥别“4万亿”，GDP增长率从高速逐渐过渡到中高速，形成“经济新常态”。

在此背景下，新一届政府顺势而为，大刀阔斧推动改革。放开影子银行、利率市场化、审批制改革等可圈可点，上海自贸区则需要顶层设计，户籍改革、国企改革等仍可更进一步。同时，收紧货币成功迎来地产调整；但通缩风险露出苗头，货币政策或可适度放松。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竞相亮相：制造业升级、服务业扩展、京津冀一体化、中三角崛起、企业走出去等，中国经济的更大格局呼之欲出。

经济进入“新常态”

近两年，中国经济正经历调整期。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世界经济都在调整。中国经济本应同步调整，却在2008年、2009年推出了“4万亿”。但是大规模财政刺激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经济调整只是稍微滞后，近两年经济增速也开始下滑。

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弹性大概是0.1，即出口增长10%，GDP要增长大约1%-1.2%。中国的出口在金融危机以前每年的增长速度接近30%，现在跌到不到10%，因此GDP的增长率最少跌两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也在下滑。房地产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比出口更大，弹性在0.15左右，即房地产业的增速下降10%，GDP就得下降1.5%。

所以房地产和出口两个部门的下滑就会使中国的GDP增速从将近10%跌到7%-7.5%之间。



除了出口、地产，“4万亿”之后，基建的增速也在下滑。

总之，今后房地产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可能只有1.2%-1.3%，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可能也就0.7%-0.8%，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可能再猛上了。

所以我们的确到了一个“新常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经济新常态”，这是顺势而为的提法。中国经济在调整，进入了一个较低速度增长的时代，从之前接近10%到7%，可以把这称为“新常态”。

“新常态”的另一层含义是经济结构调整，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或者两者并重的过程。未来，服务业大有可为，我们应大力发展。目前，李克强总理正在主抓，就是要放开服务业的进入管制，医疗、律师、咨询等等都应该降低门槛，这既可以解决大量就业，又能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三方面，“经济新常态”也意味着，

今后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加关注内涵的发展，而不是外延的扩张，要注重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让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跑平甚至跑赢GDP的增长。

这是我理解的“经济新常态”的三个方面。

至于这种“新常态”是三五年的低速调整，然后又进入中长期的较高速增长，还是此后20年中国GDP的增速就维持在这一水平，这完全取决于外部因素。如果世界经济又复苏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又能达到10%，GDP增速就会提高一些，可能会接近8%。否则，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就在7%-7.5%之间，估计不会掉到7%以下，当然这是潜在增长速度。有人会说，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会在6.5%左右，我觉得太悲观了。

改革超出预期

十八大两年来，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一届政府在经济领域启动了一系列改

革。很多改革已经超出预期。

金融改革走得非常快，比如放开所谓的影子银行。以前这都叫非法集资，是可以判死罪的。曾成杰最后被执行了死刑，这一事件震动很大，就发生在2013年。最近讨论集资诈骗罪可能要取消掉死刑，等于是可以去做了，这是很大的进步。

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银行也跟着市场走了。基准利率只是对国有企业有用，其他都是随行就市的。

由于影子银行开放，存款利率也等于在边界上开放了，投资者可以不把钱存在银行，而是到影子银行投资。这一改革力度是非常大的，只不过没有把它叫做金融改革，等于悄悄地就把这件事做了。

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甚至超出预期，但也要小心走得太快，相关配套一定要跟上。一般情况下，当利率市场化改革时，利率都会上升，然后下降，有一个调整的周期，全世界都如此。中国目前采取了非常紧的货币政策，就容易使得利率上升过高，这是需要小心的。

余额宝等“宝宝们”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对银行的冲击很大，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改革。当然我们还期待能继续推进，对真正的银行体系进行改革。我想虽然没有在名义上，但是实质上已经在进行，因为放开影子银行，对正规银行冲击就很大。

李克强总理推进审批制改革的力度也很大，都在亲力亲为。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想取得更大的效果，还需要进行系统的顶层的改革。

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现在还是有点长。症结在于负面清单一定要由中央层面给，不能地方给，地方给就违规了，因为地方说不需要某项审批，但中央可能还要审批，所以一定要中央给授权。

另外，自贸区的定位要更清晰。生产型的自贸区，投资可以免税，这是优惠政策。而上海自贸区主要是搞服务业、金融业，它们的影响超出了自贸区的边界，自贸区之外的银行就会有意见。所以需要在中央层面

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就在7%-7.5%之间，估计不会掉到7%以下，当然这是潜在增长速度。有人会说，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会在6.5%左右，我觉得太悲观了。

有一个顶层设计。

最后，要让上海自贸区真正起到效果，就必须推广，否则会引起很大的矛盾。比如资本管制，搞试点反而可能乱，完全可以中央出一个政策，大家都去做，没有必要让一个地区先试点。我们看到中央最近已经提出要加快推广了。

改革未来仍可完善

户籍改革、预算改革、国企改革等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已经出来了，但地方上还没有真正动起来。最重要原因就是1958年颁布的《户籍登记管理条例》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修改这部法律，它当时是人代会通过的，所以必须人代会才能改。中国有很多改革需要先改法律，现在我们讲依法治国、依法改革，要树立法律的权威，不能这边法律还在实施，那边就做了。

户籍改革没有真正落实，除了法律上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利益还没有摆平。地方政府会说，我的人口增加以后，各方面支出都增加，所以必须增加我的财政收入。这种利益的调整还没有协调好，而这背后又涉及到财税改革、社保医疗改革等。

《预算法》的修改方面，除了让地方政府自借自还，还一定要有相应的后续措施。比如发债一定要在地方人大通过，地方人大不通过，不能报到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预

算改革也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改革结合起来，这些平台应该跟政府脱钩。

对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我觉得还可以更进一步。中石化卖掉了一小部分资产，但是对中石化没有根本触动，企业治理没有改变，干部还是中组部任命，甚至国资委都没权任命。而且央企太大了，靠民营企业去稀释它，这不容易做到。

现在国企已经成了中国经济里的一个疙瘩，造成了很多扭曲，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因为国企领导注重过程，而不注重结果，过程到了就行，盈利多少跟他没关系。这必须改。

我建议，可以进一步把国企变成公众公司，让它们缓慢上市，让老百姓分享国企增长的红利。这样国企就会既向股东负责，也向政府负责。

宏观调控要有新思维

2014年前几个季度的GDP增速下滑明显，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可能有通缩的风险。现在整个房地产价格在往下走，租金也在往下走，其他物价也没涨，食品价格也是稳定的。所以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真的有可能进入通缩。我们不愿看到1998-2001年那几年通缩的状态，现在应该吸取教训，预调微调，看到有通缩苗头就赶紧放松货币。

我不敢说是否这次收紧货币、调整地产的结果超出了政府的预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潜在增速不应该这么低。

中国近两年的潜在增长率，应该还在7.5%-7.6%。2014年前三季度平均不到7.4%，估计全年至多7.4%，所以比潜在的增长率略低一点。这当然是需求不旺造成的。所以我们的货币政策可能稍紧了一点。

本届政府一开始可能认为我们的货币太多，货币增速太快，但是对货币去哪儿了没有完全准确的认识。政府大概看到这些钱一部分进入房地产，一部分在金融体系里空转，没有真正到实体经济。所以想通过

紧缩银根促进地产调整,并把一些空转的资金挤掉,让它真正进入实体经济。

但是用M2的增速来说货币太多,可能是有问题的。M2增长的钱到底去哪儿了?地产业吃进了一部分,变成了固定资产,这部分问题不大。

但是还有一部分钱可能完全沉淀了,成了中国经济里的暗物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路不正的钱,不能存到银行,没进入流转。到底这种钱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我想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最近媒体报道的河北省某科级干部家中就搜出上亿元现金,就是一个佐证。另外,每年还有很多钱流到海外。

所以,认为把货币总量减少了,实体经济的钱就多了,这就不太可能了。货币一紧缩,最后发现最受挤压的反而是处于边缘的中小民营企业。

因此,货币政策应该再宽松一点。这样好多企业就活过来了,经济增长就上去了。

对于放松货币的方式,增加货币量比调货币的价格可能更管用。因为利率现在已经非常高了,市场上的贷款利率普遍在11%-15%,所以降基准利率一两个百分点,作用不会很明显。但如果货币数量增长,因有乘数效应,取得的效果就会比较大。

我不建议用财政的方式刺激,因为这还是老思维,不是市场的思维。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明白、不相信市场自发的调节能力,一看经济下降,就赶紧上投资项目。但这些投资,很多都没有起到拉动经济的效果,造成大量浪费。

即使采用财政政策,也应该引入新的模式。新一届政府在基建领域推广PPP模式,即引入社会资本和管理机制,这是非常必要的。政府应该划清与市场的边界,能PPP的就PPP,商业公司可以做的就完全放手。现在好多老板去搞工业地产,运营得也很好,可见工业园区也可以由私人来做。

新增长点应全面开花

在中高速增长“新常态”背景下,中

现在一提创新好像就是
仅仅指服务业、互联网,
把大家搞得人心惶惶,这
不是一个好事情。中国
是制造业立国的国家,
要先把制造业搞好。而
且制造业还有很多潜力,
有升级的可能。

国会有一些新的增长点?我认为,中国的增长不可能再靠某个行业引领,就像过去的“三架马车”——出口、基建、房地产。有人老问新的增长点在哪儿,想再找一个,这种想法要变一下。以后可能是全面开花,每一个行业都小长一点,这样集腋成裘,整体经济就增长起来了。

如果再像以前的思维,又会出问题,比如可能又会拼命搞城市化、区域开发、猛上基建,又重复“4万亿”。中国的体制决定了政府容易使用财政政策,结果留下很多后遗症。这轮抓贪官,有很多就是“4万亿”闹出来的。

未来中国的制造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企业走出去等都值得关注。

制造业现在面临产能过剩问题。但压缩产能不应由政府去做。因为现在处于经济的低潮期,产能是过剩的,可是经济一旦进入上升期,就会发现产能又不够了,所以应该让企业自己去压产能。

另一方面,制造业的的确确进入了调整期,增长已经达到顶峰,制造业的比重会逐步下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制造业,恰恰相反,制造业还应加强。现在一提创新好像就是仅仅指服务业、互联网,把大家搞得人心惶惶,这不是一个好事情。中国是制造业立国的国家,要先把制造业搞好。而且制造业还有很多潜力,有升级的可能。

中国的传统产业现在慢慢地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地位,如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企业,都成为了一个产业的主导。还有造船业等,也都应该坚持下来。

区域开发方面,我们知道习近平总书记直接抓的京津冀一体化,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三家已经坐下来谈了,开始建立起协调机制。

另外,“长江经济带”也应该好好开发。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沙、株洲这一带,江西、皖江这一带,工业基础良好,交通设施不断完善,很有发展潜力,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要发展长江中游,就应该把南京长江大桥等一些老桥拆掉重建,因为桥太矮,万吨轮船过不去。如果万吨轮可以直上武汉,武汉的经济立刻就会打开,很多出口立刻就会转移到湖北、湖南一带,长江就成为一条海岸线,华中地区就是沿海了。长江是条黄金水道,三峡大坝修建后,本来江海联运可以大发展,但是我们没把它用起来,很可惜。

这几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并购和国际化进程非常活跃。政府不要只关注国企去海外买资源、买土地等,其实这是最坏的做法,外国会说中国是新殖民主义。土地和资源不是一般商品,容易拨动民族主义情绪,试想如果一家国外公司大量买中国的土地,国人会怎么想。

对于企业走出去并购等,政府部门应该提供更多的便利,不要换个外汇都审批来审批去。一旦有并购机会,都是在两三个月内拍板,半年间钱就到位;审批一圈下来,机会早没了。

中国2014年会成为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这个历史性变化之后,政府应该有一些举措来帮助我们海外的企业。我们也可以效仿日本的贸易振兴机构,成立一个机构来专门支持企业的海外发展,现在这方面还是欠缺的。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大陆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运用金融政策工具，激活实体经济。

金融活水浇灌实体经济之树

——国务院金融改革期中考

2014年的11月22日，中国央行时隔两年多首次降息的消息充斥各大财经媒体。这次非对称降息给人们的生意和生活带来的影响，则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当大妈们赶去银行“倒存折”的时候，很可能发现存款的利率反而比之前更高了。这一切源于，央行决定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几乎所有银行，包括国有大行在内，均将多地区的各档期存款利率上浮至顶。

对广大中青年“房奴”也值得庆祝。因为房贷基准利率是降息前的9.4折，而且按照目前多家银行执行的房贷利率9折优惠，折合后相当于降息前利率的8.5折，合计月供利率为5.2275%。这比部分银行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还要低。

如果你目前办理存贷款业务的国有大行又远人又多，没关系，现在选择一家家门口的小银行吧，无论是城商行还是农信社，你都不必担心这些银行是否会出现倒闭的情况。因为2014年存款保险制度已经出台，实施最高50万元的有限赔付，只要你的存款不超过50万元，就可以安心地睡觉了。当然超过50万元也没关系，你仍然可以依法从投保机构清算的财产中获得赔偿。

如果你有个前景不错却不大的企业，又急需资金，降息后的贷款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自不必说。也许你不知道的是，2014年央行已经两次“定向降准”，如果银行的“三农”和小微贷款达到一定比例，就有可能享受此种优惠。这意味着，你的企业

很可能成为直接的受益者。

利率市场化、定向降准、存贷比新规、存款保险制度……当很多人把这些当做高高在上的政策在看新闻时一扫而过时，它们却让我们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告别利率“一刀切”

与此前“一刀切”的调控政策不同，非对称降息和定向降准释放出本届政府定向调控和区间调控结合的信号。

2013年7月，央行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改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刚刚过去的降息，除了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0.4个百分点至5.6%、下调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至2.75%以外，还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利率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

有意思的是，虽然降息的消息已经公布，但是储户去银行存款更多的是“利率不变”，如果去大行，还会出现“不降反升”的情况。

降息前，根据央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3%，多家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执行了最高上浮1.1倍的利率标准至3.3%。但是国有银行则表现淡定，多数地区保持基准利率。而降息后，基准利率下降至2.75%，但浮动区间扩至1.2倍。中小银行多数应声上涨20%，维持3.3%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而国有大行在刚开始维持3%后不久，也随即将多地区存款利率上浮至顶。

央行称，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后，

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定价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的定价策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金融机构不断提高自主定价能力，转变经营模式，提升服务水平。

“本届政府就任以来，大家共同的感受是在利率市场化方面步伐比大家想象的要快得多。”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说。“可能看上去只是取消了一个下限或者扩大了一点范围，但是整个利率市场化的过程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涉及多领域和多因素。虽然未来仍将面临种种困难，但是只要方向正确，总会体现出价值。”

“定向”信号还体现在存款准备金。

2014年，央行两次实施“定向降准”，分别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2个和0.5个百分点，并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其他各类商业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样的正向激励措施，对促使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更多投向“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起到了作用。

存款准备金率是指，商业银行的初级存款中不能用于放贷的部分的比例。为保障存款人的利益，银行机构不能将吸纳的存款全部用于发放贷款，必须保留一定的资金，缴存在央行，以备客户提款的需要，这部分的存款就叫做存款准备金。而存款准备金与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

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是对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创新，有利于引导优化信贷结构，既避免走“大水漫灌”的老路，又为稳定经济增长、激发经济活力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



监管层表示，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是对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创新，有利于引导优化信贷结构，既避免走“大水漫灌”的老路，又为稳定经济增长、激发经济活力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

扶助小微“三农”

“这两年好多了。”蒋先生是义乌一家外贸型企业的负责人，从事袜子生意。据蒋先生介绍，义乌外贸型小微企业（商户），多是前店后厂模式，每当换季时，购进原材料的资金就会告急。此前多是通过亲朋借款或借高利贷，资金成本大多较高，有时年息要超过20%。

“与此前银行贷款需要抵押物不同，很多银行推出了针对小微的特色服务，比如商铺经营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专利权质押等等。”不久前，他就通过行业协会，从中信银行获得了贷款。

针对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中信银行义乌分行零售银行部副总经理申屠美勇表示，与当地行业协会合作，是小微贷款的突破点。

义乌市内衣贸易行业协会会长周名松称，义乌从事内衣贸易的小微企业有2000余家，行业协会会有企业相关的经营流水、

营业期限、信用记录等数据，可以为优质会员企业与银行提供对接。

面临资金问题的不只是小企业。

北京一家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以前只是个普通的农企。负责人孙宝胜回忆说，由于投资大、收效慢，又受天气和市场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企业以前在银行贷款时面临诸多困难。如果不能从银行贷款，就要面临小贷公司高达20%的年息。

近两年来，随着政府持续出台支持“三农”的政策，孙宝胜的企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华夏银行在对该企业进行经营能力、企业资质和发展方向等评估后，给企业发出了两年期的“年审制”贷款700万元。目前，该企业已发展成集葡萄种植、采摘、娱乐、休闲为一体的专业合作社。

2013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措施，推动金融机构加强涉农贷款和小微贷款的投放比例。包括孙先生和蒋先生在内，诸多涉农企业和小微企业从中获益。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9月末，涉农再贷款较2013年同期增加429亿元，支小再贷款同比增加465亿元，涉农贷款利率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分别下降约0.5个百分点。

对于银行来讲，政策在鼓励资金流向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的同时，也对其进行“松绑”。存贷比这个被业内认为是近年来束缚银行发展的监管指标，在2014年开始松动。

7月1日开始实施的存贷比新规，计算存贷比分子（贷款）时，从中扣除6项，其中多数涉及小微企业贷款和“三农”贷款。

“按照测算，涉及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贷款扣减项可能为1.5万亿元的规模。”华泰证券分析师林博程称。

而由于存贷比的限制而推高的一部分资金成本，也将随着新规的出台有所降低。“以前，放75元的贷款需考虑100元存款成本，而以后放75元的贷款只需考虑75元存款的成本，这类贷款的资金成本降低25%。”鲁政委分析。

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除了小微和“三农”的薄弱环节，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金融政策已经不仅仅是一只无形的手，更是一只有力的手。

国家开发银行不久前成功发行2014年第九期铁路专项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总规模150亿元。这是银监会推出证券化备案制新规后的首单产品，也是目前国内发行

单笔规模最大的证券化产品。

铁路改革是本届中央政府推动行政体制和市场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高铁建设又被寄予“稳增长”的厚望。但铁路系统的天量债务和建设资金，依靠传统的融资渠道已难以为继，因此必须引入新的金融工具。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将原本不流通的金融资产转换成可流通资本市场证券的过程。2013年8月28日，国务院第22次常务会议部署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工作，新增3000亿元的试点规模。

以国开行为例，2013年3000亿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总规模中，国开行获得1000亿元额度，成功发行10期证券化产品，包括5期铁路专项产品和5期混合资产产品，总规模达1013亿元，盘活铁路资产510亿元。这些证券化产品释放的信贷规模全部投向铁路、棚户区改造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根据官方统计，2014年1-11月，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2642.1亿元，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2285亿元，占比超过86%。仅8-10月，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就发行24单、914.5亿元，比2014年上半年增加121.3亿元。

国务院在2013年7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中要求，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引导、推动重点领域与行业转型和调整，积极支持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项目建设，对产能过剩的行业区分不同情况实施差别化政策。

不仅是“稳增长”和转型升级，金融在保障民生领域也在发挥作用。

李先生正在申请北京市丰台区的保障房，“我和我爱人每个月收入都不超过

2500元，申请材料在2013年就交了，（2014年）年底的这次摇号好像很有希望。”他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远一点的话，在五环边也可以。这样我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住自己的房子，入托的难度也会小很多。”

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消息，截至11月底，北京市保障房新开工量、竣工量、建设投资量已全部超额完成。此外，北京市累计分配保障房3.6万套，预计年底前还将陆续分配2.5万套。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在12月19日表示，2015年新开工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700万套，基本建成480万套。

李先生不知道的是，保障房建设的一大难题是资金筹集。近些年来，依托金融政策的支持，保障房等民生资金吃紧的问题逐步得到了缓解。更多像李先生这样的家庭，将有希望住进新居。

民营银行一朝破题

12月12日，就在各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像往常一样结束一天的营业时，“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获准开业”登上银监会网站的头条。对很多人来说，只是未来可能在家门口会多出来一家银行，但是对整个银行业来讲，却意味着迎来了新的族群。

如果2013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可以算是民营银行孕育的开始，那么在2014年通过试点方案、先后批准筹建后，首家民营银行出生。

2014年3月，银监会在各地转报推荐的试点方案中，确定了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7月，首批3家获准筹建，分别为：腾讯、百业源、立业为主发起人，在广东省深圳市设立深圳前海银行；正泰、华峰为主

发起人，在浙江省温州市设立温州民商银行；华北、麦购为主发起人，在天津市设立天津金城银行。9月底，银监会又发文同意：阿里、复星、万向、银泰为主发起人，在浙江省杭州市筹建浙江网商银行；均瑶、美特斯邦威为主发起人，在上海市筹建上海华瑞银行。

“回顾过去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金融体系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银行不断民营化的过程。”鲁政委说。“80年代初期，银行都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内。几大有银行要么是脱胎于财政部，要么是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职能是服务于计划经济，分投资指标、下拨资金等等。但是这在当时已经是一大进步，比此前的政府部门更加市场化一些。”

1986年，为了“让银行更像银行”，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成为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这家银行不是中央政府控股，而是由上海市控股。“为了防范风险，设定了资本充足率、存贷比、流动性比例和贷款余额比例等条件，但在当时，目的是为了给银行划定范围后，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区域，使银行能够在这个区域内相对自由地发挥。”鲁政委称。

此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广发、浦发、民生、兴业等一批股份制银行相继出生，这一代银行在市场化运作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2000年准备进入WTO时，由地方政府组建的城商行被放行，相比此前由省级、副省级控股的股份制银行，至少在控股的层级上下沉了一步。

一直到“纯”民营银行的问世。

业内对民营银行的诞生有一句颇为形象的评价，“民营银行试点的一小步，是打破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玻璃门的一大步。”

随着金融领域改革的深入，银行在股

东的性质具有更多民营的色彩,运作的机制更加市场化。这些银行业的新成员,会更加注重发挥股东的专业知识和行业优势,比如阿里、腾讯。

同时,与过去的银行大为不同,监管层对于对新银行的业务划定了范围,打破了以往银行没有禁区的规定。

根据当时5家民营银行的试点方案:阿里巴巴提出小存小贷模式;腾讯提出大存小贷模式;天津提出公存公贷模式,只做对公业务,不做零售;另外两家银行方案则提出在特定区域,做符合当地小微企业、金融消费者的业务。

“未来银行可能更多的是有限牌照,在专业领域发挥优势,支持经济的薄弱环节。”鲁政委分析称。

用制度防控金融风险

在提出设立民营银行的时候,更多的专家提出,民营银行健康发展的前提是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在发放‘准生证’的同时,要为银行的‘死亡’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这样评价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11月30日,《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出炉。这短短几页纸的背后,是28年的等待。据媒体报道,之所以会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是李克强总理的力主推进。当有人担心改革能否成功而没有对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李克强总理否决了这一“猫捉老鼠”的游戏规则。

有关学者表示,实行最高50万元的有限赔付,以低费率起步,将保费建立存款保险基金。50万元的保护限额,覆盖了99.6%的金融机构、99.5%的城商行和99.7%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人,这足以让以上绝大多数储户“放心存”。

虽然以中国目前的情形来看,银行倒



本届政府的金融改革

完善金融宏观调控

- 1 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非对称下调存贷款利率
- 2 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 3 完善金融监管政策,调整存贷比计算口径
- 4 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

- 1 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 2 金融服务“三农”发展
- 3 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 4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深化金融改革

- 1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 2 建立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
- 3 深化农业发展改革
- 4 开展民营银行试点
- 5 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
- 6 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 7 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
- 8 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 1 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 2 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
- 3 防范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 4 开展民营银行试点

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 1 启动“沪港通”交易试点
- 2 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
- 3 推动双边本币互换

区设立一年多来,围绕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服务业开放、完善政府监管制度等,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党中央、国务院已决定在更大范围推开,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目前,上海自贸区已有27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或部分地区推广,20多项比较成熟的经验正被加速复制。下一步还将有18项改革措施、5项开放措施在全国推广,包括允许设立外商股份制外资投资性公司、允许内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生产和销售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撰文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是国家经济转型下的战略需要。它的建立将打开中国的港口贸易、航空枢纽以及离岸金融等领域的创新成长空间,将对这些行业以及未来中国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未来有望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桥头堡。

2014年11月17日,历经半年筹备的“沪港通”正式开闸。虽是半年筹备,但其可向前追溯到2007年的“港股直通车”。

内地投资者可以投资港股市场,香港投资者可以投资A股市场,在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实现可兑换的情况下,沪港两地证券市场成功实现联通,对于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及其参与者的意义不言而喻。它为内地投资者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也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参与内地市场的契机。与此同时,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方面,也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论上海自贸区还是“沪港通”,排除重重阻力面世就是向世界宣布,中国正逐步敞开胸怀,以一个更为开放的心态迎接世界。

□ 编辑 王毕强 □ 制图 美编 虎妹

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中国(上海)自贸

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比通胀更可怕的通缩之中，为此当局应及时调整房地产和准备金等政策，尽快打通股市融资渠道。

中国经济有“通缩”风险

种种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处于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阶段。在“新常态”强调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及时和适度的逆周期宏观政策同样是必要的。

短期内，央行需要放松货币条件，降低融资成本，以避免经济增速偏离潜在增速，以及由此带来的通缩及就业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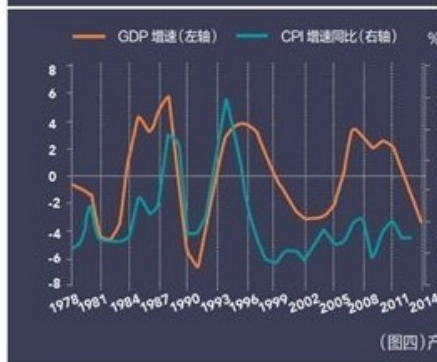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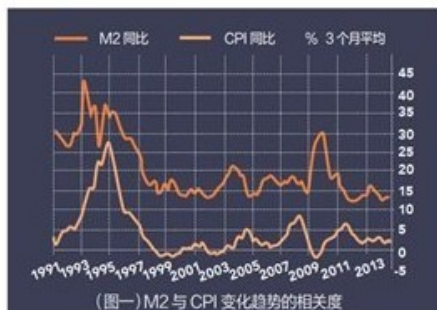
从中长期看，货币政策不能解决而只会放大结构性问题。在中国的高储蓄率前提下，只有有效打通股市融资渠道，才能真正降低杠杆率，同时保持增长、通胀、就业和国际收支在合理的区间内。所以，修复和处理股权市场的投融资功能是当务之急。

经济有“通缩”风险

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到底是多少，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计算和结论，但从通胀和国际收支的变化，以及PMI指数中就业指数的趋势来看，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低于其潜在增速，产出缺口（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额）不断扩大。

宏观政策的目标是调节经济需求，以使其尽可能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如果调节及时和适度，宏观经济应该可以避免通缩或通胀；如果实际增长高于潜在增长较多，就会出现通胀、贸易赤字、工资上涨等压力；但如果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长较多，就会出现通缩压力和贸易顺差大幅增加等问题。

从中国过去几个月的数据来看，第一，通胀指标开始警示可能有通缩的风险；第二，国际贸易盈余也大幅增加，其对经济增



速的贡献率在三季度飙升至三分之一左右。

首先，M2和CPI走势有非常紧密的相关度（图1列出），这种关系与基本面内的短期不变因素无关，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短期的通胀、增长、货币政策等宏观指数变化。

社会融资总量与房价变化趋势也有非常紧密的相关度（图2列出）。

CPI与PPI走势也有非常紧密的相关度（图3列出）。

PPI已经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了，这是货币政策偏紧的一个结果。此外，货币政策偏紧的另一个后果是实际利率偏高。

根据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如果政策不调整，产出缺口继续扩大的话，甚至只是保持在现有水平，中国经济2015年的增长也会面临很大压力（图4列出）。

产出缺口扩大，贸易顺差增速加大（图5列出）。2014年三季度的增长有1/3是来自于贸易顺差增长的贡献。这种状况如果加剧，会产生贸易摩擦，进而暴露出各方面的问题。

以上数据表明，一方面，持续的PPI负增长和实际利率偏高反映出货币政策偏紧



的情况, 引发了通缩忧虑。另一方面, 从产出缺口与CPI、GDP平减指数、贸易顺差增速等的关系看, 如果产出缺口保持在现有位置, 甚至继续扩大, 将会对之后的经济发展形成很大的压力。

综上, 目前中国处于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阶段。针对目前增速7%-7.5%的“新常态”, 包括房地产政策、居高不下的准备金率政策在内的很多政策都应该及时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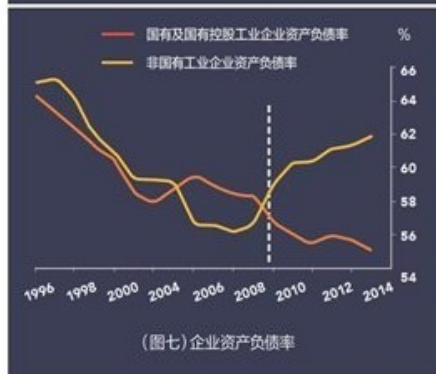
在“新常态”强调结构改革的大背景下, 及时和适度的逆周期宏观政策操作同样是必要的, 而且逆周期调整应该是总量的、市场化的调整, 而不是某些定向操作, 这也对经济中长期的健康稳定发展有益。

中国仍能较高速增长

有学者指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增速可以适当减慢。我认为需要正确认识中国到底处于何种收入水平。

目前看(图6列出), 中国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2%左右; 日本和英国大致相当于美国的80%左右, 处于第一梯队; 韩国、中国台湾等是美国的50%左右, 处于第二梯队; 巴西、马来西亚、阿根廷等是美国的20%左右, 处于第三梯队。

从这个层面讲, 中国还没有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那些曾与中国目前水平处于同一水平的亚洲经济体都曾保持过长时间的8%-9%的经济增长速率。



资料来源: 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经历了36年如此高增长速率的中国, 目前人均GDP仅达到美国人均水平的12%, 是因为我们的起点太低, 同时美国的

发展速度也不慢。中国无论是在科技还是生产率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未富先大”, 中国应该是历史上第一个经济总量世界第二, 但人均只有世界第85位的国家。如果未来中国只能保持5%-6%的经济增长率, 甚至是4%-5%, 中国追上美国将遥遥无期。因而, 中国仍需要保持高速增长, 才能较快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事实上, 中国与很多亚洲国家有类似的发展优势, 例如高储蓄率以及对教育的重视, 因而完全有条件重复日本、韩国的成功发展路径。所以, 只要政策合适, 中国仍然有保持高速增长的潜力和可能。

短期及中长期政策建议

我认为短期内还需要放松货币政策, 可以通过降低基准利率或准备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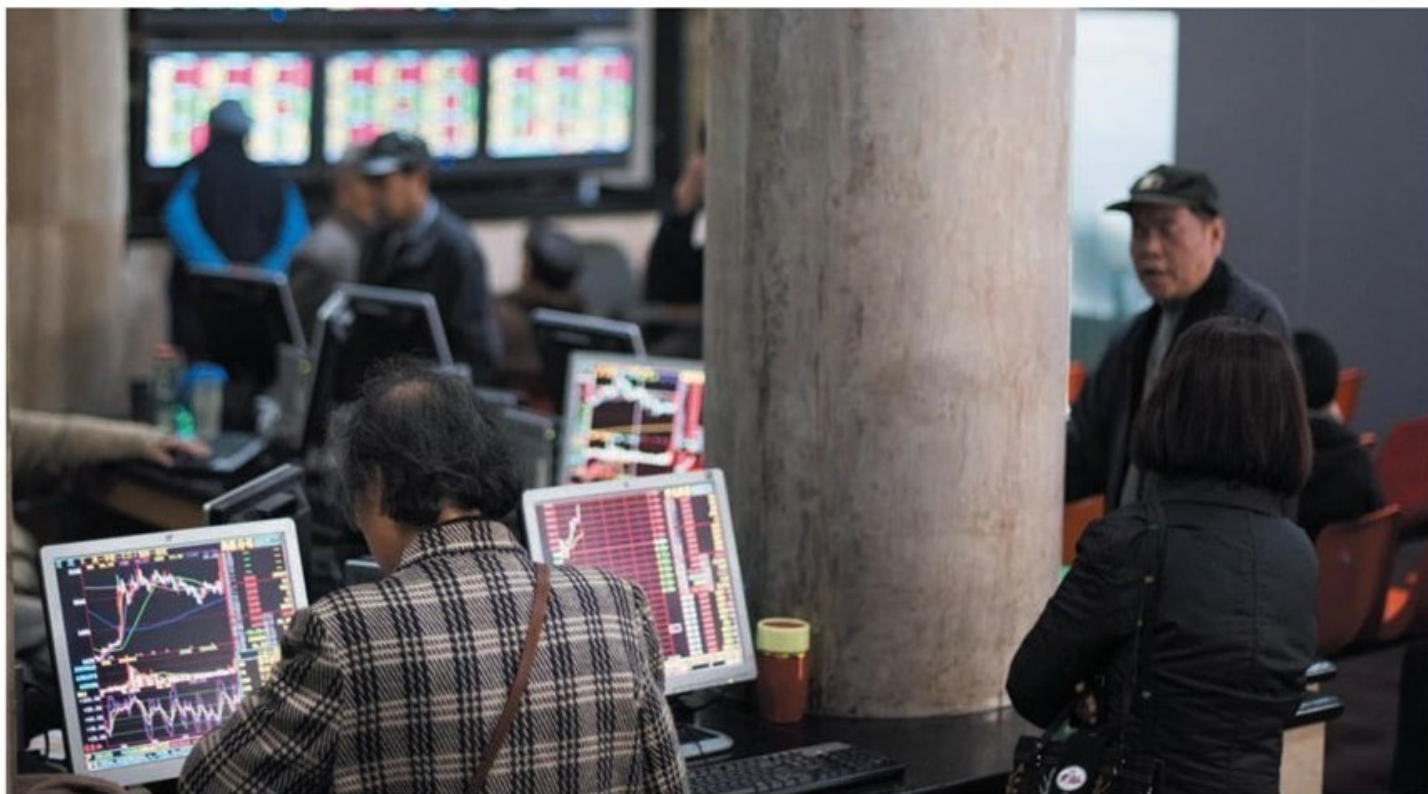
但是中长期货币政策对增长是中性的, 靠调节货币政策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 只会放大结构性缺陷带来的风险。从数据上来看(图7列出), 2008年之后国企的杠杆率(表证资产负债率)上升很快, 但非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是下降的, 因为非国有企业融不到资。因而, 货币政策不解决结构性的问题。

在中长期, 打通股市融资渠道非常重要。

在中国目前高储蓄率的前提下, 紧货币就会导致杠杆率的快速上升。经济周期下来的时候, 中国企业自有资金的滚动速度就会减慢, 如果缺少一个正常的股权市场, 杠杆率就会上去。

目前, 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股权市场的融资能力基本消失了。股市融资在社会融资的占比“惨不忍睹”(图8列出), 目前一年仅有的4000亿-5000亿元的股市融资, 使得企业自身靠盈利补充资本金的能力下降, 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股权融资渠道缺失, 降杠杆根本无法实现。要实现降杠杆的目标, 股市融资至少要在万亿元以上。因此, 打通股市融资渠道非常重要。

□ 编辑 王毕强 □ 制图 美编 虎妹



2015年的投资热点是什么？既不是房地产，也不是理财、信托、基金，而是股市。只要A股的银行股息回报率高于理财收益，内地股市就会继续保持上涨的趋势。

内地股市将涨到何时？

在多年沉寂之后，自2014年第三季度开始A股突然暴动。一时间，各类解释纷纷出现，但大多数解释仍停留于逻辑推演，而无法在坚实数据层面得到证实。以至于一些久经股市江湖的老刀笔，最后不得不上升到了“不是幡在动而是心在动”的所谓佛学境界来进行解释。

作为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信徒，笔者一直坚信：只有逻辑一致地解释了过去，才有可能正确预测未来！否则，就可能真的只是凑巧。因此，厘清2014年下半年突然发生的股市暴动，是尝试前瞻2015年的第一步。

股市大涨来自于跨资产套利的驱动，房地产投资、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收益

下降，让增量资金流入了股市，从而推高了大盘走势。

而过去的投资热点，如：房地产，现在的租金回报率只有2%左右；包括支付宝等各种理财产品，2014年上半年大多收益在6%以上，现在则只有4%左右。相比之下，股市更有吸引力，且不论涨跌幅，以银行股为例，年终分红回报率就有7%左右，已经超出了上述两类投资的收益。

非银行理财大行其道

笔者的解释逻辑源于生活的实感：近些年来，银行理财、货币基金（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宝宝类”）、信托、保险资管、券商

资管、基金资管等理财方式开始起步并迅速发展。囿于现行分业监管，银行理财基础资产仍然主要投向债券、票据、非标等固定收益类；而信托、保险资管、基金资管的领域则事实上并无限制，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在多种资产之间辗转腾挪。

根据图表1提供的数据，到2013年末，银行理财10.2万亿元，而其他非银行机构的理财规模28.6万亿元，接近银行理财规模的3倍，为彼时A股市值的1.2倍。

上述离开传统存款的理财资金，还没有包括对私募基金和其他民间投资资金的统计（近年来，大量公募基金经理和券商分析师纷纷隐退于各类投资公司，已折射

其发展之蓬勃和规模膨胀之迅速)。

撇开私募基金不提, 蓦然抬眼, 突然发现身边各类民间非银行金融机构网点雨后春笋般涌现: 门脸酷似银行, 经营各类吸金业务, 自然也包括理财, 收益率不菲,



没有金融牌照意味着其事实上的混业运作和自由投资。

进一步冷静观察, 竟然发现各类发展会员的“理发馆”、“洗脚屋”、“按摩店”、“美容院”、“健身房”、“洗衣店”等其实也完全具备上述机构的一应特征: 入会需要预存费用, 少则几千、多则数万, 有卡则2-3折(回报似乎也很丰厚), 这些机构募集来的资金无需托管, 自然也可自由投资。

因而, 以上诸种非银行机构理财规模巨大资金之动向, 在研判股市动态过程中, 值得高度关注。

房地产、理财风光不再

那么, 由此所生发的一个问题自然就是: 这些规模巨大、可以自由投资、能够在各类资产之间自由腾挪资金的投资逻辑,

到底是什么呢? 笔者推测: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资金自然向收益率最高的地方去, 可能是最自然不过的道理。

于是乎, 根据现有各类理财基础资产, 我们可以把投向分为三大类别: 第一大类为楼市, 就是买房子; 第二大类为固定收益, 就是购买银行理财、信托、债券基金和货币基金, 获取申购之初即基本明确的固定收益率的回报; 第三大类为权益类, 就是买股票。利用这三大类资产预期收益率的高低变化, 看看能否有效解释2014年下半年发生的股市暴动?

先看第一类资产楼市。在房价连续15年上涨之后, 面对仍然巨大的供给, 是否看跌未来的楼市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多数人已不再认为未来楼市会继续暴涨, 这种观点甚至在最近还难能可贵地获得了一直以来的“楼市春天派”的默认。

如果这样, 未来投资楼市的唯一回报就是租金回报率, 而很多地方楼市的租金回报率仅仅在2%左右(虽然因贷款而可使用总价款70%的贷款, 但在剔除6%以上的贷款利率之后, 回报也大抵在2%左右), 这还未考虑楼市投资的低流动性问题。

再看第二类资产固定收益类。在2014年上半年, 普通大众可以随时申购的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最低在5.3%以上(参见

图2), 而信托则通常在7%-10%之间。但到了2014年下半年, 随着3月份之后流动性的持续宽松, 7月及其之后的理财产品收益率已不断走低, 到11月仅有5.05%; 与此同时, 大多数固定收益类信托产品的收益率也下了一个台阶。随着11月22日的降息, 这种收益率的下降一度更为显著。

第三类是权益类, 即股票市场。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 银行股不涨, 则大盘指数难涨, 因为银行股在上证A指数中占到了约40%的权重。而下半年这一轮股市的暴动的确是由银行股的起舞而带动(虽然券商股更加抢眼)。截至12月19日, 上证综指年初至今累计上涨47%, 而银行股上涨54%, 两者大致相若。

股市涨跌要看银行股息回报率

笔者曾经在2014年4月6日的研究报告《中国银行业投资价值的复归: 上市银行股息回报率横向比较》计算的数据显示: 2013年上市银行全行业的股息回报率已经达到5.64%, 已相当接近银行理财的收益率, 并由此断言上市银行已经进入价值投资区间。

在2014年半年报发布前后, 券商们的预测是上市银行全年利润大致增长11%左右, 照此估算, 则2014年银行的股息回报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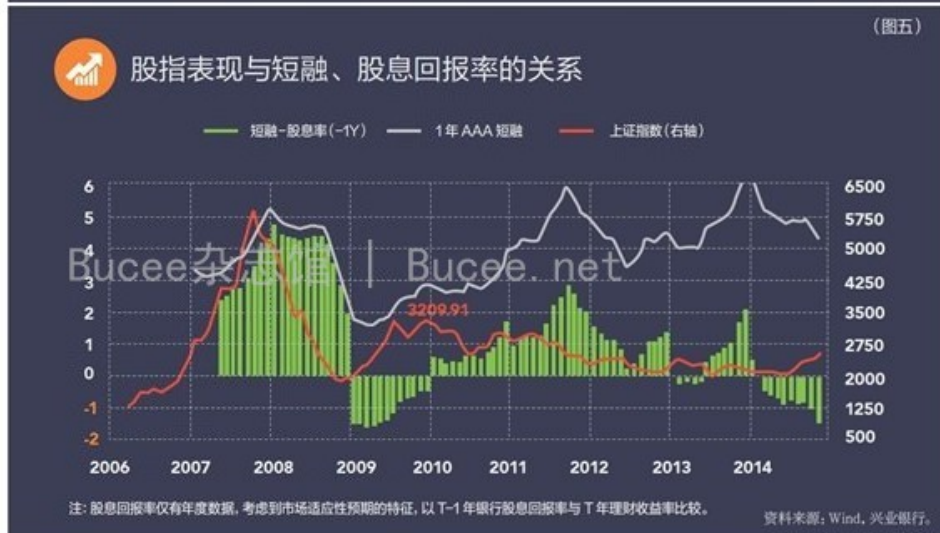
将提高到6.3%左右。此时,就可以把银行股作为可转债来购买:买入银行股的那一刻,6.3%的收益率就锁定了;如果购买后银行股还上涨了,那么收益率就会高于6.3%;如果跌了,只要未来银行盈利仍能维持正增长,则持有银行股最低收益率在下一年度也还会继续上升。

总结一下前文对楼市、固定收益(以银行理财为代表)、股市(以银行股为代表)三大类理财资产所见即所得的收益率水平对比(参见图表3)。根据图表3提供的数据,在2014年上半年,收益率最高的是固定收益类,而到了下半年,银行股已超越固定收益类,成为收益率最高的品种。在此过程中,起效的似乎是最简单的傻瓜投资规则:买所见即所得收益率最高的资产!



图表4的资料为上述“跨资产套利”行为的逻辑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图中显示,凡是银行理财(此处以发行期限最多的3个月期限为代表,其与更长期限的收益率差别不大)低于银行上年股息回报率的时候,银行股就会上涨;反之,则股市将面临下跌。

但遗憾的是,银行理财收益率数据太短,使得我们无法把“跨资产套利”逻辑的验证进一步向更早的时间序列推进。为此,考虑到银行理财收益率(3个月期限)与1年期AAA短融收益率基本相当,我们以1年期AAA短融的收益率来代替银行理财收益率。由此得到的图表5所显示的也大致符合此前的“跨资产套利”逻辑:每当短融



减去银行股息回报率为正时,股指就会下跌;反之,如果短融减去股息回报率为负时,股指就会出现上涨。

“短融”即所谓“短期融资券”的俗称,是指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并约定在一年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AAA短融是短融的评级,表示债务人具有非常强的还本付息能力,购买这类公司所发行的债券几乎没有风险。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2015年上证指数能够到多高?应该是直到银行股的股价上涨到令银行股息回报率下降到与理财收益基本持平为止。根据2009年那时大致相当的前后情景,给定不再降息、降准,则本轮波段回升的高点应该在3200点左右;如果

未来继续降息、降准,则反弹幅度还会有所提高。

不过,对于2015年来说,除不对称降息之后银行的利润增速会有所下降外,还可能会出现一个与2014年重大不同的市场条件,即大量公司的IPO和国有企业改革。

对于前者,目前信息显示已有630多家公司提出上市申请,这意味着2015年每个月将有50家左右的公司IPO;对于后者,也可能意味着更多国有企业的改制、增发或国有股减持。这意味着,大量的供给会稀释相当大一部分上涨动能,而热点的转换预计也会更加迅速。所有这些,都可能令2015年更多呈现宽幅震荡特征。

□ 编辑 王华强 □ 制图 美编 虎妹

GMOND 吉盟珠宝

闪耀·恒久之美

耀世华美，为您独享。

GMOND吉盟珠宝“暗香”红毯高级定制系列钻饰现可为您度身定制。

臻选极致切工八箭八心美钻，汇集全球设计灵感。

全新奢华之作，定格至美时光，只为见证爱的闪耀。

暗香

红毯高级定制系列为GMOND吉盟珠宝高端珠宝定制的典范系列。我们秉承一贯的挑剔眼光，臻选八箭八心极致切工美钻为您独家定制独一无二的珠宝臻品。

本款红毯高级定制系列钻饰，使用“花朵”这一珠宝设计中传统的设计元素作为灵感，用数百颗绝美钻石，延续流畅的线条刻画出璀璨夺目的动人色泽。娇艳妩媚的花朵仿佛幻化成翩翩起舞的绝代佳人，以轻盈优雅的姿态倾听钻石的秘密私语。

至GMOND吉盟珠宝官网，定制您的专属“红毯高级定制系列钻饰”。

官方网站: www.gmond.com 客服热线: 400-8866-355 加盟热线: 0755-25628999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szgmmond (吉盟珠宝官方微信)





2015年经济面临的压力与转机并存，采取恰当的对策措施能够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中国经济压力与转机并存

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经济两位数高增速的粗放发展模式将成为历史。市场化改革将推动经济潜在增长率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持续得到提升。2015年经济面临的压力与转机并存，采取恰当的对策措施能够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主要风险及问题

2015年，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短期性风险有：一是房地产投资已经迅速下滑，如果房地产投资持续低位运行，将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负面因素之一。

二是随着往年投资建设项目陆续竣工，新开工的项目有限，导致投资增长动

能减弱。

三是PPI已经连续33个月负增长，并且没有转正的迹象，工业领域通缩压力持续，煤炭、钢材、水泥等主要工业品价格趋势性下滑，制造业发展受阻，抑制了工业增加值增长。

四是经济下行中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下降，金融支持力度有可能减弱，导致资金环境延续紧张态势，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

经济增长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主要有：一是制造业产能过剩压力持续，化解产能仍需要很长时间和过程，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的意愿偏弱。

二是当前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时

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增大，工业领域的贡献在减弱，导致经济潜在增长动力下降，经济增速仍将下行。

三是改革开放红利和人口红利大幅减弱，预计至2015年左右，中国15-64岁的劳动人口增长率将由正转负，从而就业人数也可能开始转向负增长。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态势迅速改变，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以往粗放式增长难以维持，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的收益缩减。

经济增长存在六大转机

2015年，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不确定性依然较多，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投资增速下台阶、制造业结构性问题是影响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但中国经济运行的压力与转机并存，六方面因素可能会带来经济运行的转机。

一是“稳增长”政策仍将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铁路、机场、水利工程等建设项目的陆续出台，基建投资将继续回升，从而有助于投资增速的企稳。

二是下半年房地产有望触底企稳，从而提振投资与消费。一方面政策松绑有助于房地产触底企稳，今后房地产投资有可能出现提升，进而推高整体投资增长；另一方面多项措施稳定住房消费，将刺激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消费。

三是国际环境改善，出口保持稳定增长。美国经济复苏前景明朗，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加深，亚太经济体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中国出口增长。

四是油价低位徘徊，生产及消费成本下降。国际原油价格处于下行通道，一方面对中国企业带来福利，生产成本降低支持产出增长；另一方面有助于促进燃油及汽车相关领域消费。

五是改革推动股市回暖，促进消费增长。资本市场改革逐步推进，沪港通的启动，将推动2015年股市回暖，带来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对消费增长带来需求并提供资金来源。

六是不对称降息有助于推动2015年银行贷款利率以及货币市场资金价格、非银行融资价格普遍走低,从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升企业开展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

年内经济能够触底企稳

以上六方面因素加上积极财政政策和稳中偏松的货币政策的支持,有可能使2015年的经济运行触底企稳并成为未来中高速平稳增长的起点。预计2015年GDP增速可能为7.2%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M2增长12.5%左右。

由于国内成品油价的持续下调及房地产相关价格的调整,CPI同比仍有继续下行的可能,预计在1.8%左右。上游原材料价格走低制约了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的反弹,PPI仍将维持负增长。

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已经大幅下降,受到去产能过程的影响,采掘业和制造业投资增速有进一步下跌趋势,基础设施建设将部分对冲房地产投资下行的影响,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位徘徊在15%左右。

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及征收率,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有助于消费增长,预计消费增长11.8%左右。出口面临的挑战突出体现在外贸竞争优势减弱、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等,但外需整体改善、“一带一路”规划有助于出口增长,预计为7%左右的中速增长。

政策建议

1 货币政策坚持定向宽松,加强结构性支持,提升前瞻性和灵活性。

货币政策在保持稳中偏松的总体格局下,重点是充分利用创新型工具加强对流动性的主动调节,进一步加大定向支持力度。继续通过定向降准、再贷款、PSL、SLF等方式加大对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确保贷款和社会融资保持适度增长,继续促进融资成本下降。

在继续使用价格型工具的同时,特定

时候配合使用数量型工具,可以考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补足基础货币缺口;必要时可以小幅对称性降息,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 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加快财政支出进度,落实结构性减税。

为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要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快财政支出进度,结合新预算法的实施,督促预算使用进度,改变年末突击式花钱的财政支出模式,改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支持能力和平衡作用。

落实结构性减税、推进税制改革等多措并举,继续加大对居民消费、战略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以及“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强基础性产业规划,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以基建投资对冲制造业去产能、房地产投资低增速的负面影响。

3 不断加大促改革、调结构力度。对前期已出台的各类政策加快实施步伐,促其尽快发挥效力。在推动简政放权、加大薄弱环节支持力度、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稳步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坚持不懈,加以推进。视内外经济条件,稳妥有序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各项金融改革,促进改革红利尽快释放,以改革创新来重塑经济增长动力基础。

4 平稳过渡,审慎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债务风险。

现阶段,地方政府融资带动的投资需求对“稳增长”仍有重要作用,建议在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积极稳妥扩大地方政府发债规模的同时,对存量债务的处理采取渐进有序的策略。在发债规模没有迅速扩大的情况下,允许地方政府继续以其他方式合理适度举债。

鉴于较之其他融资方式,信贷融资相

对较为规范、透明,可以考虑在过渡期间适度允许地方政府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融资。不搞“一刀切”,逐步、有序剥离地方融资平台的政府性债务融资功能,对债务管理良好、运作较为规范的融资平台适度予以信贷支持,保持其融资合理适度增长。

5 适应形势发展,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

不良贷款增长是限制商业银行未来稳健运行的重要问题之一,截至2014年9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已达到1.16%,未来的发展形势仍不容乐观。因此建议从两方面入手解决存量不良贷款的处置问题。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通过兼并破产、债务重组、股权收购、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在损失可控的前提下盘活存量信贷资产,加快资金周转。适当降低拨贷比监管要求,同时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鼓励商业银行运用庞大的拨备资源加大核销力度,盘活信贷资源。

6 进一步优化监管机制,提升商业银行贷款投放能力。

受利率市场化推进、金融脱媒发展和互联网金融冲击等因素的影响,银行存款增速放慢是大趋势,建议对相关监管和指标体系进行优化和调整,充分释放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能力。

一是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同时,对存贷比安全线的设置以及纳入存款计算的范围做适当的调整,释放银行信贷投放能力。二是通过调整实施新资本协议过渡期安排、拓宽资本补充渠道等方式缓解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压力,优化资本结构。三是通过加强窗口指导、优化差别准备金率动态调整机制等手段做好对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保持信贷合理增长。

□ 编辑 王华强 □ 美编 虎妹





第三只眼看中国

返璞归真，中国朝向『正常化』努力

冷眼看待『万邦来朝』

中国变强势是自然现象

中国未来发展之路仍然坎坷

外交与世界

伍

驻华使馆赠言

大国关系

2014年：中美二元格局初现

中欧合作迎来新机遇

新『冷战』阴影下的中俄关系

中日关系转暖之后

韩中经济交流仍需深化

中拉发展模式可以彼此借鉴

非洲迎来中国投资热潮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驻华使馆赠言

UNITED
KINGDOM

五年见证中国变迁

在圆满结束英国驻华大使五年任期之后，我将离开中国。五年来，我看到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领导人换届、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交流革命。

2010年初当我刚来到中国时，这个国家正徘徊在改革攻坚的紧要关头：中国工厂劳动力供给日益紧缺，而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了更加廉价的加工地；中国国内投资缺乏可持续性，伴随着不断增长的产能过剩以及逐渐减缩的回报率；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日益严峻。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第一届政府领导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在2013年制定了大胆措施推动中国未来的发展，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允许一些投资失败，一些企业自生自灭；赋予银行调整存贷款利率更多自主权；赋予人民币汇率更多自由去浮动；逐步放开能源和土地价格；废除管制和许可，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市场，特别是在服务业。

在中国发展的上一个阶段，随着工业产能的提高和出口产业的建立，德国发挥了自身优势，与中国进行了更多的合作。

在中国发展的下一阶段，英国可以发挥优势：中国需要发展自身的服务业，而英国的服务企业世界领先；中国需要进一步创新，英国强大的教育、研发和创新实力可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中国企业需要扩大品牌和业务的世界影响力，英国为他们跻身国际市场搭建了理想平台；中国企业需要多样化的对外投资，而英国相比任何西方国家更加开放，可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商投资。如果一切顺利，今后20年将会是英中两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多年来，英中两国政府已经对此达成共识。早在2011年，两国领导人就提出一个概念：英中两国关系是“共同增长的伙伴关系”。2014年6月，李克强总理访问伦敦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为“增长、改革和创新的合作伙伴”。一系列数据可以证明：过去四年，英国对华货



英国驻华大使
吴思田

物出口增长一倍以上；过去几年中，中国对英投资超过此前的30年总和；目前，大约有13万名中国学生在英国留学——数量远超其他国家；据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去年前往英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达49万人次，高于前往欧洲其他国家的数量，较上年增长20%。

这些数字令人感到兴奋，但这并不意味着英中之间不存在分歧：我们有着不同的历史，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两国成熟关系的一部分，重要的是通过公开对话处理这些分歧。我们希望中国取得成功，也不会低估中国面临的挑战。按照我们的经验：权利、多元化、法治是繁荣和稳定的重要基础。

我很欣喜地看到中方近期在国际贸易谈判以及气候变化方面所迈出的积极步伐。国际社会需要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重视和管控全球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从20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到维持开放贸易；从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和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到遏制抗生素耐药性的进一步蔓延；从支持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到防止冲突并打击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活动。此外，中国与邻国共同努力化解紧张局势、和平解决争端、加强相互理解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相信，100年后当历史学家回顾这个世纪的时候，中国再次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

中心将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我有幸在过去五年见证了这一过程。英中两国现在面临历史机遇——成为增长、改革和创新的合作伙伴。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在未来能够将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



JAPAN

企盼日中之间 更多的“共同感动”

2014年对中国外交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北京APEC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体现出主办方中国所具备的组织能力，也提供机会让更多的中国人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作为自己身边的事情加以了解。此乃意义深远的一件大事。

关于日中关系，2014年11月10日，中断长达两年半的日中首脑会谈得以重启。我认为，这对双方来说都极具意义。此次会谈也向全世界表明，日中两国已经朝着改善关系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今后，两国有必要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致力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为此，我们需要紧密配合这一领导



日本驻华大使
木寺昌人

人会谈之成果，不断地去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日中关系当中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近来赴日中国游客人数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4年远远超过200万人次，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日本政府正在筹划为促进交流而放宽中国公民赴日签证的发放条件。随着赴日签证手续的便捷化，期待2015年的春节期间能有更多的中国朋友莅临日本。

我始终希望日中两国国民能够重新对地区和平及日中友好的重要性给予关心，同时也期盼着肩负两国未来的年轻人能够通过各种交流来体会更多的“共同感动”。一旦拥有了“共同感动”，自然而然彼此间就会产生亲近感，进而也就不会轻易出现争执。

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先生

去世后，日本大使馆收到了众多中国粉丝发来的表示悼念的花束和文书，这令我感慨良多。高仓健先生通过电影，让许许多多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怀有了同样的感动。在2015年，为了实现更多日中人士之间的“共同感动”，日本大使馆将继续倾力于诸项交流事业。



“从英寸到英里”： 印中关系提速

2014年，印中两国领导人在议程上为双边关系成功定下了新方向。5月末，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就职后第一个通过电话交流的外国领导人就是中国总理李克强。7月中旬，莫迪总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福塔莱萨进行了有效并具有实质性的会面。副总统阿米特·沙里也在6月末对西安和北京进行了双边访问，并出席了由习近平召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活动。

这一年的最大亮点，是习近平主席在9月对印度进行了成功访问。我们对他在印期间的特别招待凸显了这次访问的重要性，

也体现了印中关系的重要性。本次访问带来了许多实质性成果，包括为途经乃堆拉的印度朝圣者新增一条路线、在铁路建设和工业园区创办更多合资企业、将古吉拉特邦（莫迪总理的家乡）与广东省联结为姐妹省份、启动“中印文化交流计划”和建立亲密发展合作关系协议等，这些成果将引领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向下一个阶段。

此外，2014年是中印友好交流年，我们在14个中国城市组织了一系列“印度掠影”活动，既让中国朋友一品印度文化，也为他们介绍了印度的商机，进而加深双方的了解。随着“印度制造”活动的启动，我们多次表明欢迎中国企业和组织前来印度投资的愿景。我相信这些努力会有所收获，并能为双边合作添砖加瓦。

我们也计划把2015年设为“印度旅游年”，届时将向中国朋友展示印度拥有的宝贵财富，并邀请他们来印度旅行。当然，我们也会与中方继续磋商，准备高级别的访问。

对我个人而言，2014年是硕果累累的一年。我有幸访问了中国各大省市，并受到当地热情的接待。我感受到这些地方都希望与印度加强关系，这也会驱使我更加努力工作，将我们的友好关系推向下一阶段。这就像莫迪总理所说的，两国应该以“从英寸到英里”的精神推动印中关系向前发展（注：“英寸”（Inch）是印

中两国国名英文头两个字母拼在一起；英里（Miles）则意指“卓越协作的千禧年”）。



印度驻华大使
阿肖克·康特



“三年行动计划” 推进意中经济合作

2014年对意中两国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通过近一年来政府间的频繁互访，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业已良好的关系，并为发展各领域战略伙伴关系打下坚实基础。意中两国共有的政治议程以相互尊重为原则，理解双方文化差异为基础，在联合国改革的框架内达成紧密共识。6月意大利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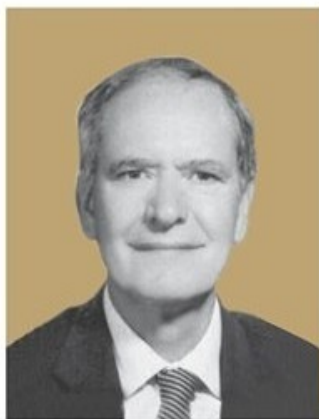
伦齐的访华以及10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访意，为加强两国经济、贸易和金融合作提供了契机。

在这一框架下，最突出的是意中关于经济合作的“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其旨在通过增长双向出口额逐步实现双边贸易再平衡。此外，双方共同确定了与两国经济和生产体系具有高度互补性的五个优先发展领域，包括城镇化发展、环境与可持续能源、农业领域（农业机械化、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食品药品及卫生领域（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的安全监管、传统医学以及包括残疾人和老年人在内的卫生服务）以及航空航天。为全面扩展上述领域的合作，双方成立了意中经贸论坛，并组织大批商界企业家会面，论坛在促进双边贸易和促进两国投资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在近年来两国政府和企业开展的合作中有所体现。

意中两国分别代表了西方古罗马文明和东方儒家思想发源地，有着源远流长的友谊，两国也同样希望共同推动文化和旅游交流。为此，双方决定建立长期的对话平台，即意中文化论坛，并于2014年6月在罗马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我们希望在华广泛推广意大利语，同时也在意大利推广汉语。通过孔子学院这一机制可让意大利人在本国学习汉语，其深受当地学生和老师的赞赏。意方也正在同中方相关部门接洽，以两国间的密切友谊和互利共赢为基础，期望意大利语也能通过类似的机制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的米兰世博会将以“滋养地球：生命的能源”为主题，聚焦农业、粮食和食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届时将有三个来自中国的展馆（中国国家馆和两个私企展馆）亮相米兰，旨在体现中国对食品供应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视。世博会将为意中两国在食品、农业和环境方面交流想法和发展合作提供良机，同时也为两国在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领域积极开展高水平合作提供了实践平台。



意大利驻华大使
白达宁



PAKISTAN

巴中经济走廊 助力两国关系

巴基斯坦和中国一直是久经考验的全天候老朋友。我们被友谊所形成的特殊纽带联结在一起，这份情谊经受住了全球和地区的动荡，在巴中两国在发生政治变迁时也能长盛不衰。

2013年，两国领导层几乎同时发生变化，随后李克强总理于同年5月访巴，我们的新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则于同年7月访华。谢里夫总理上任以来，访问中国多达三次，马姆努恩·侯赛因总统也有两次访华。这些访问肯定并强化了我们之间长远的战略性纽带关系。

双边利益和共同价值一直是巴中友谊的生命线。我们对相互依存地区及其未来有着共同的想法，也尊重彼此的主权，以及追求和平发展的权利。

在核心问题上，巴基斯坦毫不动摇地站在中国一边。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以及中国在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我们也认可中国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来解决与邻国争端而付出的努力。同时，我们还很感激中国对巴基斯坦主权、领土统一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的强有力支持。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
马苏德·哈立德

巴基斯坦和中国因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走到一起。我们在很多大的方面都有亲密合作，其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哈喇昆仑公路、JF-17“枭龙”战斗机、F-22P导弹护卫舰，还有巴基斯坦IR通信卫星，都是我们合作的闪耀证明。

目前，两国政府将巴中经济走廊视为巴中关系新阶段的一个重要项目，这条走廊将瓜德尔港和中国西部地区连接起来，也将在未来促进两国人民的交往。尽管巴中两国近期才正式落成经济走廊项目，但建立一条跨国经济渠道的想法早在两国政策制定者的脑海中成型。这个想法来自于双方基于巴基斯坦地理位置重要性而达成的共识。巴基斯坦坐落在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战略中心，极有潜力成为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能源和贸易走廊。

我有自信这样说，巴基斯坦将会是对中国企业家最友善的目

的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享受到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的激励政策。在巴中经济走廊的促进下，我期望更多的中国朋友把握好投资的新兴机会，来巴基斯坦吧！



KOREA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14年

2014年是韩中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2013年朴槿惠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国事访问，让韩中关系更上一层楼。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进行了“风好正扬帆”的国事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

不仅如此，两国以11月朴槿惠总统来华出席APEC峰会为契机召开韩中首脑会谈，正式宣布历时几年的韩中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质性谈判结束。若两国尽早结束后续程序，韩中自贸协定正式生效，相信韩中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在更多领域得到深化。

除了两国首脑的国事访问成果，单从两国关系的统计数据来看，不难发现已取得显著成果。譬如，据中方统计，两国贸易额继2013年达到2743亿美元后，2014年有望达到3000亿

美元，远远高于韩美和韩日贸易额的总和。两国的互访人员也从2013年的830万人次，有望在2014年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

有关朝核问题，虽然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但是韩中两国对不能容忍朝鲜拥核、反对朝鲜进行核试验达成共识，并决定为此共同努力。对于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劝阻，坚持推行核与经济发展并进路线，我认为韩中两国应致力于加强对朝鲜的说服工作，引导朝鲜走上弃核的正确道路。

忙碌而充实的2014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回顾这一年，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收获也颇多。我对即将迎来的新的一年充满期待，相信两国之间还会发生更好、更快乐的事情。通过韩中自由贸易协定的正式生效和“中国旅游年”等活动的举办，韩中关系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韩国驻华大使
权宁世



ISRAEL

中国和以色列——创新之路

虽然中国和以色列都是相对较为年轻的国家，但它们传承着世界上最伟大的两大文明。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不尽相同，但我们在尊重传统、重视家庭与教育、艰苦奋斗等诸多方面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我们都拥有着古老的文明，我们也应该珍视历史，面向未来。

2014年是中以关系非常重要的一年。我们实现了双方高层互访。时任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在4月访华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佩雷斯访华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013年访华，为中以经济关系发展设立了远大目标。佩雷斯访华的目的之一，就是致力加强中以人民的联系。为此，他开通了微博账号(<http://weibo.com/u/5055437375>)，欢迎大家成为他的粉丝！

2014年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访问以色列并签署成立“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备忘录，促进和拓展中以两国在创新领域的经济合作。我们相信，这是中以持续共同发展与繁荣的正确道路，因为我们两国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中以两国政府携手的决定对两国都十分重要。



以色列驻华大使
马腾

创新是以色列历史和文化以及未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在农业、高科技、教育、文化和艺术等领域都用创新方式去思维。有人说这是犹太传统的教育方法促成的，因为我们总是允许问问题。每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被鼓励提问，对周围环境好奇。我同意这一见解，但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的近代史。以色列国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建立的，自然资源匮乏。我们的父辈不得不以创新的方式思维，以克服重重挑战。如今，当我们面临新的挑战时，我们仍然保持了这种思考状态。

最后，我想鼓励更多中国人访问以色列。今年，我们对签证办理流程进行了重大改进，更简便也更快捷。

我祝愿中国人民新年快乐，早日实现中国梦。



现在,中国追赶美国的脚步已经从“望尘莫及”到了“望其项背”,有从“第二阵营”跑进“第一阵营”的趋势。中国正在将GDP总量排名第三的日本以及德、法、英、印、俄等国越甩越远。

2014年:中美二元格局初现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 2014年是国际大事件层出不穷的一年,乌克兰危机反复震荡、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威胁等抓取了很多眼球。中美关系这一年则经历了从上半年的紧张到下半年趋向缓和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但是,在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有什么变化是真正具有结构意义的呢?有哪些事情是分水岭式的重大变化,又有哪些热门事件会被人们逐渐淡忘?从国际格局变化的角度看,2014年最重要的事件或许是一个中美两国都不愿意承认的事件——即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中国在2014年取代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人往往会看到自己还面临很多问题,也有不愿“当头”的意识,因此会倾向于淡化这一事件;美国人当然不愿意承认自己最大经济体地位丧失,因此也会淡化这一事件。

客观上说,购买力平价标准确实只是衡量经济规模的指标之一。但是,之所以要强调这一变化,是因为其凸显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的最大变化之一,即中国的迅速崛起。这是200年来非西方国家第一次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当然还有非常多的国内问题,综合国力相比美国仍有巨大差距,但这些实际上是另外的问题。2014年中美之间开始出现某种“二元格局”的趋势,可能是2014年最重要的变化。

避免让“二元结构”变为“两极结构”

从静态规模上看,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世界格局一直是“一超多强”。在这场“综合国力马拉松”比赛中,美国一枝独秀,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但是现在,中国追赶美国的

脚步已经从“望尘莫及”到了“望其项背”,有从“第二阵营”跑进“第一阵营”的趋势。中国正在将GDP总量排名第三的日本以及德、法、英、印、俄等国越甩越远。

从动态变化上看,中美两国是国际制度的主要建设者、主要外交议题的发起者。从中国角度看,中国或许是2014年世界外交舞台上最活跃的国家之一,亚信峰会和APEC峰会的举办,“一带一路”的提出,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设、命运共同体、亚洲新安全观等理念的提出等,都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主动性。美国也一如既往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建立、重振它在全球的盟友体系,引领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海洋等议题。

从上述两方面来看,中美正在世界格局中形成一个“二元结构”。也就是说,中美已成为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并且有相当行为独立性的国家行为体。

需要指出的是,第一,这种“二元结构”绝非当年美苏冷战时的两极格局。中美在各类战略问题上有很多合作,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互动频繁。中美是一种竞争加合作的关系,与美苏“你死我活”的关系有根本不同。中美接下来的双边关系,需要小心处理,避免让“二元结构”变为“两极结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1月的北京峰会中宣布了一系列具体举措,推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承诺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签订了军事领域相互信任措施的备忘录,同意双向延长签证有效期等。从这些举措来看,中美双方都在推动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第二,中国的发展仍面临很多困难,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尚存在很大差距。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未来几十年里发展的困难要大于美国,不确定性也大于美国。因此,中美这两元是不对称的。

“新型大国关系”需智库助力

在这次的“习奥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推进的六个重点方向,进一步充实了2012年提出的这一概念。

尽管中国在努力推动美国接受这一概念,但是美国官方和智库的回应仍有诸多疑虑和躲闪。美国官方层面,还并不是适应去接受由中方提出的这一并不具体的概念;美国智库层面则回避这一概念,起码不在这个概念下进行研究,以防替中方背书。

我认为,目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着一个“名”与“实”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中美关系比作一座大厦的话,“新型大国关系”就像这栋大厦楼顶悬挂的标志。我认为,美方如果能接受这一术语当然更好,而且我们应该继续推动美方接受这一术语。但如果美方仍有所保留,我们也没必要因噎废食。重要的是,应先将这栋高楼打好地基并盖起来。

此外,中国的智库和研究人员需要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进行更为具体的实证研究。不得不承认,在这一概念提出的两年时间里,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效远远落后于官方的阐释速度。中国学界需要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背景、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政治家提出了战略设想,剩下的工作应该由学术界来完成,学界对此责无旁贷。

习近平在开始提出这一概念时,归纳了



2014年11月11日，北京举办了APEC欢迎仪式暨开幕焰火晚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迎接美国总统奥巴马。

三条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三是合作共赢。目前中美双方都同意第一条“不冲突、不对抗”和第三条“合作共赢”。尽管中美之间可能出现意外和第三方因素是双方不能控制的，但双方会努力，毕竟谁都不希望出现冲突和对抗的局面。

目前中美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二条——“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美国方面担心中国提到“核心利益”问题。第一，美国人总说不知道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曾阐述过三类中国的核心利益，一是政治制度，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二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三是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但是美方担心中国将“核心利益”的概念扩大。对于具体的领域或者问题，比如南海是不是核心利益、钓鱼岛是不是核心利益，美方感到不好把握。第二，美方认为中方提的核心利益是不惜使用武力也要捍卫的利益，因此担心中国会使用武力解决东海、南海等问题，而这会牵涉到美国的两个亚洲盟友。第三，美方认为，

一旦按中国要求接受了“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要求，在东海、南海、台湾等议题上就无法再介入，这是其断断不能接受的。

克服崛起国与守成国的“结构性矛盾”

回顾中美建交35年来的历史不难发现，从双方建交到1989年、以及2001年“9·11事件”的一段时间，中美因为有着对抗苏联和恐怖主义的共同战略利益，双方关系趋于稳定。而当中美没有“共同敌人”时，关系就会比较紧张。

目前中美处于没有“共同敌人”的时期，由于“二元结构”日趋浮现，双方甚至有将对方视作最大敌人的可能性。在这种时刻，就更加需要远见卓识的政治领导。这就是中方常说的，要从战略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的原因。中美之间有很多分歧，但是中方始终坚持将稳定中美关系作为外交重点，就是从历史和战略高度作出的抉择。美方过去在中美关系中也多次表现出战略高度。例如1989年中美关系跌到冰点时，时任美国总统

老布什就派特使来华，传递出渴望关系稳定的信号。

当前中美关系依然需要目光长远、有战略性思维的领导人来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如此才能克服所谓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维持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一旦高层管控缺失，中美关系就会呈现“漂流”状态。如若这样，可能全世界遭殃。毕竟当今的世界，离开中国和美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行。

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上，尤其是奥巴马最后两年的任期期间，中国要积极引领和推动双边关系朝着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中方的目标是要通过未来两年中美关系的稳定，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结构化，并由此实现中美关系的中长期稳定。特别需要在网络安全、敏感海域问题上避免出现重大危机，同时争取在经贸、能源、环境等议题上实现更多更深的合作。



欧洲一些国家对中国实力增大抱有疑虑。尽管没有美国的反应强烈，但这一担心也会成为欧洲和中国合作的障碍。

中欧合作迎来新机遇

2014年是柏林墙倒塌25周年。然而，由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以及由此引发的美欧与俄罗斯关系的持续紧张，西方有不少人认为一堵新的墙正在欧洲重新出现。与俄欧矛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欧关系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对华合作成为欧洲各国外交重点

近年来，人们对欧洲的关注一直聚焦在经济上，如不断蔓延的欧债危机以及欧元区会不会瓦解等。2013年欧洲终于走出了欧债危机，但前面的挑战仍然十分严重。很多欧洲国家面临长期增长低迷的严峻考验。从2014年11月4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最新预测报告来看，2014年欧元区区和欧盟实际GDP增长分别为1.3%和0.8%。报告尤其指出，欧盟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2014年经济增长将萎缩0.4%，而第二大经济体法国增长可能仅为0.3%。报告还称，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欧洲经济复苏疲软，需可信的财政政策支持、有雄心的结构改革和公私两部门投资三者配合应对危机。

目前欧盟正酝酿于2015年启动一项总额3150亿欧元、为期三年、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向欧洲能源、交通、工业和宽带网络等领域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由2014年11月刚刚走马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提出，并在12月18日举行的欧盟冬季峰会上得到了所有成员国首脑的一致支持。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根据这一计划，欧盟将出资210亿欧元作为种子基金，其中160亿欧元来自欧盟当前的预算资

金，另外50亿欧元来自于欧洲投资银行。这笔款项将以担保金的形式，被用于筹集私人资金。围绕这一计划，欧洲分析家们有持乐观态度者，也有不少持怀疑态度者。其能否成功实施，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欧俄制裁与反制裁对于欧洲经济也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与美俄经济不同，欧俄经济依存度颇高。2013年欧盟对俄罗斯的出口额占欧盟出口总额的6.8%，为1578.6亿美元，自俄罗斯进口占欧盟进口总额的11.2%，为2513.7亿美元。双方贸易额超过4000亿美元，是美俄贸易额的十倍。欧盟委员会预计，由于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欧盟2014和2015两年将分别减少400亿欧元和500亿欧元收入，分别占GDP的0.3%和0.4%。

在此背景下，欧盟要想扭转经济低迷困境，必须大力吸引外部投资和扩大对外出口。而中国市场和来自中国的投资对于欧盟极具吸引力。

目前，欧盟各国均把对华合作置于各自外交政策的优先位置。二战结束以来，多数欧洲国家一直将对美合作和欧盟一体化作为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对欧投资的不断增大，深受欧债危机冲击的欧盟国家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2014年访华时所指出，德国视中国为其重要的合作伙伴，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开展了深入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德方愿与中方拓展合作领域，扩大合作规模，重点发展互利的创新伙伴关系，全面深化经贸、投资、工业、农业、科技、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人文等领域合

作。匈牙利总理欧尔班2014年2月访华时表示，中东欧基础设施建设还未完成，缺乏南北连通的高速公路和铁路，未来7年欧盟也没有这方面的融资预算。因此他明确指出，匈牙利已宣布向东方实行开放政策，匈牙利欢迎中国在基础设施现代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总之，摆脱经济困境已成为欧盟各成员国当务之急，同时也成为这些国家积极谋求对华合作的重要动力。

中国对欧打造四大伙伴关系

由于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欧债危机曾引起中国的高度关注。但中国并未因为欧盟遭遇了严重的债务和经济危机而减弱了对欧盟的重视。2014年更被很多人称为中国外交的“欧洲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2日至4月1日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欧洲四国以及欧盟总部进行了长达11天的成功访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在一年之内三次访问欧洲，包括6月16-21日对英国和希腊的正式访问，10月9-11日对德国、14-17日对意大利的访问，以及12月16-18日对塞尔维亚的访问。

中国力图在不断深化中欧经贸合作的同时，推动双方合作更加全面和具有全球意义。2013年11月，习近平在首次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欧盟领导人时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经济体，中欧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作为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中欧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习近平提出的“三个



“两大”的判断,是新时期中国对欧盟作出的最重要定位,清晰地表明了中国对于欧盟以及中欧战略合作的重视程度。访欧期间,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提出中欧要努力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除了双方将加强经济增长、改革转型方面的合作外,中国在中欧伙伴关系中增加了和平、文明两大支柱,既反映了中国对欧盟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国际作用和角色的新认识,表达了中国希望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意愿。

中方应谨慎处理干扰因素

中欧在共同寻求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质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合作中可能出现的干扰因素。

2014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导致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降到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低点。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保持了较为超脱的立场,但这一危机也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挑战。2014年3月2日默克尔与奥巴马通电话时抱怨,普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显然,欧俄冲突既反映了欧洲与俄罗斯相互矛盾的世界观和安全观,但实际上也是双方影响力的博弈和争夺。关于欧俄关系的影响,国际上相关论述很多。

西方不少分析家认为,欧俄、美俄交恶,将使中俄走近,或者说欧美对俄制裁,将把俄推向中国。欧美在孤立、制裁俄罗斯的同时,无疑不愿看到中国与俄罗斯走得太近。从中国外交的角度来看,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恶化这一因素将可能越来越成为中国与欧美发展关系中需要重视的问题之一。

在看到欧盟国家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性的同时,还要防止所谓价值观问题的干扰。欧洲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历来既追求经济利益也追求价值观。有时候经济利益会放在第一位,有时候价值观会放在第一

西方不少分析家认为,欧俄、美俄交恶,将使中俄走近,或者说欧美对俄制裁,将把俄推向中国。从中国外交的角度来看,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恶化这一因素将可能越来越成为中国与欧美发展关系中需要重视的问题之一。

▶ 2014年3月22日到4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欧洲多国,期间于3月31日访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盟总部大楼。会后,习近平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和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握手。

位,但这两点它从来都想得到。近年来欧洲国家对华政策中实用主义色彩浓厚,但不能错误认为其不再坚持其价值观。

还要看到,中欧双方围绕人权、民主等问题存在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欧洲缺乏对中国的深入了解而引起的。显然,中欧还应大力加强人员和文化交流,增进双方的了解、理解,建立互信。目前中国与欧洲建立起了固定的人文交流机制,包括中国与欧盟、中英、中法、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其作用将逐步体现出来。

此外,欧洲一些国家对中国实力增大抱有疑虑。尽管没有美国的反应强烈,但这一担心也会成为欧洲和中国合作的障碍。欧洲主要担心中国强大以后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态度会发生变化。中国需要不断打消外界的疑虑。

应该看到,无论是欧盟还是中国,经贸合作仍然是双方合作的重中之重。展望未来,中欧经贸合作的重点将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扩大双方贸易往来,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争端。2013年中欧贸易额为5591亿美元,欧盟连续十年蝉联了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方希望到2020年双方贸易额能达到1万亿美元。二是积极推动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早日完成,为双方投资者提供良好环境,并尽早启动中欧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三是继续展开技术合作,在深化核能、航空航天、汽车等传统领域合作的同时,培育科技创新、绿色环保、农业食品、卫生医药、可持续发展、城镇化等合作新亮点。中方应推动欧盟扩大对华技术出口。四是推动双方创新合作模式,朝着联合生产、联合研发、联合投资、共同开发第三国市场方向迈进。最后,中国和欧洲国家应积极探讨、合作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促进中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生产要素融合,共同打造亚欧大市场。



中国对俄能源合作领域某专家表示，中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救不救”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俄罗斯自己作死，中国救不了。俄罗斯不死，也不会是中国所救。”

新“冷战”阴影下的中俄关系

2014年12月15日，一排大货车满载100吨猪肉从中国运抵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口岸。这是2004年以来，俄罗斯首批进口来自中国的猪肉。8月，俄中两国商定恢复猪肉贸易，认为这将有助于缓解俄国内因制裁而出现的肉类短缺的现象，稳定肉类原料市场价格。

克里米亚在3月份脱乌入俄后，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便接踵而至，俄方自然不甘示弱。从2014年8月起，俄罗斯开始限制从美国、欧盟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挪威等实施对俄制裁的国家进口食品。

俄罗斯正面临一场“无规则”冷战的威胁，步步升级的禁令好比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立起了一道大门。这个岁末叩开俄罗斯大门的中国猪肉，成为了新“冷战”阴影下，本年度中俄关系的最好缩影。

俄西对峙促中俄经贸合作新突破

2014年是俄中两国建交65周年。俄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65年来，俄中关系走过了很长的道路，最近20年来，双方关系蓬勃发展。”他表示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新的水平——全面平等互信合作和战略协作关系。

俄罗斯和欧美国家的对立所造成的经济壁垒，将中俄经济合作捧为2014年双边关系中的主角。在世界经济遭遇困难的背景下，中俄2014年的双边贸易额将超过900亿美元，有望提前实现2015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中国在最近10年内很可能将取代欧盟，成为俄罗斯最主要贸易伙伴。

2014年中俄关系中最大的事件，毫无

疑问是5月份双方签署的30年期天然气合同，中国未来6年从俄罗斯购买的天然气将比俄罗斯目前输往欧洲的天然气还要多。

莫斯科出售天然气获利时，还将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将美国挤出亚洲能源市场。对此，俄战略技术分析中心专家卡申表示，国际关系的新局面迫使俄中两国重新审视和解决既存的一些分歧，双边关系与一年前相比有了长足进步。

不过也不能将久拖不决的合同的突破完全归功于世界格局的变化。有专家指出，俄罗斯已经认识到国际能源领域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变化，能源市场正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没有中国这个巨大的可持续的市场，俄罗斯的能源输出在未来将很成问题，虽然俄国内还是有不少声音认为天然气要价过于优惠。

俄罗斯在当下的困境中，亟须稳定的、务实合作的外交关系，而目前能够满足这一关系的非中国莫属——俄罗斯亟须中国的市场、技术和资金。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日前声明称，目前对中俄两国最直接的影响是扩大货币互换机制，并更多地使用人民币进行中俄贸易结算。

在卢布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人民币结算能保证贸易的安全可靠。其实这一变化已经悄然进行数年，因为2014年西方的制裁而加速。卡申更是将中俄在10月份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称为2014年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

从长期看，以卢布和人民币结算前景非常广阔。如开展这一大规模工作，意味着美元在全球能源经济中的影响力将会下降。

俄外贸银行行长科斯京上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包括俄石油公司、天然气工业在内的大型出口商已经准备实现使用本国货币进行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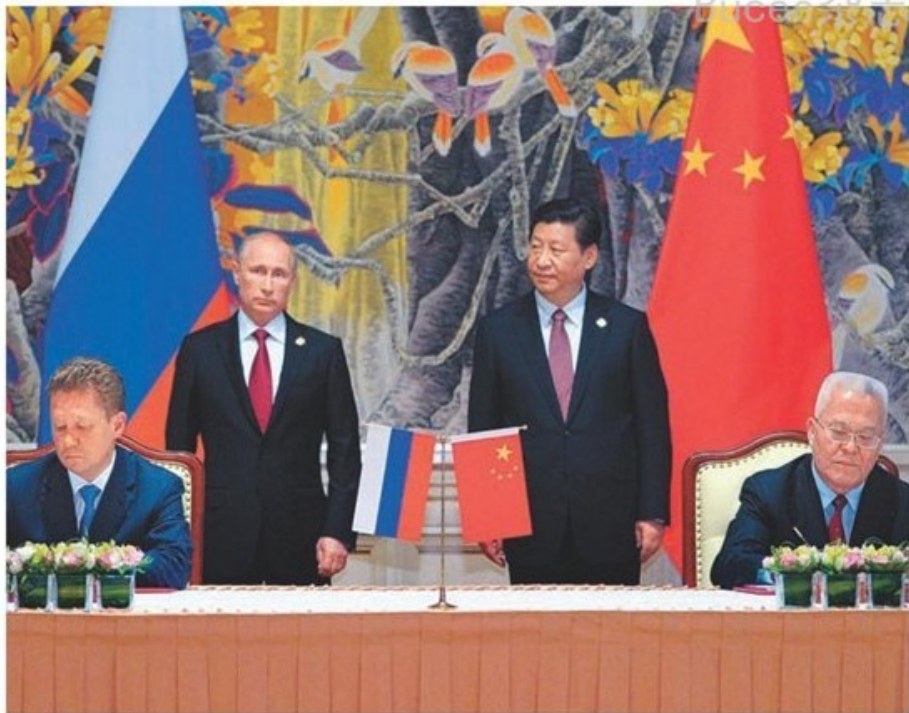
军事同盟被多次提及

早在2014年4月普京与俄民众进行直播连线时，就有人向他提出是否可能同中国建立同盟的问题。尽管普京予以否定，但类似问题被俄罗斯总统新闻办选中并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这一事实本身就很重要。

普京在那一次的直播连线，以及后来的年度记者会期间，分别3次和2次提到中国。卡申表示，尽管目前这种前景看上去很不现实，但就在一年前，谁也不会料到乌克兰东部会爆发内战，俄罗斯会面对类似针对伊朗的制裁，国际政治格局瞬息万变，谁也不知道，一年后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模样。

无论军事同盟最终如何，两国2014年在国防上的交易足以吸引世界的眼球。在11月结束的珠海航展上，俄罗斯“4++”代战斗机“苏-35”首次亮相。俄苏霍伊公司第一副总经理布列格曼称，俄中很快就将签署24架苏-35的订购合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明显的政治或技术原因阻碍合同的签署。

11月底，俄罗斯对华供应S-400“凯旋”防空导弹的消息又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同中国国防部签署合同，俄将对华供应至少6个营、总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S-400系统。不过，这一消息很快便遭到了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的否认。



2014年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海共同见证中俄两国政府《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的签署。

卡申认为，合同“八成”已经签署，不排除因中方要求保密而作出此表态。他指出，这一防空导弹系统属于为数不多的俄高新技术出口产品之一，对华出口将改变东海地缘政治的力量平衡。

对华供应的S-400导弹系统不是俄军使用的基础型，而是射程可达400公里的“重型”版本，卡申表示：“拥有这种导弹系统，可以从大陆沿岸火力阵地发射，摧毁钓鱼岛上空的目标。”

不过，2014年以来中俄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进展顺利，但出于对安全的考虑，俄罗斯目前首先需要满足本国军队建设的步伐，俄军工业还面临着产能不足的问题，未必有足够的产能满足中方市场的需求。此外，美国最新签署的制裁法案正包含国防领域，美国的做法后续可能波及全球，进而对中国的武器进口造成影响。

卡申表示，尽管未来几年俄中两国不会宣布建立军事同盟，但这个同盟早晚会同形成，就其潜力而言将远超冷战时期以苏联为首的阵营。“这将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自然资源产地同最强工业和最大消费市场的

结合。”

中国“救”得了俄罗斯吗？

随着国际油价的一路走低，卢布在2014年贬值了49%，是全年全球表现最差的货币。跌幅最大的时候，卢布兑美元汇率一度跌破80大关。不少人预言俄经济将跌入“寒冬”，中国是否能“雪中送炭”，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月20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相信俄罗斯能克服日常的经济困难，在需要的情况下，中国愿意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表态明示了中方的态度。

“王毅部长的声明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卡申说，“近来俄罗斯的资本外逃现象愈演愈烈，投资不足是当前最大的难题。”俄目前国内的工业产能已趋于饱和，迫切需要填补新的投资以促进生产，确保工业生产的增长。

卡申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帮助不会通过直接的财政援助的方式，而是以双边项目的形式来实现。不过，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日前表示，能源、制造业等大项目的推

进，还要更多地从两国产业互补性、经济结构等基础性角度去看待，不会因为眼前俄罗斯金融和经济的形势而发生显著改变。

俄总统企业家权利全权代表季托夫认为，劳动力和电能价格下降，项目成本降低，将使开发起步不久的远东地区对投资者更加有吸引力。卢布的大幅贬值降低了俄罗斯物料和商品的价格，同时工业资本也在“降价”。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最近两到三年内从俄罗斯进口物资和投资俄罗斯工业产业最为划算。

中国专家指出，虽然投资成本降低，但是随着俄经济问题的日渐严重，俄本就不健康的市场环境将进一步急剧恶化，中国投资俄罗斯的风险比过去更大。此外，中方必须面对价格缩水 and 俄百姓购买力下降的现实，目前俄市场上的中国中小企业已经举步维艰。投资俄罗斯有利可图的出路只有产品直接出口海外。

“为构建未来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很快将进入决定性阶段。俄罗斯希望在这场斗争中拥有行动的自由，然而现实条件迫使俄罗斯的未来同中国的未来紧密地结合起来。”卡申说，“两个最强的发展中国家要么一起赢，要么一起输。”

不过，在巨大机遇背后必须看到，乌克兰局势的持续恶化，并不仅仅是中俄合作的催化剂。当今世界是立体多维多元的格局，各国间都直接或间接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会受到国际局势负能量的影响，中国在俄与西方对立的环境下，如果在某些问题上涉入太深，存在潜在的风险。

中国对俄能源合作领域的另一位专家表示，中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救不救”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俄罗斯自己作死，中国救不了。俄罗斯不死，也不会是中国所救。”他说。



中国近几年因为主权问题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因此外交上和日本各占一头。一谈历史问题日本灰溜溜，一谈现实问题日本就底气足些。

中日关系转暖之后

2014年无疑标志着中日关系由最坏开始转暖。此前，全世界都感到中日两国只要有机会就攻击对方，在外交场合只要见面就相互批判。在领土争端的前线，两国的飞机在钓鱼岛海域，只差很近的距离就撞上，担忧两国冲突的情绪越发弥漫。

然而，现在的大国关系中，最危险的时期往往也就是改善的时候。中日双方都担忧，毕竟主权等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两方的底线都是避免实际的武力冲突，否则难以收场。同时双方也认识到，除了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双方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有共同利益。这几年中日经济都不好，双方高层都意识到如果真发生冲突，后果也难以承受。

避免冲突是真正共识

11月10日，中日两国首脑在APEC上实现会晤，虽然目前还看不出中日关系是否确切改善，但是背后能够观察到中国的对日政策已经发生变动。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称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外交的策略是切断或者冷遇两国的一系列关系，包括外交、经济和人员往来等。通过不见日本领导人逼迫日本政治家让步，或者通过影响日本经济界，让他们给日本政府施压。

这一策略实施了两年，其实效果不佳。经济和文化交流本是双方受益的事情，中国只希望借由一时的自损而获得长远的利益。结果这一策略是导致两国近两年经济表现不好的原因之一。

APEC恰好为两国打开僵局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日本方面一直积极主动去实现首脑会谈。即便现在民调显示大部分日本人并不喜欢中国人，但是安倍还是能够公开表示希望见到习近平主席。为此，中国方面也顺势接下这个人情，展示大国风度。

事实上，首脑会谈对于中国方面来说难度更大，因为涉及面子问题。此前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之时，中国已经举国向其“吐口水”，外交部更公开表示不以安倍作为对话的对象。因此，即便是APEC的主客身份，习近平也绝不能简单接见会晤。

2014年8月以后，中国在对日态度上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接受自民党前总裁福田康夫等一系列官员来华交涉；其次，在两次纪念日的讲话中，习近平对日态度有所转变。

“七七事变”时其对日本的批判不留余地，但是9月3日“卢沟桥事变”时，习近平表达了对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

对此，日本方面也注意到了，最后的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和条件见面。双方几个月博弈的结果是后来发表的中日四项原则共识。可以想见，四项原则共识并不是一拍即合，否则不会是在APEC开幕的数日前才达成协议。

该共识最能体现两国担心钓鱼岛海域的现场军事摩擦。其中，第一条是遵守四个政治文件和发展互惠关系，第四条则是重启两国对话，都是理所当然，不会犯错误的内容。第二条提及两国的“政治障碍”，第三条涉及日本对钓鱼岛纷争的看法，但是两条都能够各自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解释，没有实际的约束力。因此，唯一的干货还是两国共同建立海上危机管理体系。如果按照现在

的态势继续下去，两国真的可能发生冲突。

中方应该明白，现在把日本逼到墙角只会让事情更糟，结构性矛盾要根本解决很困难。到目前为止，两国的主张都没有让步，能达成的则是不愿意发生冲突的底线，并让彼此有台阶下。中日四项原则共识好就好在模糊，如果清晰化则又得吵起来了。

新思路下的对日外交

2014年，中国外交思路开始发生转变，不仅仅是对日关系。2008年雷曼危机后，中国人开始有了一种大国的感觉。过去老觉得不如西方，2008年后欧美的经济不行了，很多国际事务似乎没有中国参与就难以决定，因而一些人的大国意识开始膨胀，认为要有大国的权力。

为此，中国处理国际事物的方式开始转变。近年来，中国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更加主动和强硬。过去想做的事情不敢说，现在不但敢说还敢做，这让周边国家在安全上有抵触情绪。

“进攻”两三年后，中国也遇到了问题，并意识到此前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经济好也得益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开放。现在我们的经济也不那么好了，而经济发展离不开其他国家，于是对其他国家的“攻势”开始收敛了。

有观点认为，这是“进两步退一步”的战略，终究还是在前进。但是这样的策略不能多次使用，否则很快就没有国家相信我们了，届时日本很可能就是抵抗中国的核心。对日关系上，中国应该坚持不让步，但是最终不冲突。冲突起来难以控制，而且中方也



► 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中国东道主为APEC嘉宾举办晚宴及文艺演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穿着新中装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其妻子安倍昭惠。

并不知道日本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12月14日，日本众议院选举的结果已经揭晓，安倍再做四年首相应该没有问题。自民党2015年有总裁选举，2016年还有参议院选举。如果经济不景气、参议院选举失败，或者内阁发生丑闻，那么安倍作为总裁仍可能引咎辞职，但是现在看起来没有太大障碍。

因此，中国在制定今后的对日政策时，不应该以“谁是首相”来制定。实际上日本谁做首相，领土主权问题都是固定的国家利益，安倍之后的领导人也不会妥协。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不需要刺激对方，如果安倍被批判是因为中国政治压力而不去参拜，反而会倒逼他去，毕竟他也需要在国民面前展示尊严。

安倍个人的确拥有破坏中日关系的绝对能量。如果安倍还是参拜靖国神社，刺激到中国，届时中日关系可能又会恢复到APEC首脑会谈前的状态，中国会在各个领域打出“制裁”安倍的组合拳，包括历史问题以及在钓鱼岛问题上有新的行动。

在钓鱼岛问题上，现在两国的军方可能在接触，虽然双方今后在钓鱼岛海域的巡逻不让步，但是力争不出事故。在这种共

现在把日本逼到墙角只会让事情更糟，结构性矛盾要根本解决很困难，能达成的则是不愿意发生冲突的底线，并让彼此有台阶下。中日四项原则共识好就好在模糊，如果清晰化则又得吵起来了。

识之下，两国坐下来谈判的时间长一点也没事。同时，双方国民感情也会好转，气氛好以后才有机会解决更敏感的问题。

以历史牌压日本让步

2014年12月14日，中国举行祭奠了第一个南京大屠杀公祭日。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这次的公祭日也是为之后造势，中国政府方面无疑会继续借助历史议题来进行中日外交。

客观而言，中国在对日外交中的确应该打历史牌。国际社会对此有定论，日方越辩解越抹黑。安倍上台后对“河野谈话”等进行检视，无论结果如何，都让日本国际形象受损。

在历史问题上，中国在2014年也有了不少动作。3月，中国法院为当年在日本的华人受害劳工立案，7月大规模纪念了七七事变，同一时间档案馆在网络上公布了日本战犯的招供词。不少大学和研究所也申请了关于二战历史研究的课题，比如吉林大学从年初就在编订《铁证如山》丛书，试图挖掘汇总日本二战时的罪证。

日本在面对历史问题的指责时，应该坦率地承认错误。当前日本在外交上强调战后日本的贡献，包括对各国援助。相比之下，中国近几年因为主权问题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因此外交上和日本各占一头。一谈历史问题日本就灰溜溜，一谈现实问题日本就底气足些。

除了国民感情外，外交上打历史牌的目的，也在于向日本施压，让其在现实问题上让步，比如军费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中国政府很在乎安倍政府在军事上做出的改变。东亚地区仍然是民族主义的土壤，不像欧洲是地区主义占优。一旦日本军力发展起来后，其存在就让中国难以接受。反之亦然，中国强大起来后日本也难以接受。

过去的2014年是甲午年，有不少文章提到了120年前的社会舆情。当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搞了30年，在装备购买上投入巨款，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现在我们在讨论日本军力时则很谨慎，有具体的数量和战力说明。中国军方更倾向于认为日本军力很强，而且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相比之下，中方学者则觉得日本军力发展受到经济和体制的制约，能够发展装备的资金资源有限，没有那么大的威胁。



从贸易自由化和开放程度而言，刚刚签订的韩中FTA协定远不如韩美之间的协定。因此，韩中FTA协定的质量还有待提高。

韩中经济交流仍需深化

2014年对韩中关系来说是互惠共赢的一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新任领导班子上任后，两国关系越发紧密。我曾见过习主席两次，觉得他非常了不起，是坚定可靠的领导人，对韩国的态度也很积极。

11月北京举行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会面，这已经是两年来两国领导人的第六次会面了。与此同时，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有所冷淡，在朝鲜问题上，北京的态度也比过去更为直接，对待朝鲜半岛问题更加客观。两国的政治信赖也将继续增强。

作为韩国前外交通商部和通商交涉本部部长，我一直关心中国经济的现状和走向。如果说十年前是韩国企业大量涌入中国，现在逆向的流动越发明显。韩中两国之间的经济依赖不断深化，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韩中FTA质量有待提高

两年来，韩中两国在经济领域有了很多新突破。2014年最让人欢欣鼓舞的是11月的APEC期间，韩中两国宣布达成自贸区(FTA)谈判。在中国市场中，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是韩国的竞争者，但目前它们均尚未与中国签订相关协定。韩国与中国签订协定后，必将在对华贸易中占据先发优势。

当我在任通商交涉部长时，韩国就已经开始同日本一起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三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敏感产业，比如韩国的农业，中国的汽车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工业。如果实现自贸区，经济上肯定能获益，但也可能带来政治问题，因此大家都很谨慎。

从现在的结果来看，最后韩中把贸易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一般性产业，另一类是敏感产业。两国达成协议，在一般性产业上进行自由贸易，敏感产业则遵循其他标准。但是，限制贸易类型意味着不能实现高级别的贸易自由化，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我曾经参与过韩国的多项自贸区谈判。从贸易自由化和开放程度而言，刚刚签订的韩中FTA协定远不如韩美之间的协定。韩美FTA在10年间取消了95%的关税。因此，韩中FTA协定的质量还有待提高。

相比韩中之间，韩日之间的FTA谈判从2003年起就展开了。仅在2004年就谈了6次，但是此后却陷入僵局，一直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韩国非常担心日本市场的非关税贸易壁垒。韩国平均每年都在与日本的贸易中产生300亿美元的赤字，因此希望日本降低非关税壁垒来平衡两国进出口额，但日方对此未表示出任何积极态度。第二是政治原因。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协定都应该被国民支持，但目前韩国民众对日本持有负面印象。日本军队二战时强迫韩国、中国甚至荷兰的妇女去日本军营当慰安妇，但是如今却否认这个历史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政府也难以顺利与日本进行谈判。

虽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员中没有韩国，但是并不能否认韩国不会加入。据我了解，TPP的10个成员国中，没有一个国家拒绝韩国的加入。

TPP影响力的扩大离不开美国，其渴望在亚太地区重夺主导作用。现在韩中FTA敲

定，美国中期大选也结束了，韩国应该能将更多精力放到研究TPP问题上来。

韩中应共同控诉日本操纵汇率

韩中经济交流规模的扩大，不仅仅体现在韩国产品和投资流入中国，反之亦然。2013年，中国对韩投资额为12.4亿美元。2014年截至9月，中国对韩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韩国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可以借由韩国与其他国家的FTA通道，打开更多市场。

不过，一些韩国企业也和日本企业一样，逐渐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东南亚国家设厂。2012年，韩国在华投资额近65亿美元，2013年为43亿美元，2014年降到约19亿美元，下降得厉害。这主要是由于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本，让韩国企业家开始寻找更优环境和更低成本的国家，比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等。

尽管中国政府尽力为外国投资者营造友好环境，但是优惠程度与过去大不相同，相比韩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能享受更多优惠。不过，从中国离开的大多是将其定位为出口加工厂的企业，瞄准了中国市场的其他行业仍在大批进驻。

除了商品交换，韩中之间的金融合作也有所突破。为了减少贸易成本，几年前韩中之间就开通了美元之外的多币种兑换。2014年12月起，人民币与韩元可以直接兑换，这对韩国商业是利好消息。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货币实现直接兑换能大量减少交易时因汇率转换产生的额外费用，促进商贸往来。

鉴于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些金融方面的进步令人倍感欣慰。但是我觉得进展还不够快。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货币之一，中国的金融市场应该更加开放。韩中在货币兑换方面已经有了进步，这只是开始。随着中国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的进步，韩国未来将在中国开展更多金融业务。

在货币问题上不得不提及日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如要求央行配合印钞、加速日元贬值，试图加大出口量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对韩国经济影响极坏，甚至波及中国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明文禁止国家操纵汇率，一旦出现操纵汇率的情况，IMF会进行干预。目前日本大量印钞的行为直接导致日元的贬值，实质就是在操纵汇

率，间接影响了邻国的竞争力，相当于往邻居身上捅刀子。

因此，中国和韩国应该共同介入此事，请求IMF等国际机构遏制日本“赤裸裸”的操纵汇率行为。一个国家想要影响汇率有多种途径，但日本这种故意操纵的策略太过极端，应该予以制止。2014年韩国央行已经下令降息两次，中国央行也在11月降息，如果市场规则得不到保障，东亚地区的贸易环境将不再乐观。

无需担忧韩国对华经济依赖

当前，韩国国内也出现了担忧中国经济崩溃的声音。中国经济的未来对于韩国经济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泡沫以及影子银行等问题都进入韩国的视野。

有一种观点认为，韩国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一旦中国经济崩塌，将给韩国的

独立决策带来不良影响。的确，韩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超过20%，韩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比美国和欧盟问题专家加起来还要多。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国对中国的依赖的确很重。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并不罕见。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就有很强的联系，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维系。欧盟27个国家也相互依赖。中国现在是世界的经济强国，日本也是，韩国的贸易总额排在世界第七位。但中日韩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和市场自由化程度仍然较低。

韩中两国在地理上如此临近，包括出口、投资和贸易往来的商业联系本应不断增长，可是近年来贸易额却在不断下降。现在两国在贸易方面处于调整期，需要共同努力来改善。如此来说，韩中之间的经济依赖不是大问题，并不值得担忧。



创领中国芝麻香

人立品为先
一品景芝



全国质量奖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当前，中拉经济交流不断深化，中国的人才、企业和资金不断流入拉美地区。目前来说，“中国威胁论”在拉美还没有市场。

中拉发展模式可以彼此借鉴

➤ 本届中国政府对拉美的重视程度与过去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这套领导班子在上任之前就访问过拉丁美洲，对拉美有所了解。以前江泽民主席访问过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胡锦涛主席也同样出访过秘鲁、巴西、智利。习近平主席独特的访问拉美的经历，使得中拉关系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这两年，中方向拉美国家提出建立对话机制，除了加强贸易联系外，更加关注共同发展。对中拉关系以及中智关系而言，推动贸易以外的领域至关重要。

中美在拉美建立对话机制

2011年，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时就来过智利，并在总部位于智利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发言。当时，习近平演讲的主旨是中国和拉美国家当下和未来应当采取的共同行动。这是一次拉美国家和对拉丁美洲有深刻了解的新一届中国政府领导人的交流。难能可贵的是，习近平对南美有着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在传统的地缘政治中，拉美被称为“美国的后院”。当前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仍然对拉美国家有最大的影响力。现在，实力强大的中国也开始在拉美发挥影响力。很多学者都认为美国肯定会尽可能遏制中国在拉美“渗透”的势头。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在2007年，中美两国就拉丁美洲建立了一个对话机制，召开了特别会议探讨拉丁美洲与中美两国的关系，这表明两国是通过协商而非“暗斗”解决问题。美国的确会对中拉贸易和投资所有



顾虑。这种顾虑并非仅仅针对中国，欧盟在拉美有另一个对话机制，美国也会留意。

现在，拉美地区设立了“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事务委员会”（CELAC）平台，这是与中国进行对话交流的极佳平台，也是各国在拉美事务中关注的焦点。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和拉丁美洲不断达成新议程。这些议程与习近平最近提出来的“中拉1+3+6合作新框架”紧密相关。“1”指的是“一个规划”，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共同目标，制定《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3”是推动中拉关系发展的“三大引擎”，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6”是“六大领域”，即以能源

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为合作重点。

这是中方提出的具体框架，它不局限于贸易一个领域，而是强调广泛多领域的合作。中智在很多领域可以合作，比如采矿业、农业以及航天工业。两国还可以在能源和南极探索研究等领域合作。现在缺乏的是一个清晰、高效的行动方案。

智利也需要整备基础设施，一个可以连接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交通枢纽。在这方面，中国的参与非常重要。这两年来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民众需要去了解和探索自己的国家，现在高铁提供的交通体验已经和上一代人完全不同了。为此，拉

► 2013年6月3日，正在哥斯达黎加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走访当地农户萨莫拉一家。

美也希望吸引来自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都需要来自双方最高领导人的推动。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

当前，中拉经济交流不断深化，中国的人才、企业和资金不断流入拉美地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引起了关于新殖民主义的争论，但是目前拉丁美洲还鲜有这种声音，“中国威胁论”在拉美还没有市场。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智利投资的数额相对美国和日本来说还是太少，可以说是实验性质。中国企业在智利的投资总额仅为8000万美元。不过现在有不少中国企业想在智利北部投资能源企业，预计投资总额接近10亿美元。中国投资者需要明白，拉丁美洲并非一块本土保护主义横行的土地。美国、欧洲、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诸多企业都在此投资建厂。智利有完善的法治来确保一个安全的投资环境，外国投资者可以享受本国国民一般的待遇。了解这些规则对想在这里投资的中国企业至关重要。

这两年智利的红酒吸引了一些中方投资，因为智利红酒品质一流，供应量充足，在中国也很有市场。从今年起，智利红酒将在中国享受零关税的待遇。

相比来说，中国在拉美的农业投资比较有名。不过，搞农业需要土地，虽然目前没有造成负面影响，但仍有需要注意之处。智利国土面积小，无法大规模地种植水果等作物，但是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在巴西和阿根廷购买大量土地，引起当地民众的一些反感。不过主要问题并非来自中国企业，一些拉美国家也需要制定相应政策，规范中国在该地区的农业投资。因为未来肯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南美进行农业投资。今后，中国企业在智利投资的最大领域可能是能源产业，毕竟智利有着得天独厚的丰富可再生能源储备。

外界论及中拉关系时，话题基本局限于贸易、投资与农业合作。其实，中拉关系有着更多的内容。中国和拉美诸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与面临的问题都能够相互借鉴。

虽然中国经济没有过去强劲，甚至有观点认为会崩溃，但我认为是无稽之谈。在当今世界就国内生产总值来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巨大。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极其重要。未来中国经济不会轻易崩盘，而是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新型经济模式的关键在于创新能力和现代科技。中国新型经济发展阶段的支柱就是创新。中国经济需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的转变。如此一来，中国经济会转变为更高级、更完善的模式。不过这一过程需要更加优秀并掌握着科技的人才参与其中。

当前，中国经济7%的年均增速和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有所不同。10年前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比较小，所以可以实现两位数的增长。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今非昔比，7%甚至6%的年均增长都是正常的。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需要接受经济增速放缓的事实。

中拉应在更广阔领域深化交流

外界在论及中拉关系时，话题基本局限于贸易、投资与农业合作。其实，中拉关系有着更多的内容。中国和拉美诸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与面临的问题都能够相互借鉴。

一般来说，国家内部有着基本的三角结构：国家、市场和社会。民众希望国家提

供大方向以及法规政策，市场有增长和创新，社会充满机会和潜力。当处理好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时候，一国就能够稳定地发展。现在的中国，上述三角关系的表现令人称道。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同时也十分注重市场的发展。中国政府也明显意识到了人民生活质量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性。

拉美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并没有完全实施“华盛顿共识”，而是实施了被称为“微观经济调控”的方案。该方案可以带给拉美人民预算内的收入。此外，拉美国家也在国内推行重要的社会政策。扩大中产阶级队伍也是中国 and 拉美共通的任务，中产阶级要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包括教育、医疗、交通安全等。有新的诉求才会促使国家进一步发展。

中国新一届政府强调城镇化发展。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智利展馆拿到了一等奖，智利当时展示的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这也是智利一直关注思考的领域。在拉美尤其是智利，从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经历了人口大规模从农村迁到城市，引发了一连串的社会变化，也推出了很多新政策，包括住房问题。这个经验对中国来说也会有借鉴意义。

不久前，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了一个会议，中国和拉美的参会者一起讨论了城镇化带来的共同挑战。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挑战是生活质量的改善，比如改善空气质量等。

智利在城市社区建设方面也有很多经验。早在1965年，智利的社区组织对满足社会需求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现在我们保留着这种机构。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期间，我明显感受到这种社区建设对于中国居民来说同样很重要。

拉美地区目前对中国只有一个大体模糊的印象。在我看来，中国目前面临着文化输出的问题，如何让世界认知一个真实的中国，就需要加强各类交流活动，让中国元素更多进入拉美民众的视野。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涌入非洲市场，如何在海外市场对中国企业进行监管是未来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监管并不只是管束企业，也包括如何更好地支持企业在非洲发展。

非洲迎来中国投资热潮

2014年非洲大陆与中国的往来更加频繁，虽然这一年没有举行中非合作论坛这类中非政府间的大型政治交流项目，但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非洲四国的访问、中国派遣更多维和部队，以及中国对西非国家抗埃博拉的援助，都是国内外关注的重大事件。

5月，李克强在对东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西南非安哥拉和西非尼日利亚的访问中，着重向非洲推广了铁路建设项目。除了中国与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签订东非铁路网建设的协议外，11月末，中国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非洲首条中国标准现代化铁路也已经正式开通。

中国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尤其是新增的战斗部队，主要是向西非马里和东非南苏丹派遣，体现了中国对非安全局势的国际参与度和责任感不断提高；而中国对抗埃博拉的援助，也表明中国对非洲地区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视。不过，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人员数量和方式有更多呼吁。而相比美、英等国，中国在国际抗灾救援中的宣传报道较弱。及时妥善地应对非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公共卫生危机，不仅有利于中非合作，也是对一个崛起中的全球大国的新要求。

对非援助需找准对接口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历史已经有50多年，比如大家熟悉的上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80年代还在坦桑尼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等国援建了大型体育场、农场、医院等项目。如

今中国对非洲各国家的援助和交流更加多样化，既有传统的办公楼、学校、体育场等项目，也有新型的农业示范中心；既有人力资源援助，比如医疗队、农业专家组和教育培训，也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双方的合作已经不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发展援助，而是将援助与经贸相结合，以期达成“双赢”。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这种政府间的交流对促进中非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元化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对非洲这片有着54个国家的大陆的诸多政策仍然不够细致和灵活，其更多是针对整体，而没有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细化的对待机制。在具体操作上，往往是中国驻外使馆跟进实施，但很多部门本身并没有太大制定政策的权力。

作为政府间的交流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在某些时候过分强调官方指令，比如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20+20”计划等。这个平台在政府的指导下，勉强促成一些研究者和智库进行交流，但大家在开会后，鲜有进一步的交流。如果该论坛能细化针对各国国情的具体政策，深化符合当前实际的举措，会比为了政治效应而推出一揽子不可持续的新花样效果要好。

实际上，非洲很多国家需要来自中国的技术专家担任其重要政府部门的顾问，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外国顾问可以帮助吸引外资。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时，中国政府就表示派遣100名高级农业专家前往非洲各国参与一些农业政策的制定，但

是后来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原因，很多专家去了之后，只是编写了一些种植农产品的手册，但这些资料并没有对当地实际的农业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因此，中方需要实施对当地有更多影响的援助和投资，将中非关系更加嵌入式链接起来。作为后来者，中国确实需要向欧美国家学习，他们往往会深入了解非洲某个国家在此后几年中的政策规划，再依据当地的需求开展行动。

非洲迎来投资热潮

尽管在中国对外投资的份额上，非洲国家占的总比例并不高，但是增长十分迅速。有声音认为，未来五到十年会出现对非投资热潮，其实在我看来，中国对非洲的投资热潮已经出现。

如果到非洲实地看一看，不难发现，即使像加纳这样在2014年经历了严重货币贬值的国家，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也随处可见。

在政治安全上，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在过去5到10年内政局趋于稳定，即便在极端主义分子和海盗嚣张的索马里，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经过了23年的停摆后，于2014年10月正式复馆；经济发展上，非洲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5%-7%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无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和组织前往非洲投资。

然而，在欣欣向荣的投资潮背后，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注意。事实上，中国商人非常聪明，很多人在短时间内就可以了解非

► 2014年5月5日,中交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承建的斯亚贝巴-阿达玛高速公路一期工程竣工揭牌,二期工程开工奠基,建筑队的中国籍工人和当地工人一同参加了揭牌仪式。

洲市场的需求和与其购买力匹配的产品,例如有些商人在海关通过观察当地进口大量陶瓷制品就知道此地做陶瓷生意的前景。但是他们在非洲经营时,往往由于对当地政策法规不熟悉、劳工关系处理不当,以及不可预计的政治、气候等因素而产生困扰。

在开发和投资石油或矿产资源的非洲国家,政局不稳定是最不可控制的因素,也是不可预估的最高风险。2014年南苏丹局势恶化,就为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2015年尼日利亚、2016年刚果(金)将进行大选,政局会变成中国企业投资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尽管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投资进行多年,但是了解非洲的信息渠道仍然有限。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一直在进行信息搜集和整理,在国别的基本信息上能涵盖到,但是在信息深度上和推广力度上还有待提高。例如对于南苏丹,中国政府公开的信息对国内族群和深层次的互动机制了解有限,搜集的大多是来自欧美国家的二手资料;在具体信息上也多停留在数据表面,缺乏深入研究。即便有一些部门做了研究报告和资料搜集,最后也只是把一本枯燥的书放在那里,这对企业来说很难消化,而很多需要它的中国企业甚至从来没听说过。

商务部和外交部等驻外机构由于人员有限,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内对这一方面的需求,更不用说其中一些人员需要拿出时间去做接待方面的工作。

现实情况是,在非洲的企业和商会往往比中国政府驻外机构更加了解现实的当地情况,但企业往往以获利为主要目标,没有义务和精力来梳理和公布这些信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前往非洲,与早年的政府命令式援助不同,他们从事更多的是建筑、自然资源开发、制造



业、服务业等方方面面。这些企业水平参差不齐,有规模小且经营不成熟的小商贩,也有扎根非洲、管理依靠国际规范且能融入当地的企业。从发展趋势上看,越来越多的企业最终站住脚跟、熟悉当地法律和劳工体制并进行国际化管理。

中国应增强对在非企业的监管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涌入非洲市场,如何在海外市场对中国企业进行监管是未来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监管并不只是管束企业,也包括如何更好地支持企业在非洲发展。

在许多非洲国家,法律法规往往并不

缺少,但是法制不健全,法律执行力度不强。在非洲的中国企业需要符合当地的法令,但是现在来看这并不够,因为一些国家的法令本身设定得就很模糊。例如在劳资关系方面,部分非洲国家(例如赞比亚、刚果(金))的劳动法不完善,有中国企业故意与文化水平不高的非洲员工签订语义含糊的合同。一旦发生纠纷,企业可通过与当地官员的关系(如行贿法官)来占便宜。在法制并不健全的非洲社会,要求以盈利为目标的中国企业自律很难,因而需要眼光更为长远的中国政府协助监管。

这个问题上,目前并不存在可以照搬的成功样本,而是需要中国自己去探索。一方面,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数量和分布范围要多于、广于西方企业,而且以中小企业为主;另一方面,在非的西方企业由于本国的规范与公众舆论监督,使他们在自律方面往往做得要比当地法律要求高,而这一点在中国国内并未发展完全。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与信息互动、互通,前者对后者的支持和监管上还需进一步琢磨和探索。

这么多年来,中国对非洲54个国家的诸多政策仍然不够细致和灵活,其更多是针对整体,而没有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分化的对待机制。

返璞归真， 中国朝向“正常化”努力

林洸耀

路透社北亚
首席记者

如果说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开启了新时代，那么习近平将开创一个新纪元。

> 我想用“返璞归真”来形容2014年的中国，用一句英文解释，就是Put your house in order, 即让你的家恢复到应有的秩序。让中国“正常化”，唯有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才能成真。

政治：最大胆的反腐“动作”

习近平反腐力度之强，以及其遍布党、政、军的广度，都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有观点认为这仍是一次反腐“运动”，但在我看来这一描述并不准确，应该称其为最大胆的反腐“动作”，这一“动作”是为日后的反腐“制度化”创造条件。

周永康移送法办的消息并没有像大家所预期的那样在四中全会期间公布，据我了解，是不希望让周案抢了法治的风头。因为四中全会的重点必须是法治。但是消息如果拖到2015年才公

布，民间和舆论就会产生各种猜测：“老虎”是不是打不下去了？是不是有政治斗争僵持不下？所以选择在12月公布这一消息，可以表明中共中央的决心，也是给2014年划上一个漂亮的句点。

两岸关系：摘掉白手套

谈到台湾，虽然今年有“反服贸”的运动，但是不能否认，两岸关系有了重要转变。台湾“陆委会主委”实现首访大陆，国台办主任也实现首度访台。以前是海协会和海基会接触，戴着白手套握手，现在是政府间的接触，拿掉了白手套。我认为这是非常大的突破。

文化：将佛教文化为我所用

2014年2月，习近平会见了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并且特别表示：“大师送我的书，我全都读完了。”此外，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还特别提到，“儒家文化的制度性传承仍然没有建立，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其现状与人们的期待也有很大的差距。在儒、佛、道三教当中，佛教的发展相对较好，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最重要载体。”这是文化上的一大突破。中国大陆目前面临信仰真空、道德败坏的局面，这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大危机，习近平将佛教文化为党所用，重建社会秩序，这不仅仅在文化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更是中共在宗教信仰方面、至少是对佛教的态度渐变宽松的标志。虽然在宗教自由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际影响：鱼与熊掌兼得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的正式启动，被外界普遍认为是此次APEC会议最为瞩目的成果。而且，此次



APEC会议期间,美国“领导”的12个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成员国也悉数到齐并举行会议,这也显示中国并未与美国作对,可谓“鱼与熊掌兼得”。此外,中国贷给东盟200亿美元支持互联互通,建设“海上丝绸之路”,这个被外界看做“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又是一大突破。而中国所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以说是与亚洲开发银行分庭抗礼的全球金融机构。加上2016年还要举办G20峰会。这些都是中国谋求国际影响力的史无前例的大动作。

西藏:重拾统战传统

统战是中共的传统,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将统战视为其克敌制胜、化敌为友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共必须寻根,统战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是可以统战的。如果统战成功,达赖喇嘛是可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大使”的。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经对西藏采取怀柔政

策,是一位统战高手。所以在西藏问题,有理由对习近平抱有期待。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公民:增强国家认同感

APEC会议期间,美方表示,美国于2014年11月12日实施对华新签证措施,对于前往美国从事商务和旅游活动的中国公民,签证有效期从1年延长至现在的最长10年。不管是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还是新疆问题、西藏问题,虽然每个都很复杂,但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因素——认同感。虽然中国护照的免签范围还远不如香港和台湾,但是美国签证有效期从1年到10年,已经是一个开始。拿中国护照出去不再是二等公民,无疑会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习近平在短短两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实属不易。如果说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开启了新时代,那么习近平将开创一个新纪元。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香港凤凰卫视倾力打造 全球华人精品生活杂志

《凤凰周刊》征订的读者
征阅全年《凤凰周刊》+《凤凰周刊·生活》
可享受690元优惠,即刻节省90元
单订阅《凤凰周刊·生活》全年240元
用户可免费获得凤凰精美礼品一份!

征订热线:陈先生 0755-25934591
 广告热线:张先生 0755-25469762
 城市版合作:聂小姐 0755-25934586
 征订传真号:0755-25934593

邮局汇款

收款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层
 收款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邮编:518001

银行汇款

开户名: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帐号:7705 5795 9990
 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红岭支行
 若通过银行汇款,请将汇款收据及您的详细邮寄地址
 一起寄回或传真至本刊发行部。

邮寄方式

平邮免费;挂号邮寄每本加收挂号费3元,
 半年挂号费18元,全年挂号费36元。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中国近几年因为主权问题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因此外交上和日本各占一头。一谈历史问题日本灰溜溜，一谈现实问题日本就底气足些。

中日关系转暖之后

2014年无疑标志着中日关系由最坏开始转暖。此前，全世界都感到中日两国只要有机会就攻击对方，在外交场合只要见面就相互批判。在领土争端的前线，两国的飞机在钓鱼岛海域，只差很近的距离就撞上，担忧两国冲突的情绪越发弥漫。

然而，现在的大国关系中，最危险的时期往往也就是改善的时候。中日双方都担忧，毕竟主权等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双方的底线都是避免实际的武力冲突，否则难以收场。同时双方也认识到，除了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双方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有共同利益。这几年中日经济都不好，双方高层都意识到如果真发生冲突，后果也难以承受。

避免冲突是真正共识

11月10日，中日两国首脑在APEC上实现会晤，虽然目前还看不出中日关系是否确切改善，但是背后能够观察到中国的对日政策已经发生变动。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称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外交的策略是切断或者冷遇两国的一系列关系，包括外交、经济和人员往来等。通过不见日本领导人逼迫日本政治家让步，或者通过影响日本经济界，让他们给日本政府施压。

这一策略实施了两年，其实效果不佳。经济和文化交流本是双方受益的事情，中国只希望借由一时的自损而获得长远的利益。结果这一策略是导致两国近两年经济表现不好的原因之一。

APEC恰好为两国打开僵局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日本方面一直积极主动去实现首脑会谈。即便现在民调显示大部分日本人并不喜欢中国人，但是安倍还是能够公开表示希望见到习近平主席。为此，中国方面也顺势接下这个人情，展示大国风度。

事实上，首脑会谈对于中国方面来说难度更大，因为涉及面子问题。此前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之时，中国已经举国向其“吐口水”，外交部更公开表示不以安倍作为对话的对象。因此，即便是APEC的主客身份，习近平也绝不能简单接见会晤。

2014年8月以后，中国在对日态度上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接受自民党前总裁福田康夫等一系列官员来华交涉；其次，在两次纪念日的讲话中，习近平对日态度有所转变。“七七事变”时其对日本的批判不留余地，但是9月3日“卢沟桥事变”时，习近平表达了对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

对此，日本方面也注意到了，最后的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和条件见面。双方几个月博弈的结果是后来发表的中日四项原则共识。可以想见，四项原则共识并不是一拍即合，否则不会是在APEC开幕的数日前才达成协议。

该共识最能体现两国担心钓鱼岛海域的现场军事摩擦。其中，第一条是遵守四个政治文件和发展互惠关系，第四条则是重启两国对话，都是理所当然，不会犯错误的内容。第二条提及两国的“政治障碍”，第三条涉及日本对钓鱼岛纷争的看法，但是两条都能够各自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解释，没有实际的约束力。因此，唯一的干货还是两国共同建立海上危机管理体系。如果按照现在

的态势继续下去，两国真的可能发生冲突。

中方应该明白，现在把日本逼到墙角只会让事情更糟，结构性矛盾要根本解决很困难。到目前为止，两国的主张都没有让步，能达成的则是不愿意发生冲突的底线，并让彼此有台阶下。中日四项原则共识好就好在模糊，如果清晰化则又得吵起来了。

新思路下的对日外交

2014年，中国外交思路开始发生转变，不仅仅是对日关系。2008年雷曼危机后，中国人开始有了一种大国的感觉。过去老觉得不如西方，2008年后欧美的经济不行了，很多国际事务似乎没有中国参与就难以决定，因而一些人的大国意识开始膨胀，认为要有大国的权力。

为此，中国处理国际事物的方式开始转变。近年来，中国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更加主动和强硬。过去想做的事情不敢说，现在不但敢说还敢做，这让周边国家在安全上有抵触情绪。

“进攻”两三年后，中国也遇到了问题，并意识到此前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经济好也得益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开放。现在我们的经济也不那么好了，而经济发展离不开其他国家，于是对其他国家的“攻势”开始收敛了。

有观点认为，这是“进两步退一步”的战略，终究还是在前进。但是这样的策略不能多次使用，否则很快就没有国家相信我们了，届时日本很可能就是抵抗中国的核心。对日关系上，中国应该坚持不让步，但是最终不冲突。冲突起来难以控制，而且中方也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2015 现正公开 征订

540元/每年 | 每月3期 全年36期 每期15元

订阅热线: 【华南】0755-25934567 (69) 【华北】010-65281005 (06)
24H传真: 【华南】0755-25934579 【华北】010-65590266

【银行划款】

开户名称: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账号: 4000024819200010053

开户行: 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红宝支行 (请将电汇单及客户资料传真至0755-25934579或010-65590266)

【邮局汇款】

①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楼901室 收款人: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邮编: 518001

②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5号金龙建国温泉酒店3206室 收款人: 《凤凰周刊》 邮编: 100005

【网上支付】

登陆网站 www.ifengweekly.com 进入在线订阅平台支付

* 杂志订阅不包括VIP网上阅读包月服务, 如需开通此项服务, 请登录官网付费开通

* 需要挂号邮寄的订户, 按邮局统一规定每本加收挂号费3元, 半年挂号费54元, 全年108元

* 以上均以人民币计算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另有VIP网上包月服务| 每月20元)

www.ifengweekly.com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中国变强势是自然现象

一些美国人对中国这两年的发展表现出矛盾的心态,他们为中国在大张旗鼓地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而欢欣鼓舞,但也为中国政治对外越来越强势感到担忧。

2014年第一季度的中国让不少外国人感到担心,一方面中国的外部环境,比如在东海和南海与周边国家关系骤然紧张;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房地产价格下调,很多人感到会迎来大规模衰退,从而影响整体的经济状况。

而后的第二到第三季度,中国进行了大规模且猛烈的反腐运动。有声音认为,尽管从10月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来看,中国有着很大的对外调整和对内改革的野心,但是在具体行动上还是差强人意。

不过在我看来,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在对外环境上,回顾2014年中国的国内经济改革,一方面,由于政府调整了购房限制,放开了更多的房地产市场,令其市场保持稳定增长;另一方面,金融改革上,中国进行了类似上海和香港的股市开通项目和央行发表的存款保险方案这样的改革举动,使得金融市场向着活跃而健康的方向调整。

整体来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在逐步落实三中全会的改革蓝图——这并不是一张静态的蓝图,而是一条纵向延伸到未来的持续道路。在这条路上,中国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GDP的增速没法越来越快,2015年的增长率或许不会达到7%,而在6.5%到7%之间。这种情况下,一些公司和相关行业的市场压力会越来越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或将由现在的1%增加到1.7%-2%。

不过,上述变化并不是令人悲观的。因为自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就在进行结构调整,这个调整需要至少3年。我们预计,到2017年,中国GDP的增长会在6%-6.5%之间。如果接下来改革进行得顺利,在2020年GDP增速可以重新达到6%-7%。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没有真正的衰退。

一些美国人对中国这两年的发展表现出矛盾的心态,他们为中国在大张旗鼓地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而欢欣鼓舞,但也为中国政治对外越来越

葛艺豪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



强势感到担忧。

我认为,中国的上述表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从历史发展来看,2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其经济力量很小,市场动能不足,技术水平很低,因此需要依靠国外的技术和资金。现在这个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营企业发展迅速且规模越来越大,尽管部分高科技还需要依靠国外,但是一般性的技术可以自主;中国从进口国变为出口国,目前对外投资势头强劲。这样短时间内强大起来的中国当然会强势很多,正如上世纪80年代经济腾飞的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一样,它们的企业在全球变得成功时,其对待国外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上纷纷走向了西方式民主进程,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如此,仍然坚持一党制执政。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效上看,这样的政治制度确实有着正面积积极的作用,未来它还会持续下去。尽管美国和欧洲等民主国家很难接受,但是在未来10年到20年内,它们需要适应这种制度。这样独特的政治制度在与国际制度进行接轨时,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摩擦,但这些都是可以处理和化解的。

有多份报告预测,在未来2至3年内,中国的对外投资额和对内投资额将会持平。而在中国对外投资的目标国中,美国仍然是诸多中国企业的首选。现在有一些中国企业抱怨美国的对外投资环境对它们有歧视,例如美国国会不允许华为和中兴在美投资。我认为,这种歧视确实存在,但只是少数行为。美国不同的州需求不尽相同,有些州还是非常欢迎中国企业前去投资的。当然,这也取决于正在谈判中的《中美投资协定》(BIT)进展如何。这个协定将给双方制定一套投资和保障的规则,预计将会在2016年达成协议。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CHINA PEOPLE
大沉浮
时代人物的命运

NEW
最新上市

Classified File
机密档
台海两岸未公开档案

Classified File
机密档
被遮蔽的历史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美國知識分子

Hong Kong, Macao, Taiwan
三地書
香港 澳门 台湾

Point of View
中国意见书
百名著名学者国是论衡

Corrupted Officials
中国贪官录
2000-2010: 250位贪官档案

REPORT OF CHINA 我們這樣報道中國

紀念《鳳凰周刊》創刊十周年，傾情推出十年精品文叢，首批七本盛大面世。

《大沉浮》时代人物的命运；《机密档 壹》台海两岸未公开档案；《机密档 贰》被遮蔽的历史；《美国知识分子》40位影響美國社會發展的思想家；《三地书》最具影響力的台港澳三地100本大書；《中国意见书》百位著名學者國是論衡；《中国贪官录》2000-2010: 250位貪官檔案；即將推出：《中國群體事件檔案》轉型期的社會衝突及樣本研究；《紅牆中南海》以第一手的圖文資料和回憶文章，還原中南海清晰真實的歷史畫面，展現共和國鮮為人知的政治風雲。

徵訂熱綫 010-84606197 /
angecy@ifengweekly.com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中国未来发展之路 仍然坎坷

田中直毅

日本国际公共
政策中心理事长



中国经济界现在流行“新常态”一词。“新常态”的标准不应该是GDP的增速,而是市场化的程度。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应当更少受到政策的影响。

2010年,我在《五年后的日本和世界》一书中曾预测,五年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会受到动摇,中国经济将会因为一系列问题处于停滞状态。四年后的现在,老实说中国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但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仍感到审慎乐观,中国未来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道路并不平坦。

日本是中国邻国,其经济发展也必然和中国息息相关。一直以来我对中国的动态十分关注,经常赴华向当地有识之士了解情况,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理解日中关系。2014年,日中关系在交恶两年多后终于得到扭转,但未来仍不容乐观。日中两国高层在研究今后的外交政策时,需要进一步理解彼此目前以及中短期的发展态势。

日中经济发展都不乐观

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国经济时观点不一,有人乐观有人悲观。其中各种理论的对错暂且不去评判,在我看来,能够实际预测经济走向的并非经济学家或者政府官员,而是真正会受到中国经济牵连的日本团体,即切身的利益攸关者。

在日本,经团联和经产省等对日本经济有指向作用的组织非常关心中国经济。相比之下,汽车行业关心的程度反而一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但是汽车并非只有在中国才能卖,只要转移销售重心,这些企业仍然能够在中国经济恶化时得以生存。

也有无法“避难”的产业,比如铁矿石和能源产业,其兴衰与中国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据我了解,这些拼命打探中国经济情况的行业认为,他们的形势相当严峻。从2014年夏天开始,资源类和石油价格开始下跌,中国需求的降低是直接原因。这些企业认为,中国在未来中期难以遏制下跌势头,或会陷入中期的经济增长停滞状态。

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并非只是一场社会辩

论,很多企业已经置身其中。当然,很多人期待中国经济顺利运转,但是想要实现并非易事。

中国经济界现在流行“新常态”一词。“新常态”的标准不应该是GDP的增速,而是市场化的程度。中国的市场经济应当更少受到政策的影响,2005年是“民进国退”,2009年我到北京时,中国的经济学家都说已经变为“国进民退”了。

相比中国经济辉煌的30年,日本至今经历了20多年的通货紧缩,在这个背景之下,安倍经济学在日本国内的确受到很高的评价。毕竟之前的政治家都没能做到。两年中,安倍经济学的货币宽松政策让日元贬值,日本涉及出口的大企业利润都有所增长。

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国通过人为的货币贬值加强国际贸易竞争力是一种扰乱市场的做法。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需要理解,产业现代化已经不是日本经济的命题。日本经济已经跨过了产业现代化,进入了后现代化阶段。在后现代化中,日本企业要着力的方向不再是过去的大规模生产,不在于加强成本方面的优势。当前,同样东西,并非日本制造就是优质,中国制造就劣质,其实质量差不多。

如果说“亚洲四小龙”时代,日本继续实现产业现代化仍然具有优势,那么至少在22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日本就应该探寻后现代化的产业化,因为“南方谈话”决定了产业现代化的中心将转移到中国。

因此,即便日元贬值,如果日本产业方向仍然没有转变,那么日本经济难以从不景气中挣脱出来。此外,推迟提高消费税的安倍政权,还将面临如何健全政府财政的严峻事态。因此,中日两国经济的未来都不乐观。

自贸区不能有名无实

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

总统朴槿惠在APEC期间宣布,两国的自贸区(FTA)谈判已经结束。似乎中韩两国马上就要迎来FTA时代了。但据我了解,这一结果对于首尔来说并不满意,因为FTA的实质内容实在太匮乏,层级太低,乃至韩国方面的人都不好意思向日本炫耀。

FTA的谈判不仅仅是关税税率的问题,还有统一地区规则的内容。最基本的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政府方面对市场活动的介入,都应该是谈判的内容。中日韩FTA的谈判之所以艰难,就因为需要涉及这些内容。可以想见,中国跟韩国谈判时,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让步。最后虽然两国对谈判冠之以FTA之名,实质上还是关税同盟的程度。

相对于FTA,日本国内议论更多的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我去北京时得知中国方面也非常关心TPP。中国一些专家甚至认为日本很难加入TPP,因为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我所在的国际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顾问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小泉一直被认为是既得利益破坏者,过去主导过邮政民营化,现在则是通过反核电打击电力系统这一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能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家都会受选民的支持。安倍首相上台后也声称要打倒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也做了一些事情,其中主要在农业领域。该领域是最反对日本加入TPP的群体。日本有一个全国农业中央会,相当于工人界的总工会,安倍现在想让这个存续了60年的利益集团解体。

在12月初的众议院选举中,安倍遭到了农业中央会支持者的反抗,他们质询候选人是否参加了安倍的农业中央会解体行动,若参加则拒绝投票给该议员。当我对一些中国官员说起这点时,他们觉得难以置信。毕竟在过去,农协是标志性的既得权益集团。现在日本已经产生了变化。安倍对农业中央会“宣战”,同时农业中央会也在做最后的抵抗。但是此次选举的结果来看,安倍获胜了。最终若没有农协的反对,日本很可能会加入TPP。

不能等到安倍下台再改善中日关系

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任领导层已经执政两年。在内政方面,我认为新班子最明显的特点在于权力的集中。中央围绕着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设立了

多个领导小组,试图打破地方的既得利益。日本有些人认为这是毛泽东模式,将大小权力集中到最高领导人身上;我则认为更类似雍正模式。

举例而言,新设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有点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这样的做法对于打破地方的顽固当然有效果,不过相比之下,现在一国首脑要处理的事情更加复杂。

在外交上,近两年来中国在周边主权问题上展现出强硬态势,这在国际上并不是加分点。不仅仅是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也非常担心。中国军费在5年之间倍增,在菲律宾等领海问题上,中国也时常展示武力加以震慑。

11月10日,安倍和习近平在APEC期间实现了首脑会谈。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中国方面对于日中关系态度的变化,而且是中国外交开始转向的分水岭。听说中国高层已经下了指示,要转变过去在外交上过于强硬的姿态。

这两年导致中国官方批判安倍政权的原因主要是历史问题,岛屿主权问题并非安倍上任才有。历史问题在日本是一个难以被民间理解的问题。1952年,日本在《旧金山媾和条约》中签字,从此日本人认为终于跨越了战争时期。这一条约是基于战后秩序而签订,对此有疑问的日本人很少。至今为止,虽然有失偏颇的意见无法根绝,但是日本没有一个首相否定过这一条约。

20世纪中,日本给近邻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一点没有人否认。日本大多数人认为,历史问题投射到今天,除了对那些受害国谢罪外,日本需要在国际社会积极投入和平以及环保等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领域,以实际行动去弥补过去犯下的错误。我曾经就此直接问过安倍首相,这也是他对待历史问题的基本态度。

中国领导人需要看到,安倍接下来长期执政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不能认为,可以等到不喜欢的安倍下台再改善中日关系。

□ 编辑 林子敬 □ 美编 青年



陆

文化观察

2014大陆冷战史研究

2014：传统媒体寒冬之年

党史研究的新突破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今天的国内冷战史研究已经基本做到了同国际学术界接轨。2014年,在中国大陆历史档案开放趋向收缩的情况下,大陆学者把眼光和目标进一步转向国外,尤其是周边国家。

2014大陆冷战史研究

2014年,中国大陆冷战史研究继续全面发展,形势喜人。

从研究内容来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今天的国内冷战史研究已经基本做到了同国际学术界接轨。传统的有关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中法关系、美日关系、朝鲜战争史等方面的研究继续稳步推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冷战史研究人员选择将研究视角转向以前较少受到学界关注的课题进行研究。诸如经济冷战、文化冷战、心理战、隐蔽战等领域,都得到了深入的挖掘和考察。

从研究成果来看,2014年学术界出现了有关冷战史研究的大量专门论著。在中国知网以“冷战”为关键词且把时间限定在2014年,进行主题搜索,可查找到相关论文1100多篇。与此同时,相关著作亦纷纷面世。

较具代表性的是,在2014年初,出版界和学者们进行合作,编辑出版了多本有关冷战史的专门著作。例如北京九州出版社以我的《冷战五书》为代表推出了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李丹慧主编的“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

其次,学术界翻译出版了西方在冷战史领域推出的多部最新力作。例如,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国防部部长的美国政坛元老罗伯特·盖茨撰写的《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安德鲁·鲁宾的《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俄裔美籍学者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的《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等等。

2014年,学术界举办了多场有关冷战史研究的国际国内会议,重点就档案搜集

越来越多的中国冷战史研究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以前较少受到学界关注的课题进行研究。诸如经济冷战、文化冷战、心理战、隐蔽战等,都得到了深入挖掘和考察。

与整理以及一些热点冷战话题进行探讨研究。如“冷战时期东南亚国家对外关系档案开发与利用”国际研讨会,重点考察东南亚国家地区的档案解密及研究情况。“冷战时期中国西北与周边国家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冷战时期新疆与中央政府关系、新疆与周边国家来往、宗教与法律建设、改革与革命、各种史料档案及一些历史问题。“中国首次核爆及其国际影响”国际工作坊,除了相关学者外,邀请到参与过首次核爆的老专家和亲历者,一同商讨首次核爆对中国大陆外交政策以及周边国家和美苏等大国的影响。

研究双边关系要利用双边档案,各国档案的解密则为学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资料来源。2014年,在中国大陆历史档案开放趋向收缩的情况下,大陆学者把眼光和目标进一步转向国外,尤其是周边国家。从2013-2014年,我带领的团队在大量收集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档案的基础上,分别到蒙古国、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以及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收集了大量冷战时期的档案文献。与此同时,对印度、

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老挝等国档案文献的收集工作也开始启动。

10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当代文献史料中心”签约暨揭牌仪式在闵行校区图书馆举行。此举是为了实现档案资料(主要是冷战时期的档案文献)收集、整理及利用的规范化和规模化,以及资源共享的愿望。当代文献史料中心宗旨就是大力促进当代史研究的发展,利用华东师大和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的各自优势,用3-5年时间初步建成一个特色鲜明、优势突出、有国际影响的公共学术平台。

目前,当代文献史料中心正在组织人员,对已经搜集到的来自各国的大量原始文献资料进行紧张的编目、整理、翻译。12卷《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已交付出版社,有望在2015年初出版。中朝关系、中蒙关系的档案也在紧张翻译和编辑中。我们中心计划在今后五年内出版100-150卷的周边国家对华政策档案文集。

此外,中国大陆有关机构在继续购买已出版或电子化的档案。比如,首都师范大学2014年新购买了《杜鲁门总统办公室文件(1945-1953)》、《波茨坦会议文件》、《美国国务院机密核心档案:中国部分(1963-1966)》、《美国新闻署档案》、《美国新闻署、国际公众舆论和“公共外交”》等缩微胶卷255卷;国家图书馆购买珍稀原始典藏档案(Archive Unbound)关于亚洲的子库25个;中国人民大学购买普若凯斯特资讯公司制作的历史档案资料库(History Vault)关于“越南战争和美国外交政策(1960-1975)”的子库,等等。

□ 编辑 晓波 □ 美编 黄静

虽然目前中国媒体以及舆论监督的困境不能仅靠新闻立法就全部解决，但是法律还是能够解决包括责权问题在内的基本问题，并确定媒体和国家、媒体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因此，新闻立法的意义不容小觑。

2014：传统媒体寒冬之年

2014年末的冬天比往年更冷了一些。这不但指自然气候，也指这一年的媒体，尤其是纸媒的生态环境。

自从2012年，中国纸媒的发展就开始遭受双重阻碍：一方面受到的监管增强，一方面遭受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挤压。两个因素让中国纸媒的读者和广告迅速流失，正在经历发展的寒冬。目前绝大多数纸媒正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对于其舆论监督的功能，似乎已经无暇顾及。

舆论监督呈零星化

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2014年12月初表示，新媒体发言随意，吸引眼球；传统媒体管制严格，面容呆板。一样的传播两个尺度，让传统媒体常常感叹“戴着镣铐跳舞”、环境不公。我十分赞同这个看法和评价。目前官方对传统媒体的监管较为严格，留下的发展空间显得不足，加之新媒体咄咄逼人。长此以往，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将越来越小。

总体来说，2014年的舆论监督形势是，官方希望媒体参与其发动的反腐败行动，但希望媒体有序参与，也就是在官方主导下的参与。这与此前媒体自己发现问题而进行监督还是有所不同。所以，表面看，2014年舆论监督成果颇丰：从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苏荣、令计划等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被查处，到中央纪委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反馈情况，再到中央纪委公开曝光纪检监察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等，都成为一时的媒体报道

热点。

但有一个现象特别明显，对于上述案件的报道，往往只有一到两家媒体表现出众，形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景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目前许多反腐案件报道的来源都是“中纪委网站”。

在司法监督领域，情况似乎要好一些，2014年以来一些陈年疑似冤案都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如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十八年蒙冤案、聂树斌案等。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些报道属于重炒数年、甚至十余年之前的“冷饭”。比如，2005年聂树斌案就在原《大河报》副总编马云龙的组织下由《河南商报》首次公开报道。呼格吉勒图案也早在9年前就被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关注，2007年媒体公开报道。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何少有最新的司法不公案件被“爆出”？

2014令我印象突出的传统舆论监督也不是没有，冯军在腾讯财经发表的调查《红

十字总会的“秘密仓库”》可以成为一个佳作。但总体而言，许多媒体监督社会的功能已经退化，开始“吃老本”。

另一传统媒体电视在舆论监督方面的表现也是乏善可陈。电视媒体具有一个很强的特点，即上行下效模仿能力强，说明行政化色彩很浓。在当年《焦点访谈》风靡全国的时候，许多地方电视台随即也开办了类似的舆论监督节目。但问题是，目前《焦点访谈》已经不太涉及舆论监督，于是地方台也基本偃旗息鼓。白岩松2014年5月在接受采访时曾直言，《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方面没有上升的势头，反而下降了，最惨的一年里，只做不到60期舆论监督。所以，目前一些零星的电视舆论监督只是散落在一些民生节目之中。

虽然相比传统媒体受到的制约，微博等新媒体受到的监管要小一些，但无法实行属地管理的“网络舆情”也成为官员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微博等新媒体受到的限制也在增加。微博自2013年夏天以来首次面临用户活跃度增长下降的问题。另外，目前活跃在微博上的公民记者数量也在减少，有名的仅有高勤荣、朱瑞峰、“落魄书生”等寥寥几个人。

网络新媒体最活跃的时候是在2012年。当年微博上甚至能查到重庆王立军离开美国领事馆所乘坐飞机航班号、座位号和个人身份证等信息。当然，这也是后来引起官方担忧的地方。目前许多地方24小时监督网络。我认为，除了有关国家重大利益、恐怖主义、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相关言论应该依法限制，许多话题都可以拿出

一方面有关部门干预过大导致舆论监督难度增加，另一方面，经营的惨淡导致大部分媒体更加注重求生而非进行舆论监督。他们目前最关心的就是明年的发行情况如何，广告客户保有量下滑多少等问题。



来讨论。对媒体的监管不可太严，严格对，严厉就会过。

新闻敲诈形成路径依赖

对于为何2014舆论监督会苍白无力，我认为除了监管过于严厉以及政策不明朗，还可以从2014媒体界发生的两起引人关注的案件中找到部分答案。一起是原《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罪名包括损害商业信誉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另一起则是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多位主管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批捕。在检察机关的批捕罪名中，《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网、《理财周报》这3家媒体及8家运营公司涉嫌敲诈勒索和强迫交易罪。

其实，国人寄予厚望的舆论监督被一些传统媒体和网站用来敲诈生财固然可恨，但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中国大部分传统媒体，特别是许多我称之为“边缘党报”的行业报，虽然名义上是事业单位，但多年来是自收自支的准企业，同时又挂靠国家机关下属单位的头衔。由于上级管理单位拨款不足甚至根本没有，加之后来崛起的互联网的冲击，其市场困境可想而知。但中国又没有健全媒体退出机制，报纸作为某个主管单位的下属单位，再差也不能像一

▶ 2014年7月30日，北京的一处报刊亭在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以中央查处周永康为头条的报纸。

般企业那样根据《企业破产法》而倒闭，这就必然导致一些媒体以“不能好死，那就赖活着”的方式度日，有一些甚至走向以负面新闻敲诈勒索一途。这些媒体最近十几年来一直通过设立地方记者站，对地方单位以投放广告、发行报纸、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等方式明示或暗示索取经济好处，向北京总部输血。当然，地方许多单位也通过这些经济利益换取媒体不发表对自己不利的负面报道或者相关的评论。

但是令人惋惜的是，像21世纪传媒公司这类曾经获得过很高市场回报的市场化媒体，也涉嫌走上利用敲诈来生存的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纸媒——无论是“边缘党报”还是市场化报刊——生存的艰难。

因此，一方面有关部门干预过大导致舆论监督难度增加，另一方面，经营的惨淡导致大部分媒体更加注重求生而非进行舆论监督。他们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明年的发行情况如何，广告客户保有量下滑多少等问题。总体上看，一篇愁云惨雾。

暗访课堂难以理解

在舆论监督没有起色的大背景下，2014年还发生了一件针对大学教师的暗访

课堂事件。11月14日，某省报头版公告并在4版整版刊发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文章称，该报社采编在省内外几大高校中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调查，并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在高校比较集中的城市听了将近100堂大学专业课。最终该报认为，大学教师“‘必中国’的现象也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该报道的最终意图为何，但肯定的是，至少上述调查行为并非“舆论监督”。高校和大学教师不是不可以监督，但应监督其滥用教育和学术权力的行为，如学术腐败、学位造假、私吞科研经费使用等众多内容。而通过在课堂上暗访，则是一种对教师政治上的监视，侵犯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如果这个事件不是个案而还有继续的话，将对社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另一方面，事情总有好的一面。对于媒体和舆论监督来说，2014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是柳斌杰先生提及新闻传播立法或将启动。十八大已反复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和“重点领域优先立法”等口号和要求。在此背景下，柳斌杰先生称，人大正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新闻法治化提上日程。

虽然目前中国媒体以及舆论监督的困境不能仅靠新闻立法就全部解决，但是法律还是能够解决包括责权问题在内的基本问题，并确定媒体和国家、媒体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因此，新闻立法的意义不容小觑。正如柳斌杰所说，新闻立法能够明确“哪些东西能传播、哪些不能传播，法制、道德、社会秩序的底线”。否则用各种条条框框把体制内媒体管得很死，只能眼看着它们的影响力减弱，阻碍它们发挥作用。

□ 编辑 晓波 □ 美编 黄静



2014年的党史研究涌现了许多重要的新书，对传统的党史研究构成诸多挑战。也因为新资料的披露，为党史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解角度。

党史研究的新突破

继2013年底《毛泽东年谱》出版之后，2014年的党史研究涌现了许多重要的新书，对传统的党史研究构成了诸多挑战，也因为新资料的披露，为党史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解角度。在此之中尤其重要的是2014年年初郭德宏《王明年谱》、年中《邓小平传》以及年末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三本书。

王明研究在党史研究领域和陈独秀研究一样，一向是划定重重障碍的雷区和禁区，郭德宏长年研究王明，对王明的所有材料了如指掌，此次出版的《王明年谱》增订本，更增添了诸如王明手稿等许多珍贵资料，尤其对“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形成及其传播考证甚详。但是限于作者本身的局限，依然仅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王明，因此对其许多作为都有着批判性的解读。

年中《邓小平传》的问世，本意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无意之间，延续了几年前傅高义《邓小平时代》所燃起的“邓小平热”。在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之后，2013年香港中文大学曾出版《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一书，填补了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其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文革岁月》之不足。而此次《邓小平传》的出版，虽然披露了邓小平早期在欧洲勤工俭学参加革命的一些新资料，但是却没有对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以及再次被打倒、进而在文革结束后复出领导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加以描绘，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而金冲及的《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是



金冲及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该年度党史研究的一项意外收获。金冲及曾经长期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担任要职，并且主持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传记的编写工作，是胡绳、胡乔木之后官方修史的关键人物，而且亲历过《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党史上重要著作的编写工作，也因为工作关系记下了当时胡绳、胡乔木等人对于编纂此书的想法。

《一本书的历史》便是当时金冲及的笔记资料，其独特性无可比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金先生也应该对其主编《毛泽东

传》《周恩来传》等国家领导人传记的过程写一本书。

在这三本书之外，本年度的党史研究还有一本值得注意，便是王海光的《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该书为王海光的代表性论文结集。王海光研究党史，尤其是林彪事件多年，是“九一三事件”公认的研究权威，《折戟沉沙温都尔汗》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经典著作。而《时过境未迁》一书，最重要是的该书第一编的许多重要的论文，王海光集中对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反右运动、红卫兵运动等当代史的关节点一一考察，颇有创见。

包括王海光在内，许多北京的党史研究者逐渐形成一个较为集中的研究团体，成为党史研究领域一个独特的现象，如郭德宏、韩刚等人在几年前曾经合作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北大印红标出版的《失踪者的足迹》聚焦文革时期知识青年的思想，清华唐少杰的《一叶知秋》研究清华在文革前期的造反派，展示了文革史研究的多重面相。

而上海近几年的文革史研究也逐渐展开，有些原来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学者，逐渐将研究领域转向当代史领域，如金光耀原本研究外交史，近年主编的论文集以及发表的论文逐渐偏向知青史、文革史，而一些研究上海文革多年的学者如金大陆，也在近年出版了《非常与正常》这样描写上海文革社会的著作。金光耀、金大陆主编的《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一书于近期出版，对知青史研究颇有助益。

□ 编辑 晓波 □ 美编 黄静

《一本书的历史》是当时金冲及的笔记资料，其独特性无可比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金先生也应该对其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等传记的过程写一本书。

一步, 迈向未来。

新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 每百公里油耗仅2.0升。

加载BMW eDrive电力驱动技术, 昭示未来全新驾驶乐趣。新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 缔造每百公里2.0升超低油耗、每公里49克二氧化碳超低排放的传奇, 践行环境友好理念更见证你对未来的承诺; 配备自适应LED大灯、BMW互联驾驶、NAPPA真皮座椅和动态减震控制系统, 秉持梦想之路始终如一的豪华商务标准。新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 不动声色间, 已走在时代之前。

更多信息, 请致电400-800-6666, 或登录www.bmw.com.cn



BMW高效动力
BMW EfficientDynamics
更少尾气排放, 更多驾驶乐趣。

BMW 5 Series Li

520Li
525Li
528Li
528Li xDrive
535Li
530Le



Sheer
Driving Pleasure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悦享纯粹驾趣。
YOUR DRIVING PLEASURE OUR JOY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